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总第十八辑

中国 人民 政治 协 商 会议
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YH266/21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军纪略	李烈钧	(1)
《李烈钧自传》读后	冯玉祥	(5)
武宁李公协和先生事略	杨赓笙	(6)
跋二（选节）（为李烈钧将军而作）	姜伯彰	(10)
回忆义父李烈钧	杨仲子	(11)
欧阳武策应湖口起义	曾采堂	(4)
依稀往事忆童年	石凌鹤	(33)
万家岭战役的回忆	胡 翔	(45)
回忆长沙会战的赣北战役	王仲模	(51)
回忆武宁阻击战	陈德邵	(58)
追忆血战高安	毛羽芳	(59)
扼守盘豆镇和潼关的回忆	乐 典	(61)
我在抗战中所经历的战斗	邹 宏	(69)
记抢救坠落鄱阳湖美机的经过	罗水生	(73)
美国飞行员星子脱险记	徐新杰	(77)
记陈嘉庚先生赣州之行	徐浩然	(79)
江西青年服务团的三起三落	徐家俊、吴达明、戴雄远	(83)
记江西青年服务团的后期活动	眭新亚	(87)
记战时丰城妇女指导处	范纪华	(94)

抗战期间的江西省图书馆	熊 飞	(97)
抗战时期江西的驿运事业	周希敦	(103)
战时江西官场现形记	赵昌蓉	(109)
八年离乱六记	万水福	(116)
日机轰炸“黎明号”目击记		(120)
回忆日军侵占湖口的一些见闻	孙渺生	(123)
日军侵占泰和的暴行	尹建华	(130)
会战声中上高民众英勇杀敌故事	王道平	(134)
胜利的狂欢		
——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宁都狂欢之夜	周效之	(138)
江西抗战大事记	田和勇	(141)
回忆与蒋经国在赣南相处二三事	方 瞰	(165)
王升其人	方庆延	(166)
尹豪民之死	贡献之	(172)
作者·读者·编者		
关于《王造时和（前方日报）》的通信		(175)

其歟。余去，愈甚。去者，骨肉之罪，而未照总归余因京
亥日，整装以行。日未暮，忽不父知。夜半，育董、康
乘人世。

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军纪略

李烈钧

余高官全崇昏乱余，愧对义士，见人皆全又会好音西工和。余
文孙口疏里姑忘却，回表至都员外省丈役士余隸共。



编者按：本文及后面的冯玉祥、

杨庶堪、姜伯彰文均为几十年前的作品，由杨仲子同志提供，现予发表，以此纪念李烈钧将军诞辰一百零五周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海风云，瞬息万变，缅怀往事，恍若梦寐。近奉贵会大函，征集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史料于余，略述梗概，以备采择。

袁世凯封建余孽，因缘时会，当总理以总统让袁时，余正统五省大军驻鄂，通电反对，愿率所部拱卫南京，黎公不行，盖南北和议初成，余去而武汉空虚也。

督赣以后，余以治赣必先清匪，害民最酷者，龙正文、陈细鬼、彭木香等，均缉获杀戮，余匪敛迹，人心安定，于是罗致人才，整理财政，开办银行，缩编军队，修筑河堤，诸大端办理完竣，即电请总理来赣，复电允来，而赣省拥戴总理之热忱，日益高涨，先开省议会决定一切，并以百花洲陈列馆为总理行辕，以林虎所率部队任警戒拱卫。部署既定，即电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护跸晋省，有张继、马君武、王正廷等随行。

袁因余欢迎总理来赣，恨之刺骨，欲去余甚急，余亦深烛其隐，遂有去志。夫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向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致讨。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以争位恋栈见疑，且讨袁必须宁、皖、赣、鄂、湘、粤同时并举，仅赣省一隅，恐难图功，俟而谒总理请示后再返赣行之，签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员说明一切，并嘱余之好友省议员杨赓笙速回彼之故里湖口作发难准备，在先余二人都认为湖口地形险峻，襟外江而带内湖，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余在杨去湖口后由九江乘轮赴沪，面受总理方略，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省议会开会一致推举余为讨袁军总司令，即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于湖口，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员，开紧急会议，众推杨赓笙为秘书长，负责撰写讨袁檄文，杨移时立就，其文曰：“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弃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檄文气势磅礴，足令袁贼丧胆。旋又发出《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及《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二文亦出自杨氏手笔，义正词严，读者称快。

自赣省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袁派李纯统军来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余早派员精察地形，守险捣虚，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遂不敌。团长周壁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又余邦宪亦以团长阵亡，余见浔湖之战失利，退驻吴城，命炮兵团长刘凌扼守望湖亭，复命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鄂援军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发，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跪船首作哀求状，刘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湖亭，伏兵登陆，方声涛挥刀斬数人，无效，吴城遂陷。于是命讲武堂教官穆思堂，扼守鞋山，退却中路

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乃以电话告宪兵司令廖伯浪：“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最严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令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吾军始克安全退却。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牛行与南昌城，只隔一江。有邓祖禹者，江湖通人也，余命其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数艘，待余于赐福门外。余见李纯兵，势如潮涌，赣军鲜有能战之将，亦无训练之兵，湘粤援军又久不至，但赣军自湖口宣布讨袁，至退到南昌之日止，以最少之兵，最劣之武器，已艰苦支持两阅月矣。

湘督谭延闿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之语，余诚知湘援军虽到，亦不能挽回颓势，粤军更无出动消息，何之奇、李明扬、卓仁机复劝之行，余乃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余所乘之轮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麟者，见余后，表示湘省当局及同党意见，援军次第到达，余嘱停萍乡待命，乃偕唐赴袁州。途中渐见退兵有纷乱之状，有在街市劫掠，人民捆一兵士至，即枪决示众，秩序稍复。翌日抵萍乡，旋乘火车至长沙，有谭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

“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招待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必能共同努力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次日乘煤船，启碇，唐麟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至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片时，匿余于彼衣箱内，“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颇相类。及湖口，船长又语余云，将达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系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当日与北军鏖战，炮弹遗迹，宛然在目。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备炮已移

去，过此，船行江面无阻。”至第三日，已至黄浦，出海向日本前进矣。

以上胪列，皆属陈迹，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盖湖口讨袁之役，余实主其事，所谓身在此山中也，庐山面目，是真是假，有待读者批评。又山谷读蜀志有句：“似覆当年一局棋”，此一节失败史，仍复缕述，认为是“第二次革命”，低徊响往，弥增愧而耳。

（杨仲子藏）

欧阳武策应湖口起义

湖口起义前夕，袁世凯政府的九江要塞司令陈庭训，连电副总统兼湖北、江西都督黎元洪，极言“匪党（国民党）往来如织”，大有“克期起事”的迹象。而护军使欧阳武却电告声言：“赣地各处，一律安靖，何用重兵镇慑？……请即撤回防兵，……务期休兵息民。”不日，陈庭训又急电武昌，说前都督李烈钧于七月八日晚间，会九、十两团并工程辎重营，“占领湖口各个炮台，宣告独立。”袁世凯又急电严诘欧阳武，“所报情况，迥然不同。”但欧阳武回电称：“李烈钧虽到湖口，而各处军队，未经全变。”这样，就迷惑了袁世凯和黎元洪，贻误战机，遏止了各路来赣军旅，有力地策应了湖口起义。

（曾采堂）

《李烈钧自传》读后

冯玉祥



协和先生卧病滇垣，怀念弥殷，后来陪都，养疴山野，两年来身体日渐康复，今竟能以自传授之读矣。此于已于国，均大有裨益，祥阅之者再，欣慰之余，且有不能已于言者，仅为读者复申述一二：

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预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者，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

抗战军兴，虽身无重寄，而目覩国难，义愤填膺，乃本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之旨，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敢议，犹恐言单，无补国是，复促友人为之，对国，对友，对抗战，可谓忠直无私，竭尽心力矣。

此外则慷慨豪侠，大仁大义，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传中所
(下转第32页)

武宁李公协和先生事略

杨 賧 筏

武宁踞赣之西北，九宫山，云居山，前后罗列，修河环绕如带，灵淑之气，降生异人，协和先生出焉。先生李姓，名烈钧，李固武宁巨族，先生之尊人讳骏兴，字民仁，号德蓋，业商，性好善，挥资济人无吝色，世称李太公。太夫人杨氏，善持家，尤知书史，夫妇以积德故中年生先生，先生稟资天授，书过目辄不忘，经学贯通，皆太夫人之力。先生幼时与群儿嬉戏，动辄以兵法演习，见者咸为惊异。时江西开办武备学堂，先生入焉。毕业后，送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习预科，声誉炳然。先生于功课之余，阴结同志，为恢复汉族之大计，其时总理居东京，先生盖已深受其薰陶故也。既而学成归国，清廷维新，行征兵制，江西协统吴介璋，于先生有师谊，素器先生，授以营长，革命志士，因麌集焉。江西大吏颇疑之，思捕先生，遂逸去之云南，充讲武堂提调官，盖先生之同志，遍布滇中，将待机举事，事未发，而武昌举义，是时先生已离滇，拟赴太湖观秋操，即急走鄂，复入皖就都督职。时江西于光复后，匪盗猖獗，人民苦之，咸议迎先生督赣，及至，壁垒为之一新。适袁世凯嗣总统之位，阴怀逆谋，总理忧之，辄函先生，总理且与同志张溥泉先生，曾一度莅赣，赣中同志，益稔世凯怙恶，不可以言共和。及宋先烈教仁被刺，大借款复违法，赣议哗然电争，世凯怒，阴结赣人赵从蕃，畀以民政长，欲借以挠先生权，赣议会持约法反对之，世凯益切齿于先生，乃免先生职，世所谓四都督同日免职是也。四都督者，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湘督谭延闿，及赣督先生也。先生闻免职之令，即赴沪，赣议会同志阻之，请即举义，先生不可，曰：“中央免吾职，吾即起兵，是反也，非举义也。世凯违法，重袭帝制，须以民意讨伐之，吾赴沪听命。”先生行后，

赣议会通电全国，痛陈世凯罪状，举先生为长江七省讨袁军总司令。先生在沪，与总理洽商，并得各省之同意，遄赴湖口发难，遂乘商轮，溯江而上。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队长吴楚藩、余烈士邦宪等逐之于湖口下游松矶，先生率同志数十人、周壁阶烈士、邵元冲烈士，及李明扬、欧阳琳、卓仁机、耿毅等至，耿固世凯所委任之赣北镇守使也。时夜二鼓，先生入湖口城部署一切，天明乃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讨袁军旗帜飘于上下石钟山间矣。赓笙本湖口人，故先生在赴沪前囑回故里筹划一切，作起义准备。桑梓之邦，父老子弟，一经赓笙奔走号召，咸乐为之助。赓笙被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奉命撰写《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和《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用以昭告中外，激励士气。起义军士气旺盛，连战皆捷，终以众寡不敌，而海军复受世凯贿，向湖口轰击，先生遂移驻吴城，又逾时日，各省尚无响应之消息，先生知事不可当，乃从容入省垣，与士绅计善后，率残部而入湘，改装赴沪，乘外轮抵东京。世凯日专横，大捕党人，首先解散江西省议会及各省议会，旋复解散国会，党人悉潜集东京，总理乃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订五权宪法，厉行革命。先生与本党先烈黄克强先生，议请总理亲赴欧美，宣布世凯之罪状，俾失外援，而易于扑灭。总理意未决，克强先生乃赴美，先生遂有巴黎之行。未几，总理派李同志守成，与赓笙赴南洋群岛，鼓吹革命，建立各埠支部，兼办槟榔屿《光华日报》，颁行总理昭示颇多，尤以远大期先生，并函邓先烈泽如，致意先生，先生乃益感总理之相期远且大，而图报之心益切。适欧战发生，忧时之士，有欧战研究会之设，滇督唐继尧者，与先生留学日本，极佩先生，而友谊最笃，先生因以研究欧战为名，书函往来，以掩外界之耳目，实则说继尧反世凯，拥戴总理，以立不世之勋，其事且易如反掌。继尧心动，月必派员南来，先生因授以种种之举义方法，及世凯称帝，洪宪年号出，先生即只身入滇，于是有护国之役，而世凯遂伏天诛矣！是役也，先生率滇军两师，长驱入粤，世传三炮定韶关，沪上梨园，至

演以为剧，受世凯之王封龙济光者，遁入海岛。惟桂督陆荣廷，出身绿林，尚首鼠两端，其乡人有世宦岑春煊者，曾督粤，荣廷为其旧部，众商于先生，召岑羁縻也，遂有肇庆军务院之设，先生心弗善也，置两师于粤，而养病于沪之余村园。既而督军团独立，张勋复辟，先生复力疾入粤，筹划大计，总理亦率海军南下，任先生为参谋总长，组军政府。岑春煊以桂系首领自居，政学系附之，议设七总裁，以岑为执政，总理遂去粤，先生亦离粤赴渝，迨至临时总裁发现于粤时，西南盛唱联省自治之说，颇不以总理此举为然，独先生由镇远行营通电拥戴，而人心大一定，一致倾向，由是先生率军入桂，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黔军总司令谷正伦、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属焉。总理亦即率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赴桂商定大计，由赣出师北伐，时有谗先生者，造蜚语，谓先生得粤督，先生出桂抵三水，即行舟达芦苞赴韶关，以混淆忌。乃我前线之北伐军，已抵赣之三曲滩，不虞陈炯明背叛党国，竟有“六一六”之变，先生时驻节大庾，闻之忧愤成疾，急令北伐军回师靖难，继而得悉总理脱险赴沪，许崇智因率兵入闽，朱培德乃挥师入桂，先生亦于疾中率同志数人，由湘赴沪，晤总理，计恢复，旋得朱培德之自桂来函，谓将移师东下，乞帅座准备。时总理已得刘震寰、杨希闵等之报告，倒陈计划，及蒙江举义，陈仓皇出走，总理乃以大元帅名义莅粤，未行之先，乃令先生及胡汉民、谭延闿等，代行大元帅职权，先行赴粤。先生听命，即入潮汕，收抚陈之悍将洪兆麟等部，以通闽粤之道，许崇智各部，因以返粤，朱培德亦全部由桂抵粤。总理任先生为大元帅行营参谋总长，军暇且为大元帅著戡乱纪，盖记平定沈鸿英、陈炯明诸役是也。及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执监委员，先生当选执委。总理每语党员，言及先生，常称之为协和先生，先生往谒总理，总理必起而迎之，是可知总理之重视先生矣。总理倡革命，雅不愿用兵，殃及人民，曹锟、吴佩孚倒，总理应冯总司令焕章先生之电请，北行革命，偕先生与俱，先生为总理安全计，绕道经门司至天津，晤张作霖，作霖颇倨傲，先生以语折之，作霖慑服。其时

总理肝病颇剧，尚力疾入北平，卒以劳苦，于三月十有二日，骑箕仙游，哭声震海外。党人举先生治丧事，设位于中央公园，祭者日数十万人，途为之塞，各方挽词，备极哀崇，为数尤夥，堂庑皆满，多有重叠悬之，中多杰作，先生一联尤为传诵：“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未倒之军阀段祺瑞者，时尚执政，因与总理议不合，总理函速开国民会议，段主善后会议，以是苗柄，耿介于怀，祭之日，段允莅临，大众俟之久，既而以足肿辞，众意失望，先生登演台，力诋段之失礼并平日祸国罪恶，群情欣悦，不独党人称快也。冯总司令玉祥者，革命之先进也，滦州之役，实主持之，惟未入本党旗帜之下，先生极佩其行谊，深结纳之。丧事毕，先生率同志赴张家口，与冯朝夕抵掌谈天下事，谊若胶漆，而本党遂增多一柱石矣。国民政府成立于粤，先生奉召还粤，其时本党复出师北伐，蒋总司令已定江西，电请莅赣为省政府主席。适国府迁武汉，党内分裂，致有江西省党部与市党部之争，无何，省政府改组。及宁汉合作，先生复为国府常务委员，孙传芳渡江之役，达官显宦，与本党之要人竭避之上海，独先生一人与白同志健生总戎，计击破敌，以奏龙潭之伟绩，世竟称之。嗣后党中叠生波折，先生鉴于同志之覆辙，一意避贤，匿居沪上马斯南路之私寓，晚尤与焕章先生极相得，焕章之就副委员长职，尤先生之所深望也。先生素善书法，又与谭组庵友，书法尤大进。喜为诗文，独辟蹊境，每逢党国有大事故，电文竭自出心裁，阅者叹服，不知其为武人也。平生重气节，好施与，报德不报怨，万金尽散无所吝，此所以长贫也。既而沪战突起，先生于久病之余，雀跃三百，不愿托庇于租界，乃扶病入京，共赴国难，又不以蜀道险阻，遄入陪都，襄赞中枢，以先生平昔谋国之忠，忧时之切，至此当益抒其伟抱，“板荡识忠良”，此全国人士对先生深致无穷希望与敬意也。

(杨仲子藏)

跋 二*（选节）

姜 伯 彰

然因护国之役，不能不追溯湖口起义，讨袁之役；又继护国之役以后，而复有靖国、护法及北伐诸役，均莫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先生则无役不从，且躬膺艰巨者也。

忆自先生献身革命以来，精诚感召，乐而效死者，颇不乏人，先生不自传，则若者谋国之忠，若者死事之惨，抑将湮没而弗彰，且僭窃历史，以伪乱真者，大有人在，不有信史，何以光潜德，而昭来兹，为宇宙开继续无穷之生命，是则先生自传，不綦重欤！？

先生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不营私产，遇党国有大故，如援鄂、讨袁、护国、靖国、讨龙、北伐、龙潭诸役，存亡关键所系，则身先赴之，置生死于度外，卒赖以转危为安。其合也，应冯焕章氏之请，宁作食客于张垣；其不合也，拒北京政府之命，曾薄总长而不为；以正言力争，为国父停厝于社稷坛，使之不敢不慑服；复奔走呼号，促成有力者之精诚团结，一致御侮，如先生者，可以风矣。

（杨仲子藏）

*本文系为李烈钧将军而作。——编者注

回 忆 义 父 李 烈 钩

杨 仲 子

(一)

义父李将军原名烈训，后改名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世居江西武宁，清光绪七年庚辰农历正月初六日（公元一八八一年二月四日）出生。其父李骏兴与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军，为忠王李秀成部下，转战大江南北，多有建树，太平天国覆灭后始返回故里，然反清排满之心不死，故其兄弟面部和手臂的“太平天国”四个针刺的字始终保存，以明心迹。义父生长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耳濡目染，默化潜移，对他的影响极大。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先严兄弟四人太平天国时均弃儒从军，事败潜返故里……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部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辈述甲午战争，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义父的母亲杨太夫人是一位才女，有“不栉进士”美称，精通书史，博学多闻，义父小时之所以就贯通经史，熟读百家，皆赖太夫人之力。义父从小就怀抱大志，图复国之举，与群儿嬉戏，动辄以兵法部署之，见者咸为惊异。稍长，广交游，重气节，行侠仗义，结纳各方豪杰。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余少喜交游，服膺先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语，豪侠自任，邑中贤士大夫，皆匿就余。”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江西开办武备学堂，江西巡抚饬武宁县令在武宁选派二人，县令久闻义父英名，故保应试。

义父抵南昌复试，榜发名列前茅。义父入学后勤勉攻读，学业优异，总教官吴介璋甚为嘉勉，刮目相看。未几，北京练兵处选学生赴日本学陆军，江西应选派四人，在吴介璋推荐下，义父得首选，其余三人为胡谦、欧阳武、余鹤松。义父抵北京经过考试合格，被派赴日本学陆军，到日本后先入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科），二年毕业，于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深造。是时革命党人在日本鼓吹民主革命甚力，影响很大，义父本来就抱有反清复国的大志，于是很快地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了革命生涯。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

“余入士官学校，是时张继、王侃、张华飞均在日本运动革命，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间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辛苦，令人感奋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未几，总理莅临东京，同人等在神田俱乐部（富士见楼）开欢迎大会，听众极踊跃，总理演讲内容即揭橥三民主义，并如何推翻满清及入党等事，全场欢呼之声，屋瓦皆震。此次开会时余见总理已数次矣，曾记最初谒总理于小石川之私邸，同行者李根源、张华飞、罗佩金三人，先容者王侃也。余一见总理，倾服之忱，油然而生。但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余既正式加入同盟会，仍继续学业。”

义父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即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驻于南昌澹台门外，训练士兵，并以革命思想灌输之，故第一营士兵不仅军事动作灵敏异常，而且思想一致，革命气氛浓厚，协统商德全和标统齐宝善发觉后，密谋陷害，欲置义父于死地，幸得业师吴介璋救护，于是义父离赣走滇。时李经羲总督云南，注重训练新兵，重聘有为青年参加从事训练，义父被聘先后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义父从日本学成归国，在赣约一年，在滇约两年，服务各界均以培养干部参加革

命推翻满清政府为宗旨，故在云南亦如同在江西，努力灌输革命思想于军中青年，其间并曾一度奉召入川，乘机开展革命工作，滇川革命基础遂伏于此。

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党人在武汉发动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义父奔走南北，厥功甚伟。义父先是赶赴北方，在北京滦州之间，与吴禄贞、蒋作宾熟商声援武汉，布置事毕，又即刻南返，驰赴长江各地，促进发挥倒清力量，扩大起义行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起义军力量薄弱，陷于清军重围，革命有被扼死于摇篮的危险，义父于是出任五省联军统帅，亲率大军援鄂，使起义军危机终于解除，民国亦随即创立。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

“辛亥革命前夕，滇省督练公署派余参加永平秋操，余遂离滇往沪，勾留两周，溯江西上，抵汉时，武汉起义已三日矣。次日拟访黎元洪，忽传黎已离武昌赴某地去矣。遂决作北上计，抵北京，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邀集在京同志数十人，宴余私邸，共商援鄂之计。次日遵海而南，由津至沪，再由沪抵九江，九江早已继武汉而光复之，友人吴铁城、张惠民、卓仁机等先后来谈，均以要职推任之，是时总参谋长原系蒋群（字君羊），蒋闻余来，慨然让职于余，余以周瑜旧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是时安徽有同志胡万泰等人来浔访余，约余向皖发动，并曰此事易于反掌，只须两营兵足矣。余到皖后，省垣各界开大会欢迎，并推余为安徽都督。未几，武汉一日五电乞援，谓冯国璋已派重兵攻武昌，形势极为严重。余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准备次日出发西上。抵九江后与都督马毓宝、参谋长蒋作宾商议，略事补充，复启碇西上。黎元洪命余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总司令，右翼军总司令为杜锡钧，左翼军总司令为王芝祥，三军既整，余遂命赶速布置构成犄角之势，亲率中央军控制武昌紧要地区，令王杜率左右翼两军向黄陂孝感加以压迫，而武昌乃安如磐石矣。此时响应武昌起义者已遍及各省，尤以变起京畿附近之师均为对清廷中枢以直接之打击，冯国璋见战局如此，乃不敢越长江一步。”

(二)

辛亥革命后，义父出任江西都督，政绩斐然，人多歌颂。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九江光复，南昌亦下，各属分起响应，不旬日赣局大定。首任都督吴介璋即余师也，在位仅两月即辞去，继之者为彭程万，旬余洪江会猖獗，不安于位亦去之。时余方于役安徽，遂由地方人士迎马毓宝为赣督，马督对于借机会扰乱者亦多方迁就，以致匪患坐大，渐呈不可收舍之势。是时余正督师阳逻与黎元洪都督策划北伐。江西省议会知余在鄂，乃开会选余为江西都督，电请总理任命，总理即颁任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之令，电复赣省议会。赣人闻讯鼓舞，遂由议会领衔电促回赣，并示欢迎。黎元洪派楚豫舰送余赴赣，入城以豫章学堂为行辕，克日视事。督赣以后，余以治赣必先清匪，害民最酷者龙正文、陈细鬼、彭木香等，均缉获杀戮，余匪敛迹，人心大定，于是罗致人才，选派留学，整理财政，开办银行，缩编军队，修筑河堤。”

听我父亲说，义父在其担任江西都督期间，勤政爱民，下车伊始，即首先惩治匪盗，以安定人心，并邀请革命人士参政：徐秀钧长民政司，王侃长司法司，符鼎升长教育司，赵世瑄长交通司，俞应麓长军政司，吴照轩任警察总监。我父亲杨赓笙为都督府高级顾问，协助义父处理省政。义父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有识之士，多来协助，并着手整理财政，开办银行，裁编军队，兴修水利，使赣省面目一新，人民颂扬德政。

义父眼光远大，卓有见识，扶掖提携青年不遗余力，在他任职江西都督期间，大力选拔本省优秀青年，官费派遣前往日本、欧美求学，造就专门人才，以备从事国家建设。其中如胡先骕、陈寅恪、程孝刚等人均成为世界知名学者。

义父在江西都督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是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他在湖口通电反对袁世凯，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湖口起义(史称

二次革命）。听我父亲说，义父早就识破袁世凯的狼子野心，辛亥革命胜利后，一九一二年二月当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时，义父就感叹说：“天下从此多事矣。”他又对我父亲说：“一旦有事，当以贵县湖口为抗拒袁世凯的大本营。”盖义父深知湖口地形险峻，踞外江内湖之间，向为兵家必争；同时义父知道湖口是父亲桑梓之地，父亲在此从事革命活动多年，有一定群众基础，民心可用。父亲立即回答：“庶愿毁家纾难，誓死相从。”可见两位革命老人洞烛机先，忧国心长，早已预见到袁世凯必将复辟帝制，后果然从湖口打响了反袁的第一枪。一九三三年义父来湖口访问父亲并同游石钟山，二人互相作诗唱和，义父有句云：“偕游名胜访名贤，底事旌旗耀眼前”，父亲和之云：“二十年来泥雪在，寒潮犹带怒声流。”两位老人对二十年前首义讨袁的壮丽场面仍眷恋不已。

由于义父对袁世凯的野心早有察觉和斗争，故督赣不久，即欢迎孙中山先生来赣巡视，旗帜鲜明地对中山先生表示大力支持。袁世凯闻之极为不安，对义父采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先是企图以巨款与晋勋拉拢，派大员来赣游说：“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酬，并给晋勋一位。”但此举枉费心机，遭到义父严词拒绝，义父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耳？”袁世凯见利不能诱，于是收买江西败类赵从蕃，发表其为江西民政长，用以牵制义父，但这一诡计又被我父亲识破，父亲时任省议员，于是在议会持约法反对，使赵不能到任。于是袁世凯恼羞成怒，先发制人，于一九一三年六月悍然下令免去义父江西都督职务，父亲也在省议会受到袁氏党羽围攻。稍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亦被袁免职，因为这三人均系国民党员，在政治见解上多与义父相合，对袁世凯采取共同抵制的态度，故袁必将四人去之而后快，人称“四都督同时免职”，即指此事。一九二七年义父在送柏文蔚先生的诗中还回忆起当年他们共同反袁的情况：“浔阳鼙鼓忆当年，汉水滔滔势拍天。击楫枕戈同夙抱，也曾

携手奠中原。”

袁世凯在免去国民党人南方四省都督职务之前还派人刺杀了著名国民党人宋教仁，至此，袁世凯的凶恶嘴脸暴露无遗。孙中山先生认识到“袁氏将授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力主武力解决。为了商议讨袁事宜，他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时国民党内对袁的认识及斗争策略并不一致，故会上争论颇大，有的主张武力讨伐，有的主张法律追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中山先生一再指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大家的思想仍未能统一，连黄兴也认为“南方军力准备不够，对讨袁无胜利把握”，主张“听候法律，与袁世凯相周旋。”最可恶的是混进革命阵营的民族败类汪精卫对中山先生的武力讨袁主张多方阻挠，胡说什么“联合进步党凭借法律来罢免袁世凯，不必诉诸武力。”真是荒谬绝伦。听我父亲说，汪精卫早就被袁世凯收买，一九一一年九月十六日清廷纳当时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两广总督张鸣岐之议，释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于狱，汪即感激涕零，投身袁门，并同其子袁克定结为兄弟，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当然，当时国民党人还不知道汪之底细，故能为汪欺骗。义父见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慷慨陈词，历数袁世凯之罪状，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武力讨袁的主张，并自告奋勇，表示愿回江西首先发难，他说：“汉贼不两立，吾侪和袁贼不能并存，有袁无我，有我无袁，讨袁义举，万死不辞。”孙中山先生对义父这种见危受命、舍身赴难的大无畏精神深为赞许，说：“知我者，协和也。”其他参加会议者亦深为感动，纷纷称赞说：“今日之事，只有协和先生能做到。”汪精卫迫于形势，默然不语。

会后义父兼程赶回湖口，因其赴上海开会前已命父亲回湖口作好起义一切准备。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义父在湖口正式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发表父亲为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通电全国，宣

布讨袁，设司令部于下石钟山，令要塞鸣炮致贺。义父叫父亲赶快写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人称《江西讨袁三大文献》），昭告中外，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财产。《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发出后影响巨大，流传很广。据湖口起义参加者之一、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出自杨赓笙手笔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义父接着在湖口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的军事行动，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派江西第一师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另派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派李明扬为湖口炮台总台长。湖口首义之日，义父在总司令部祭旗誓师，欢宴部属，席间义父以所佩宝剑赠给父亲，满座掌声雷动。当时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张仲西即席赋诗，以志盛况，诗是这样的：“夜夜龙吟意若何，中宵起舞影婆娑。隰多蛇蝎山多虎，陆有包洼海有波。脱颖原为今日用，霜锋曾费十年磨。凭君去管不平事，快意樽前一啸歌。”张仲西在这首诗的前面还写了一小段序言：“湖口起义，余任总司令部参谋，李烈钧总司令欢宴僚属，席间以所佩宝剑赠秘书长杨咽冰（先父号咽冰），气氛热烈，敬呈一律。”

湖口高举讨袁义旗后，江苏、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纷纷响应，一时民气为之大振，但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各地起义军始终未能连成一气。湖口起义初期，革命军士气旺盛，连战皆捷，但由于敌众我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终归失败。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自赣省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袁世凯派李纯统军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余早派员精察地形，守险捣虚，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遂不敌。”在《李烈钧自传》中还记载了当时湖口起义孤军奋战的艰难情况：“余见李纯兵势如潮涌，赣军鲜有能战之将，亦无训练之兵，湘粤援军

又久不至，但赣军自湖口宣布讨袁，至退到南昌之日止，以最少之兵，最劣之武器，已艰苦支持两阅月矣。”

湖口首义讨袁虽遭挫折，义父毫不气馁，雄心长存，壮志不减，过湖南时对谭延闿说：“袁世凯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歼灭袁贼。”后他在日本为了表示讨袁的决心，手书“力挽狂澜”四字，常置案头，以为砥砺。

(三)

湖口首义讨袁失败后，义父去日本向孙中山先生报告讨袁经过情况，中山先生一再慰勉。义父在日本小住一段时间后即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和讨袁主张，旋又赴欧洲考察，广交朝野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讨袁失利，余赴日本，谒总理后，即作赴欧洲考察之准备，嗣得一赴南洋之海船，抵香港，换大船，行过南洋各地，为侨胞所知，来谒见者极踊跃，余一一接见，遂在槟榔屿稍住，赴各处书报社、欢迎会，鼓吹革命讨袁。数日后复换轮船赴欧洲，途中曾至加尔各答，游访名胜古迹，并考察其习俗、政治事项。余勾留旬日，复登轮经哥伦布、红海，未登陆，达苏伊士运河，游埃及金字塔。到法国后，除日夕学法语外，惟随各友游，或登艾菲尔铁塔，或参观拿破仑墓，或至伟人墓。余居法数月，颇解普通用语，乃进而研究军事、政治、外交，所用语既得其门径，遂开始结交政府要人及社会贤达焉，使其能同情中国之革命也。”

袁世凯用武力镇压以湖口发难开始的“二次革命”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莫予毒也，帝制阴谋，日益显著，王公爵位，分别内定，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以袁世凯怙恶不悛，日甚一日，咸思回国声讨，中山先生尤深憾之，乃命义父回国，策动云南地方的统治者唐继尧举兵反袁。盖中山先生深知义父在云南有很好的革命基础。辛亥革命前，他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并主持陆军小学堂校政。

云南著名的军政人物，如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黄毓成等都和义父有同学或同事的关系，而义父的学生中，那时已有多人在云南担任营长以上职务。故派义父去云南，可谓得人。一九一五年十月，义父从欧洲至海防转河内，欲从老开（街）入滇，以为至此沿途当无阻碍，不料河口关监督闻义父至，即密电唐继尧请示，唐开始尚未下决心反袁，态度暧昧，令人莫测，故河口关监督阻止义父前进，说：“唐公无电来，请勿孟浪闯关。”义父闻之恙甚，因思此行对中国前途关系极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于是乃作破釜沉舟之计，迳电唐继尧，表明来意，电曰：“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继尧得电后，权衡得失，下定决心讨袁，于是复电表示欢迎，电云：“良朋远至，将莅昆明，造福至大，匪可言状，尧喜迎公，特不敢预有表示，兹派舍弟继虞躬迎，愿稍候之。”翌晨，唐继尧之弟唐继虞果前来迎接义父，由老开登车过河口到昆明，寓圆通街老友黄毓成家，唐继尧随即来访，商议起兵出动计划。义父到昆明不久，蔡锷亦逃脱袁世凯的监视从北京回到云南，于是义父和蔡锷、唐继尧歃血为盟，举兵讨袁。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成立护国军政府，宣布独立，并由李烈钧、蔡锷、唐继尧三人署名发布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罪状二十条，号召全国人民：“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群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涿鹿原中，会洗蚩尤甲兵。”为了扩大起义军的影响，义父将檄文急发在香港的李根源，请其漏夜送各报馆登载，使尽人皆知云南已发动讨袁。我听父亲说过，为了檄文，义父和梁启超还进行过较量。檄文写就后，梁启超于底稿中见有语涉及共和党者，意欲删改，于是唐继尧告义父曰：“请将檄文送来，梁先生略有修饰。”义父回答：“此稿早已寄印泉（李根源先生号印泉）在香港发表，梁先生纵有斟酌，恐亦为时间所不许矣。”梁启超至此只好顿足徒

呼奈何。

云南护国军政府兴师讨袁，决定在云南地方武力的基础上组建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出师四川；第二军归义父统率，任总司令，向两广进发；第三军由唐继尧任总司令，归其掌握，坐镇云南，留守后方。义父设第二军总司令部于云南忠烈祠，以何国柱为参谋长，钟勤为秘书长，方声涛为第一梯团团长，张开儒为第二梯团团长，赵德裕为副官长。不日，义父挥军出桂、粤，战败了袁世凯倚为干城的龙济光、龙觐光兄弟，平定了广东。广东都督龙济光原系袁世凯死党，见形势不利，伪称独立，以图固位，闻义父统率大军至粤境，亟谋抵抗，义父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由龙母庙出师，集中清远，命张开儒率部攻韶关帽子峰，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闻炮声魂飞魄散，仓皇弃城逃走，后有人根据这次战役编了一出粤剧《李烈钧三炮定韶关》，风靡全国，久演不衰，至今海外还经常演出。与此同时，由蔡锷统率的第一军在泸州、纳溪战役中大败北洋军号称“常胜军”的第八师，张敬尧被迫固守待援。护国军的节节胜利，震惊了袁世凯想当“洪宪皇帝”的黄粱美梦，迫使他退位并终于忧惧而死。义父从湖口首义到护国讨袁，身经百战，壮志终酬，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致为袁世凯篡夺，使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连根拔掉，义父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民永远怀念他这样坚强的民主战士。一九三三年义父曾写过一首诗用以纪念云南起兵讨袁，诗是这样的：“金碧驰驱忆昔年，滇黔鼙鼓上云天。义声远播幽燕动，那得刘唐再戍边。”

(四)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先生反对北洋军阀蔑弃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广州号召护法，九月一日，中山先生就位军政府大元帅，任命李烈钧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国会自经段祺瑞非法解散，议员相率抵沪，议集非常会议商国

是，总理率舰队南下护法，及赴粤开非常会议，决议组织军政府，拥护总理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总理以义不容辞，遂于九月一日就职，并设各部，置总次长，余被任为参谋总长。”从这时起，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逝世为止，义父以大元帅府高级幕僚长的身份追随在中山先生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朝夕相处，长达八年，中山先生对义父倚畀甚殷，委以重任。义父在此期间协助中山先生平定陈炯明、沈鸿英诸人之叛乱，使广东成为巩固的革命基地。义父见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战事频繁，民无宁日，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于是乃向中山先生建议开办黄埔军校，从而培训出了大量优秀军事人才，为以后北伐奠定了胜利基础。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

“余向总理建议为了健全本党，急应培植党军干部，总理然之，乃创办军官学校于黄埔。廖仲凯时长财政，乃请其充分筹款，冀收速效。开学之日，余及谭延闿随总理莅该校，参加典礼，余并奉总理命，说明本党建军之旨。”

一九二四年八月，义父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以特使身份至日本访问朝野人士，任务有二：一是争取日本社会贤达对中国革命之同情；二是向日本倡议组织抵抗白种之侵略的亚洲大同盟。日人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竹次二郎皆为中山先生老友，均参与其事，故义父与他们来往甚密，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颠倒是非，血口喷人，散布流言蜚语，造谣说义父此行是为了勾结日本军阀，贻祸中国。迨是年双十国庆节，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大礼堂举行庆祝大典，敦请义父莅会讲演辛亥革命经过史实，混进会场的少数民族败类故意挑衅，当场诘询义父此行是否向日本进行军事上的大借款，留日学生中有反对国民党的亲吴（吴佩孚）分子亦乘机起哄，企图闹事，他们的无耻行动，激怒了拥护孙中山先生的留日学生，双方争吵起来，几至动武。义父在主席台上见状大呼道：“我李烈钧是革命党人，决非卖国贼，千军万马，我都见过，要闹事打架，我是不怕的。”声震屋瓦，使少数闹事者为之胆

怯，抱头鼠窜，一场骚动这才算平定了下来。这次会议由留日学生总会理事长雷啸岑主持，后雷啸岑回国曾专程探望过我父亲，他谈及此事时说：“协公大智大勇，临危不惧，镇静自若，古人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协公足以当之。”我时尚三尺童子，年纪幼小，但雷啸岑先生称赞义父的这番话留在我脑海里非常深刻，记忆犹新，有如昨日闻之。

未几，国内直奉大战发作，冯玉祥以直军左翼统帅，半途倒戈回到北京，协同首都卫戍司令孙岳，推倒北洋曹锟政府，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主政北平，临时设置摄政内阁，任命义父为参谋总长，义父置若罔闻，薄而不为，谓须听命于孙大元帅。盖因段祺瑞主政后不实行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召开国民会议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故中山先生训诫国民党人不得参与段执政政府的政务，义父坚决响应，以身作责，带头抵制，坚不就段祺瑞任命的参谋总长之职。

稍后，段祺瑞致电中山先生邀请北上，共商国事。中山先生素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宗旨，复电允之。时中山先生已感身体不适，为顾全大局，奋不顾身，抱病北上，取道日本，义父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份随行在侧，同行者尚有孙科、邵元冲、戴季陶、汪精卫等人。途中中山先生肝病复发，义父建议中山先生在日本小作勾留治病，中山先生答曰：“国事当头，无暇顾此，俟到津后再议。”

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下榻张园，各方求见者甚多，中山先生带病工作，夜以继日。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山先生在天津时造访张作霖，义父知张作霖性情桀傲不驯，预防万一起见，向中山先生进言：“昔刘邦会项羽于鸿门，得张良与樊哙同行乃无恙，今兹先生访雨亭，似宜有随从者，以何人为当？”中山先生乃指定义父随行，其他尚有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警卫森严，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令张学良外去迎接。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良久，张作霖始出，意气傲岸，旁若无人，宾主寒暄过后，中山先生对张作霖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作霖答曰：“自家人打自家

人，何足为贺”，脸上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气氛显得紧张。义父见此情况出身解围，他站起来对张作霖拱手致意后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者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兄一人耳。”这时会场气氛变得非常友好和谐，张作霖一再举杯请大家用茶，并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回到旅馆后，汪精卫说：“险哉！险哉！！今日之鸿门宴也！！！”义父讥笑他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孙科等人听了一起大笑起来，汪精卫则蹙额锁眉，极为窘困。后来父亲对我说：“汪精卫本来就是一个胆小鬼，他在张作霖盛气凌人的场合下感到害怕，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他胆小怕事，贪生怕死，所以来当了汉奸，遗臭万年。”

中山先生在天津为革命日夜奔忙，操劳过度，以致肝疾转剧，病情一天天恶化，义父以天津少良医，建议将中山先生送往北京协和医院诊治。北京当时虽为段祺瑞之势力范围，但北方诸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均为义父至交好友，故入京求医实为最妥，孙夫人宋庆龄亦深表赞同。义父护送中山先生入北京协和医院后，中山先生得悉北伐军进入江西，乃命义父到江西主事，对义父说：“北伐军入赣幸顺利，将到吉安，余拟以赣省事付君，命令续发，君可先行。”义父南下刚到上海便得汪精卫急电，谓中山先生已在医院开刀，发现极危险状态，望速返。义父立即乘专车赶回北京到协和医院探视中山先生，是时中山先生已不省人事，而来院探望者甚多，拥挤不开，于是复将中山先生移至顾维钧私邸，众推我义父主持一切，准备中山先生后事。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中山先生溘然长逝。伟人骑箕仙游，举国震惊，万民哀痛。

中山先生逝世后，义父与随行诸人商议将遗体在协和医院入殓，至于治丧处和停灵处，群主以社稷坛为当，于是通知段祺瑞。

段祺瑞得知后玩弄政客手法，态度暧昧，含糊其辞，派代表王某到颐邸与汪精卫接洽，王来时趾高气扬，竟称“执政府对社稷坛治丧表示不能同意”。汪精卫慌乱无主，不知所措，急告我义父。义父闻言发指眦裂，怒斥王某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尚能持异议耶？”王某在我义父的严词斥责下立收敛骄横的态度，与来时判若两人，答以归报执政而去。次日，段祺瑞迫于形势，不得不亲自给我义父写信，说他完全赞同在社稷坛为中山先生治丧的意见，并假惺惺地表示将亲自来吊。

中山先生大殓时，义父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引导先行，中山先生遗骸，覆以国旗一面，入协和医院，并用苏联政府送来的玻璃棺殓之。三月十九日，中山先生灵柩移往社稷坛，同行诸人分为若干组，次第舁之而行，我义父亲自领导第二组，抵社稷坛厝灵榇于大殿正中。

停灵后，远近来吊者日十余万人，络绎不绝，途为之塞，段祺瑞原通知亲自来吊，旋忽托词脚肿，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致祭。我义父对段祺瑞这种出尔反尔的两面手法大加痛斥，对前来吊唁的青年学生发表演说，谓“段祺瑞等人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也”，并当众宣布段祺瑞不能来之原因。众大哗，极感气愤，故龚心湛到达时，守门学生不许其由中路而上，龚不得已，改由侧门进。龚致祭走后，段祺瑞复派梁鸿志前来解释，妄图为段开脱，义父修书一封交梁带回，痛责段祺瑞自食其言，失信于天下，段得书大惭，不得不向我义父承认过错，并称赞中山先生是当代伟人。

义父追随中山先生奔走民主革命长达二十年，公谊私交无不深厚，中山先生对我义父极为器重，依畀甚殷。听父亲说：“中山先生和人谈话如果说到协公，都是称协和先生；协公每次晋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一定起身接送，礼遇之隆，这在党人中是罕见的。中山先生前曾让协公代行大元帅职权，并曾一度想把临时大总统让给

协公，可见中山先生对协公是如何器重。”中山先生逝世时，义父十分悲痛，写了一副挽联表达他对中山先生敬仰和悲痛心情，同时也谈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这副挽联是这样的：

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义父对中山先生十分敬仰，所以在上联的第一和第二句中把中山先生比做历史上的明帝贤君，如放桀的商汤，伐纣的周武，以及春秋战国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第三句“九万里震威名”是引用《庄子·秋水篇》中的典故，《秋水篇》说东海有一只大鹏鸟，“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第四句是说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是应天顺人，所以才兆民归心。第五句是说这一次的民主革命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一个皇帝推翻另一个皇帝的战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无法和中山先生相比，所以说“前无古人”。最后一句“后无来者”并不是泛指，而是指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义父深知他们的底细，那时就已预见他们不能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下联是说他自己长期追随中山先生奔走民主革命、出生入死、患难之交的关系。“出秉节钺，入赞戎机”这两句是指他长期当参谋总长，既运筹帷幄，又驰骋疆场。我义父在民主革命中亲自带兵打过不少胜仗，战功卓著，名扬四海。第三句“二十年共患难”是义父对他自己追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的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第四句“山颓安仰”，这里是说中山先生不在了，再也无法亲聆教诲，今后跟着谁来干革命呢？流露出对革命前途的隐忧。最后两句说明他和中山先生志同道合，不仅有公谊，而且有私交，所以才“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这副挽联不仅感情真挚，生动感人，而且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当时争相传诵，脍炙人口，直到目前，仍在海外广泛流传。

当时有一副挽联专门谈孙中山先生和义父李烈钧的亲密关系，对义父评价极高，据说出自曾琦之手，现一并录出：

二十年革命辛勤，排满倒袁，百战相依唯一李；

四万万人民愿望，兴邦定国，千秋遗憾在三陈。

从这副挽联中足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和我义父李烈钧二人之间的关系，“一李”就是指我义父李烈钧，至于“三陈”，则是指陈炯明和陈廉伯等人。

(五)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冯玉祥将军以西北军统帅兼任西北边防督办，率大军开府塞外张家口，礼聘义父为西北陆军总监，付以督导整训全军之权，当时旅京的国民党要员如张继、李石曾、覃振诸先生皆赞成义父与冯玉祥将军合作，如能使西北军将士默化潜移，接受革命道理，则将成为国民党在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国民革命军前途大有好处。义父俯应党内舆论，于是欣然应冯将军之聘，去张家口接受西北陆军总监职位。冯将军对义父推崇备至，待以“军师”之礼，常语人云：“协和先生固善将兵，亦善将将，今之奇才也。”他还称赞义父“集大仁、大智、大勇于一身。”在义父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从甘肃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声明全军二十万将士一律加入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军的力量迅速得到壮大和发展。义父和冯将军的友谊甚笃，故其诗文中多有提及冯将军之处，我在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人物》杂志上曾著文缅怀义父与冯将军的诚挚友谊，其中义父写的题为《张垣访煥章（冯玉祥将军号煥章）》的诗是这样的：“关山迢递战云博，鼙鼓声中小驻骖，万里驰驱问知己，为安河朔与江南。”可见义父视冯将军为知己。

一九二六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义父出任省主席，后又兼设在南昌的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主任。辛亥革命后义父曾任江西省都督，十多年后，又再度主持赣政，义父执法虽严，但从不妄

杀一无辜，他常说：“我所杀之人皆系人人曰可杀，如民初督赣期间肃清匪患，将害民最酷的龙正文、陈细鬼等正法，乃是彼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凡是可杀可不杀之人，我是不杀的。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憾也。”仁者之心，溢于言表。故江西民间曾流传两个与义父爱民有关的故事：一是李烈钧义释“土匪”；二是李烈钧出走保桑梓。这两个故事我都听说过多次，义释“土匪”的故事是说义父有天出巡，见卫队捕得一“土匪”，五花大绑，欲押送官府问罪。义父见状上前询问究竟，知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于是命释之，并送银钱周济其生活。翌日，“土匪”率其党羽来归，有人怀疑有诈，劝义父戒备。义父曰：“我至诚待人，从不妄杀一无辜，彼怀德畏威，何诈之有。”将其全部收编，一一妥善安置，从此远近来归者日众，壮大了北伐革命军的力量。李烈钧出走保桑梓则是说明义父爱家乡，爱人民，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的故事。义父主赣期间，当汪精卫等人把持武汉政府后，派人前来拉拢义父未成，于是一方面离间滇军将领朱培德等人和我义父的关系，一方面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在江西反对义父。义父愤然道：“我若不是江西人，害怕糜乱桑梓，对不起父老子弟的话，便要挥军打它一个落花流水。”于是义父将省政交给朱培德，亲自带领总司令行营直属部队蔡忠笏的炮兵旅、蒋鼎文的警卫团、杭毅的宪兵团、廖士翘的工兵营离赣入浙，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并赋诗表明心迹：“晒矣无能吾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设常务委员五人，义父受命为其中之一，其余四人为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和于右任。此时胡汉民主持中央党务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在武汉，蔡元培作教育部长，于右任在陕西三原担任靖国军统帅，皆无暇过问国府政务，故事实上只有义父一人独挑大梁，主持其事，日理万机，备极辛劳。一九二七年八月，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玩弄权术，以退为进，通电下野，前往日本，一时党政大员纷纷出走，首都形势顿告紧张，义父为维持国本大计，独坐镇不动，处理一切。

军阀孙传芳又复乘机率师偷渡长江，在龙潭登陆，进犯首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浮动，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义父临危不惧，调兵遣将，急召海军陈季良、陈绍宽入主警卫，并命第七军（李宗仁部队）、东路军（白崇禧军）及第一军（何应钦部）迅速出动，由无锡、镇江合围击溃来犯之敌，数日之间，龙潭战役结束，首都巩固，使大局转危为安。据当时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厅厅长陈和铣先生后来对我父亲说：“龙潭战役时，我与李公（指我义父李烈钧将军）同居危城，故经常去国府拜谒李公，并随侍伴餐，目覩厅堂陈列名厨菜肴，无人欣赏，仅李公独占一席，一若在首都客串一出新空城计戏，真是胆智过人，非凡人所能及。”

义父立身高洁，从不随人俯仰，更不愿媚事权贵，从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即可看出。一九二七年冬，蒋介石见形势有利，从日本回到上海，汪精卫等人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复职，并纠合国民党全体中委在上海举行会议，筹商党政军实施计划，这时所有散居南京、上海、汉口的中央执监委员都前往赴会，唯独义父拒不参加，仅致电上海全会云：“嘉之会也，善莫大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不与于会，亦无憾然。”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蒋介石自上海乘专车回南京复职，城内党政军大员都去下关车站欢迎，只有义父一人不前去接驾。尽管蒋介石心中不悦，但第二天还是假惺惺地到国府拜访义父，表示“敬老尊贤。”蒋介石复职后率军实行第二次北伐，想请义父当他的参谋总长，随军出发，他对义父说：“不敢请前辈作我的参谋长，只是为着革命利益，恳求前辈赴前线指导我一段时期而已。”义父坚拒不应。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义父对蒋介石采取的态度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他们二人在政治见解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义父素鄙其人，我听他对我父亲说：“羞与蒋介石之流为伍。”在一九三四年我义父写的一首讽刺蒋介石愚而好自用的诗中更加看得出来，这首诗是这样的：“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才。”他把蒋介石比作政治上的盲人，不知

要把中国这条巨舰驶向何方，流露出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之命运的隐忧。

我义父和蒋介石的一系列分歧还表现在对待张学良将军的问题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在西安进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发表八项主张，迫其应允。这八项主张是：（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证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将军这一义举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蒋介石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口头答应，但一回南京后，就背信弃义，自食其言，反将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并要我义父担任审判长。义父在开庭前去见蒋介石，劝蒋介石不要对张学良进行处分，还给他讲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齐桓公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而用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不计较寺人披要谋害他的夙怨，以德报怨，请蒋介石作为审理本案的参考，蒋介石不置可否，含糊应付，终于以“首谋伙党，对上官进行暴行胁迫”的莫须有罪名，判决张学良将军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五年，随后又假做人情呈请政府特赦张学良，最后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上是终身禁锢。义父对张学良将军始终抱同情态度，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雪家国之耻，报杀父之仇，光明正大，无罪可言。开庭之日，义父未将张学良当罪犯看待，怒喝痛斥，而是和颜悦色，温言抚慰，一再赐座，开始张学良不肯坐，义父说：“没有关系，坐下好讲话嘛！”当审判员宣读起诉书以后，义父又让张学良申辩，不许别人打断，让其把话说完。张学良对义父十分感激，当场说：“审判长对学良的关怀，永远铭记于心。”一九八一年张学良在台北接见《自立晚报》记者时还特别提到当年接受军法审判的情况，说：“审判长李烈钧将

军为余父执，故对余关怀备至，开庭之日，温言抚慰，一再赐坐，长者风度，永生难忘。”

由于蒋介石在处理张学良的问题上未采纳义父的意见，义父和蒋介石的关系更进一步疏远，蒋介石把他放到国民党元老成堆的军事委员会当一名常务委员，有职无权，义父不甘闲散，报国无门，悲愤交加，故在他写给我父亲的诗中有“频年未遂澄清志”之句，表明他壮志难酬的心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全国一致抗日，义父异常兴奋，认为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他晚年患脑血栓，身体很不好，不能亲自到前线为抗日出力，就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令的五个儿子一起送到军队里去，其中有两个当时正在读大学也没有得免。义父勉励他们上前线杀贼，收复河山，并送他们一首诗：“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义父在他《六十自寿》的一首诗中还写道：“六十光阴瞬息过，家仇国耻恨难磨。羞在庙堂弹故铗，誓教儿辈枕长戈……”在他写给我父亲的信中对这首诗作过这样的说明：“多年备位中枢，旧铗重弹，复以老病浸浔，不能上前线杀贼，遂令儿辈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也。”我义父的大儿子李赣鹏后于中条山战役牺牲，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义父的爱国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义父为人非常注重气节和人格，我听义父的秘书雷啸岑先生说过这样两件事：一件是抗战初期，义父寓居香港，适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夕，义父预料香港终非安全地区，乃将旧置跑马地住宅一栋出售，所得售价计港币五十万元，除携带一部分，作避难昆明的生活费外，余数连同我义母华夫人历年所藏的首饰，皆储存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中。次年，日军攻占香港，任命陆军大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矶谷与我义父系日本士官同期同学，他接收汇丰银行时，得悉义父所存首饰和现款，为数不赀，特登报请义父派人来港领取。义母闻讯最初很高兴，主张照办。义父慨然曰：“抗战若告胜利，此戋戋之物，不愁没有；倘失败，国家且亡了，人民成为异族之奴

隶，焉用金钱珠宝为哉！”终置不理，以保民族气节。义母亦同意义父此举，并说：“君眼光远大，胜妾女流多矣。”

第二件事是义父在昆明寄寓滇省宿将黄毓成家，除与老友李根源等不时晤谈外，少与政界人士接触。滇省主席龙云原系唐继尧的旧属，义父当年在昆明与滇督唐继尧起兵护国讨袁时，龙云每次见到义父都立正敬礼，但这次义父避难来昆明居住，照理说龙云应该前来看望才对，然而龙云却装腔作势托故未来，故义父亦不去访龙云。一九四二年义父决计携家入川，龙云闻之声称义父离滇时若到省府向他辞行，即拟馈赠一笔程仪，以壮行色。此时义父阮囊羞涩，生活费甚感拮据，居停黄毓成老友深悉其隐，主张义父临行之前，不妨与龙云一晤，收彼馈赠，暂解燃眉之急，义父笑曰：“嗟来之物，得之何益，降格求人，素非所愿。”等到动身的那天，只派人持名片向龙云告别。

(六)

义父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据义父写的《李烈钧自传》云：“十三年春，本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迩时联共主张，本党意见极不一致，争论至烈，总理询于余，余答泰山不辞土攘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欲使本党强大，必联共而后可，总理称善。”义父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常有往来，关系良好，故以后邹鲁等人召开以反共为目的的西山会议，多方拉义父参加，义父断然拒绝，并认为国家从此多事。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他在一首题为《过金陵舟中晚眺》的诗中写道：“阅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抗日初期，他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发起《团结抗日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共御外侮，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义父非常高兴，希望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共匡国是。他曾说

过：“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事爆发，全国一致抗日，流血牺牲，盟邦助我，终获胜利，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已跻身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允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期其早日实现。”后来，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一九四六年初已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忧国心长，叹道：“吾老矣，衰病侵寻，转念前途，愧赦曷极。”他念念不忘国家前途和民族利益，总想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无奈天不假年，在他六十五岁时被肺炎及心脏麻痹夺去生命，消息传出，举国悲痛，中共中央除发来唁电外，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还亲临吊唁。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后由四川移葬到江西武宁时，沿江东下，灵榇每到一处，人民自动前来致祭。

我义父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冯玉祥将军对我义父的一生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与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建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战，无不躬亲其间，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人也，对国忠，对党实，对人义，对友直，行无所畏，言无所忌，此大仁、大智、大勇而几于圣贤者。”我想这个评价是恰如其份的，是对我的义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义父一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丰功伟绩，彪炳史册，这里我仅就个人所接触的狭窄面，把耳闻目睹的点点滴滴写成此文，以寄哀思于万一耳。

(上接第5页)

述，对孙禹行兄之救援，及祥忆及督赣时，对北京国会中民党议员之接济，不过例证之一二耳。

对国忠，对党实，对人义，对友直，行无所畏，言无所忌，此大仁、大智、大勇而几于圣贤者，传中所述，实仅涯略，读者更当于此外求之可也。

(杨仲子著)

依稀往事忆童年

石凌鹤

时在1983年，残而又老，却要回忆1910年前后的往事，即使自信记得真切，也仿佛似梦如烟。不过，回味少小时期，却有另一番情趣，其乐融融。

记得很清楚，母亲多次告诉我生于光绪丙午年闰四月二十九日卯时。算命的瞎子瞎说，八字不坏。不管他，那是迷信。折合公元是1906年六月二十日卯时临盆。我是妈妈的长子，要我记住自己的生辰八字，她重复千百遍也不会嫌多，因为她曾在我儿时寄托殷切的期望。父母为我取名联学，字时敏，号逊轩，无非希望我学以致仕而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4年七月上旬某夜，妈妈因患癌症在上海逝世的临终时，十分疼爱地对我这年将三十的儿子亲切关照说：“要小心啊，你还没有出过麻疹哩！”这是何等情深的慈母心肠哦，我跌跪在她床边，泪流满面地望着她怀抱忧伤，与世长辞，那年她才五十六岁。

母亲出生和成长于江西乐平县城何家台汪家大屋。她出阁以前会使用改良木机织宽幅白布，因为我的舅舅开过小型织厂，所以她早就学会了这种在当时颇为时髦的手艺。

母亲的名字是紫芸二字，嫁到大田村是父亲的继室，称为石门汪氏了。她幼读诗书，我五岁左右，她教我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之类的唐诗。儿时深印脑海的诗句是不会忘记的。到现在胡子全白了，《木兰诗》还能够背诵如流。每当“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夏夜，我坐在妈妈膝前的小板凳上“诵

明月之诗”，确是享尽天伦母爱之乐了。

母亲的解放裹脚，二叔首先剪除发辫，这教我急于哭闹着也要非剪辫子不可。虽然她曾多次说，和我同年出生的宣统皇帝，三岁便坐上金銮宝殿，我也应该有出息，读书做官，可是我每天常因梳辫子时乱动颤而被她用木梳敲打脑袋，加之哭闹不休，便狠心剪掉那黄毛小发辫了。

这在那时不能不是开风气之先了。盖因戊戌变法未成，清廷慈禧专擅之后，一直对帝国主义屈辱投降，割地赔款，同时也不得不废科举、办学校，企图略微顺应民情而挽颓风。于是除了我的祖父石为玉（字瘦梅，号载华），作为由秀才晋升的岁贡在省城候补县丞外，我的父亲石国盘（字子安，号屿苍）以秀才补廩邑附生身份，考江西公立法政讲习科毕业。二叔国堡（字子荣）为邑庠生备取拔贡，亦取得法政学堂毕业；三叔国璜（字子材）和四叔国底（字子廉）都先后在省立中学毕业，不再由科举求取功名了。

当我的生命进入到第六个年头，时为1911年，我作为祖父的长孙，跟随父亲二叔和三叔，一同坐船越过鄱阳湖，到省城煤炭坡乐平会馆，探望还在候补县丞的祖父。记得很清楚，满城悬挂红黄蓝白黑五族共和的国旗。那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年。黎元洪、黄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国政府，三角形的清廷黄龙旗从此作废，和五色国旗同时悬挂着“铁血十八团”的陆军旗。迎风飘扬。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后，离省回家过饶州府（鄱阳县）适逢举行悬灯会，几乎每户店家门口，都挂着用各种瓷器碗盆等组成的挂灯，里面烛火通明，煞是好看。回想我有生以来，只见过这一次奇异的灯会。如同年回到乐平县城，也正赶上提灯庆祝会，只不过是许多人手提各形各色的灯笼在夜晚游行，比饶州府河沿街的大为逊色了。然而从省城到县里，都大肆举行庆祝民国元年，正说明废除帝制民主共和的民心所向了。

下面我要叙述从大人们口中听来的两回大事件，它给予我影响不小。

其一，大田村里的百户人家，从来过着男耕女织的太平岁月，同族中老少相安。忽然传来惊人消息，“长毛造反”——即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的部队，在村后来龙山旁边过兵，吓得全村老少到山上逃命。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支大军是因太平天国的内讧所引起的天京大乱，石达开被迫引兵西走四川。大批人马走了七天七夜，不杀人，不强劫，大概石达开知道我村全姓石，所以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其后了解该军一路上从不扰民，并非因同姓华宗而严守军纪。可是村中年青的好事之徒，反而对走在后面的因病落伍的个别散兵，进行拦路抢劫，这就引起“天兵”大怒，追捉凶犯来到村头，放火烧毁我家伟如公一幢大屋，对胆敢抢“长毛”的以示惩罚。是非分明，后人不会忘怀。此为清咸丰七年（1857）的史实，略述为上，以备查考。

其次一事，是关于乐平县历史上著名的“混天麻子造反”，在清末震撼朝廷。家父及族中某些长辈，多次谈得有声有色，我在记忆中也印象甚深。不妨尽录所闻，向地方志提供资料。

时在光绪朝慈禧再度听政的年月，西乡魁堡村青年举人徐凤钧，为了反对县衙门加抽西乡靛税开办县学堂，挑唆种靛农民进城“迎刀仇”（注一）举行“武装示威”。而乐平义洪戏班著名的二花面（二净）夏廷义——绰号混天麻子，凭他的武艺超群便鲁莽地带头造反。据说当时聚合有关村民约千余人，先打厘金卡（即税收机关）又烧县衙门。吓得县知事和钱粮师爷、四衙差使人等屁滚尿流地逃之夭夭。而示威的农民人多势众，夏混天一马当先地冲到县衙前。传说他手夹两卷篾制大晒簟，又提一斤洋（火）油，纵身上屋，在大堂屋顶上铺开晒簟，泼上洋油，一把大火将这大厅烧得精光。接着又因为这县知事害怕洋人，平常偏袒洋人，讹诈老百姓，便趁势率众打了法国人办的天主堂，也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人心大快。

且让我夹叙一些有关夏混天二花面偷学武艺的故事。有一次在某大村庄日场戏刚散场，扮单雄信的混天麻子和正生行扮唐太宗李

世民的有胜师，刚演完《斩雄信》卸装，从后台朝下看，见一卖麻糍的白胡须的老汉还未离去，有胜和夏混天说这老头武艺好，就是不肯收徒弟。除非你去和他打架，可能学到些拳脚。夏混天说：“那好呀，我们两个去惹他发火，只能打起来学本事。于是夏去寻衅，三拳两脚被打倒在地，而有胜正生却在旁观看，偷学到武功。但这莽撞的二花面却落得跪地求饶，逗引得卖麻糍的老头一阵哈哈大笑。

夏混天这次被彼姓徐的举人挑逗着真的闯下大祸，清朝廷对这次牵涉到洋案的造反，岂能善罢甘休。饶州知府逐级上报北京，清宫十分震动。于是兵部急令九江武备道旗人瑞徵道台率兵镇压。可是当这位道台老爷前呼后拥到达饶州府时。听说乐平民心枭勇，从来械斗成风，便在寡妇桥附近安营扎寨，不敢前进。

某日，瑞徵正在营中纳闷。忽听门外有妇人在大声喊冤，且和守卫的兵丁争吵。于是见一蓬头乱发的妇人闯了进来，诉说被瑞徵道台的亲兵强奸，要求依法惩治。瑞徵见这妇人如此大胆，足见乐平民风强悍，正应设法驾驭，收揽人心。于是他问明情况，立刻集合军曹，命她指控。这妇人逐一观察，肯定那厮未来。瑞徵及时点卯，果然查出一人未到，立刻饬令传来，妇人一眼便认清无误。可是那人却在抵赖，瑞徵问她有何为证。妇人立即声称，曾暗将一枚红线绣花针插在那人的发辫上。立刻检查，果然不假。于是将罪犯扣押，命妇女下堂，应允严惩作奸犯科的军曹。当晚命购买棺木陈大堂，集合众头目，着犯官睡入棺内，瑞徵亲自以大刀剖其胸腹致死，然后盖棺掩埋。此举经大事传扬，果然口碑载道：“瑞徵真是了不得，不再是乐平不得了。”

这样一来，瑞徵颇得民心，同时使聚众于株株山的夏廷义甚为被动。果然，清兵开进乐平县城，声称即将大举进剿。其后官兵见山高路陡，不敢前进，回兵掩闭城门，对天主堂洋人则优抚有加。夏廷义以为官兵羸弱怕死，更不知徐凤钧已向瑞徵投诚献计，便鲁莽地于夜间率众袭击县城，误中敌人伏兵，以致仓忙败阵，伤亡甚

众。夏廷义只身逃走，而清营却包围睦乐夏家村，声称如不交出混天麻子，就放火烧毁全村，杀人抵命。村中父老焦急异常，聚众在宗祠议事。村中有一中年义士，为了保全几百户同族众性命，愿意顶替夏廷义出面投案，只要求村里保证，在他死后要优抚全家老母孤儿。于是这位“替死鬼”被砍首示众，全县哗然。我的父亲曾前往刑场看尸首，肯定死者不是戏台上常见的二花混天麻子，而九江道虽知有假，也愿早日结案收兵。割下假首犯头颅，报到京师请赏。果然朝廷叙功，连升三级，钦赐湖广总督，驻兵武昌，直至辛亥革命期间被起义军赶跑下台。而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夏廷义，却忽然出现于乐平北乡某地“打花会”（注二）的楼上，对楼下“跑风”的赌徒大声说：“今天吊在梁上的是空筒。多谢众位，我收下大家送来的赌注，给我的盘缠钱，我混天二花走了！”他向人们一拱手便去无踪影。

这混天造反的故事，确是乐平县的英雄史迹，所以详记如上，以备史家参考。

接着我要叙述，我是进入六岁——从南昌回家后，便到村中投入近支伯父的私塾中开蒙，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先生夸我聪明，进度很快，第二年便读《千家诗》、《幼学琼林》之类的书，下半年，我便到距家十里的县立模范小学读书了。因为四叔父当了该校校长，在校食宿，算是有亲人照顾，母亲也就放心了。

自1912年下半年至1914年上半年为止，除学会作百余字的文言短文且常蒙师长奖评外，可资记念的有如下诸事。

模范小学校址是四衙原址。隔壁为县衙，有破墙缺口可通该衙门二堂。晚间常传来刑讯囚犯的惨痛呼嚎，我便由荒草丛中越过瓦砾，前往探视多次。每见一公差力按罪犯肩背伏地，一公差脱下该犯裤子卷至脚跟，二公差各执竹板蹲伏两边，口中分喊“一、二、三、四……”数字，责打罪犯的大腿。只见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哀痛声嘶，惨不忍睹。而高倨公案的县官却铁石心肠，怒容满面，每使我触目惊心。尤其有一天夜间，见一犯人被用绳子将两手悬吊在屋

梁下，两脚不沾地面，两个行刑的衙役，分执竹丫梢扎制的刑具，也是分喊一、二、……地抽打受刑者裸露的背部，更使犯人血肉横飞，惨叫不已，口呼冤枉，谁为哀怜。我每次见这惨状独自回房，便彻夜难眠，心惊肉跳；人间地狱，撕裂我幼小心灵。

还记得我小学校的门卫号房的老头，曾经是法场行刑的刽子手。他多次对我这小学生，谈及他练习杀人的技能。每当夜间人静时，燃点神香插在泥地上，漆黑中凝视着这小红亮点，挥动锋利的杀人大刀，对准它砍去，要刚削掉小火头而神香不倒地，才算练就刽子手的真本事。我问他：“你杀人不会害怕手抖么？他和你无冤无仇，怎能狠心下毒手呢？”他说：“这有什么办法，吃了这碗饭嘛。”所以要狠下心肠还要练本事。如果一刀砍不断犯人的头，而犯人只犯“一刀之罪”，不可能再砍第二刀，刽子手就要倒霉了。所以要左手抓紧跪在地下的犯人的发辫，右手倒握刀柄，看准犯人颈项脊椎的凹陷处，手臂贴紧刀背，用肘力切下去，接着手提头颅左腿踢倒尸身扑地，否则犯人颈项射出血柱，溅入刽子手的眼睛，那就不得了哩。这形象生动的描画，使我双眼一闭便觉恐怖万分。

此外，某日见一女人从牢房出来，找这号房老头，诉说她昨夜在狱中不得安眠，并说门板上的铁扣搭，顶得她背部好痛，而那些死囚犯，一个个饿痨胚，全不肯……。这时候我虽在童年，却由于比我大得多的同学，教给我秽言歪道，略通人性，故而懂得贫穷妇女，被迫至囚牢中忍受摧残，心头刻下难忘的烙印。影响我以后常见人间罪孽，便屡作不平鸣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县里也受到影响。其时由于黄金跌价，我的小姑娘和大姐姐，都买了金耳环。还由于德国打仗，该国洋染料运不到中国来，因此我县的青靛、蓼蓝等染料大为畅销，靛行老板大发其财。我家在北乡，从来不种这种染料，好坏都不受影响。我只是从大人的谈论中留下少许印象。

从模范小学毕业以后，我便升入设在菱田村的乐平县立高级小学了。学校距家才三华里，但规定要在校食宿。母亲再三关照，必

须注意清洁卫生，再不能像在城里上学那样身上长虱子，教妈妈心痛。

妈妈疼爱长子，确是无微不至。例如在家里吃饭，有时给我盛满碗饭，内藏一块猪肉，而这是姐姐妹妹所不能享受的。现在住校寄膳，不常吃荤菜，便给钱我到菱田屠店买肉，带到学校在大饭甑上蒸熟下饭，想得太周到了。好在那时肉价便宜，一个铜板一两，每星期买半斤，够享受的了。

在这菱田村读书的第二年，也有一惨剧，印象极深。北乡塔前蔡家的大乡绅，教四五个青壮汉子，拿他一张名片，押解一个说是“强盗”的中年人，送交县知事法办，路经学校临时休息。只见这“强盗”被押解的人用刀戳穿胸前的锁骨处，再扎上棕绳，栓在树上，他的双手被反捆在身后，动弹不得。可怜他血污满衣襟，双眼射怒火。当时我想，就凭一个绅士的威力，将别人任意摆布比猪狗还不如，太霸道了。

高小读书三年，我年轻贪玩，常和高班年纪比我大的同学，吹笛子唱小调；懒得做课外作业，以致学习不佳。这些年早已回村的祖父，对于学校不教“四书”“五经”，认为是误人子弟，命我在他授课的私塾里，暑假期间跟班读书（私塾是不放寒暑假的）。他教我读《孟子》、《左传》之外，还责令我对楹联作绝句，使我无法懒散。有一日他出上联“宝箑水中救溺蚁，”我对以已经学过的诗句“玉钗灯畔剔飞蛾”，他夸我聪明，虽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接着他出上联“鸠唤雨，”我沉思颇久，对以“蝶翻风，”自鸣得意。谁知祖父以为是同族的一位大哥哥教给我的，我申称出自心声，这可恼怒了祖父大人，提着我的耳朵进行责罚。直到那位大哥申明确实不曾为我作弊，才呵责我“还不吃夜饭去”，我哭泣着面对昏黄的暮色，回到乐陶山馆。

由于在祖父的支配下，父亲和三位叔父平分家业，我父亲为长房，分得本畈的十几亩田地和来自外村的二十石左右的租谷，又分给我长孙名下一块菜园；从此由乐陶山馆搬到村里藤花小馆去居住。

我兄弟姐妹七八口的衣食，就全靠父母勤俭经营了。父亲是同盟会员，总想实业救国而为挖煤炭奔走在外。可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多次与本县绅耆结讼纷争。家里请散工种田，每到秋收季节，晚稻常常天旱缺水，母亲得带着我扛着手摇水车，到坂上车水抗旱，有时劳动到半夜，才得精疲力竭地回家。记得十二岁那年暑假，连我最喜欢捉黄鳝、钓石鸡，来改善菜餚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十三周岁那年，暑期前高小毕业，忙于准备功课到饶州府治鄱阳县投考省立第五中学。这年（1919）适为“五四”运动，这北京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倡导新文化学潮，直到秋初才传到这鄱阳湖的水陆码头。于是我这最容易被新事物所感染的热血少年，很快地便投身于这学生爱国的热潮中了。

学生全体罢课，每日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并吞中国，反对北洋政府接受亡国灭种的“巴黎和会”卖国条约。群情振奋，义愤填膺。不但砸碎自己的东洋货镜子、脸盆，更检查店里的仇货，如在产自日本的花洋布上盖起“抵制仇货”“誓雪国耻”的墨印。商人岂能甘心情愿，但只好苦笑着无可奈何。此外，在学生会的领导下，我们扮演“文明戏”，如《火烧赵家楼》、《高丽亡国恨》之类。这种话剧只有幕表，没有台词，由演员上台照提纲自行发挥。又因为不能男女同台，凡女角都由男学生饰演小旦。我因年少不高，饰丫环装假发辫。扭捏作态，举止泰然。扮演袁世凯的许凌青同志，却是体态魁梧，他将袁之灵魂卑劣，演得恰如其份。这种爱国的“文明戏”，乃是很有宣传效果的。何况它开风气之先，颇受群众欢迎。

此外，伴随运动而来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我对此十分欢喜，因为每逢作文课，便要咬文嚼字，太受拘束了。思想要解放，乃是无法抵抗的潮流。

五四学生运动，确是狂飙怒潮，诚为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先声。它促使在觉醒中的人民增强斗志，它唤起知识分子为宣传自由解放而献身。记得就在这一年寒假我回到乐平县城，有机

会参加在徽州会馆戏台上演出的“文明新戏”。又一次扮演裹小脚的妇女，提竹篮来圳边洗衣服。不愿为小脚所苦，劝姐妹们都应该天足，当场解除裹脚布，引得观众大笑腾欢。我的父亲和三叔看了这场戏，三叔夸我演得自然，而父亲却笑着说：“你上台扮小旦，要晓得当戏子要挖谱的呀。”我当即大声回答：“演文明戏是爱国，我又不是真当戏子啰。”大家一笑了之。

一年级上学期没有很好的读书，翌年下学期开学不久，曾见一个背插“斩标”的犯人绑赴刑场枪毙，可怜那个即将处死的汉子，大呼“冤枉呀……冤枉呀！”又一次使我感觉到官府衙门，实在可怕，太不讲“人道”了。

暑假之前，举行学年考试，由于数学这一门主科不及格，受到留级处分。这使我觉得非常羞辱，在家里吵着要转校，到九江投考省立第六师范，因为师范吃饭不要钱，可减轻家庭负担。可是事与愿违，未被录取。再转道南昌，省立中学都招考完毕，只好听从父亲吩咐，投考私立的赣省中学了。

经过这一番挫折，知道读书必须用功。何况学膳费开支不小，增加了家庭负担。先有初步觉醒，加之老师教学有方，此后成绩是班上前列，特别是国文更属优良。我们的国文老师是河南籍的王履泰先生，他自己就常在省办报纸上发表文章，对学生也常因材施教；每当作文，他除黑板上命题以外，另在括弧内注明“自行拟题亦可”。这对我十分合适，多次是信笔撰作自鸣得意的小说或散文，而且允许我课堂内不能按时成篇，不妨延期交卷。王师批改作文颇为仔细，批分则常在九十分以上。不过从不给我满分。

我永远不会忘记王老师对我的特别培养和器重，因为他使我在文学方面的探讨，树起坚强信心。同时还有一位姓姚的英文教师，教我背诵《鲁滨逊漂流记》、《泰西五十轶事》之类的原文，也增加了我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因此每逢假日，便到百花洲苏公圃原址上的省立图书馆，借阅《新青年》、《创造》、《语丝》等杂志，还阅读郭沫若翻译和创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女

神》、《凤凰涅槃》等名作，孜孜不倦，有一年连暑假也想在这图书馆消磨岁月，但家里是不允许的。尽管假期在家仍要从事抗旱耘禾或浇菜放牛之类的辅助农活，但总要挤时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

中学的四年中，自己求知欲很强，也积极地要求自我表现。我曾和季昌（恨秋）及一位姓邵的青年，共同编了一种文学小报，题名《时代之花》，用圆盘机铅印，三个铜板一份，我们自行发行。尽管友人讥笑我出风头，然而能藉以发表自己的文章，也就自得其乐了。

我1924年中学毕业之前，不免萌发革命思想。一方面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未能成功，另一方面眼见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连年军阀混战，无论从个人或国家着想，都觉得非改革现状不可。那时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主张，已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朋友间不少人向往广东，比我先一班在一中毕业的张协中曾邀我同往广东投身黄埔军校，可是我自省身体瘦弱，不敢习武；何况总想在文科方面发展，故不作此打算。我很想投考大学，家里却难于经济负担；听说上海有所谓仓圣明智大学，可以不花钱，但它只设立哲学专科，又觉得不合己志。于是南昌毕业之后，便回到乐平，接受第一小学聘书充当国文、音乐、美术教员了。月薪二十元，每月有十五块银元贴补家用，当然皆大欢喜。

小学当教师，始业于1924年的下半年，其时我刚满十八周岁，很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有的来自农村的学生年龄比我大，使我想在乡间如何普及教育，乃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我大田村就未办小学，我多次和同在县城第二小学教书的石联星哥哥谈及此事，彼此颇有同感。

记得翌年暑假初期，乐平县在公开竞选国民代表。题名候选的二人，其一为张姓富家子弟，绰号益伪，另一名为某乡绅。这两名候选者，完全学西方民主国家那一套，公开贿选。彼此高价买选票，风行一时。我和联星哥哥商量，大田村的选票，反正非卖不

可。何妨待价而估，以选票所得，作为在本村办小学的经费，回村和长辈商量，例如我家三叔、四叔，都一致赞同。于是我们二人便出面和张家益仇的竞选代理人徐某讨价还价，得以成交。只见张家宾客盈门，酒醉饭饱；还烟榻横陈，鸦片嗜好者便吞云吐雾。我们见此情景，不能不为之愤慨；如此民国，何以兴邦！然而事实上得权衡利弊，且得现洋八十元，购买砖瓦、付工价再砍伐两株老大枫树，为造教室取木料，于是大小共四间房屋的初级小学校舍，总算盖起来了。再从本村公共祖产祀会中拨租谷开支教员薪金，大田小学便报请县府备案成立了，同年秋初，本村学龄男女儿童五六十人，得以在本村上学，自然是被众人称道的好事。四叔父子廉，义务充当该校校长。三叔父子材，从来鼓励我为桑梓谋福利，同意我辞去县第一小学教席，在本村小学授业。虽然自己的收入少于原县校薪金，可是能在经手兴办的学校服务，兴趣甚高。何况能就近照顾家庭，且能和我的四妹雪书和四弟联任（天行），在村塾中朝夕与共并教学相长，总算聊尽作为大哥的同胞职责了。（今天，四妹和四弟都成为我党的国家干部，我同胞十口只剩她姐弟和我三个白发秃头，余则先后丧身于反革命敌人或病魔之手，总不免手足情深、悲喜交集了。）

1925年秋到1926年秋初，一直在本村忙于教学。生活平淡，没有特别值得回忆的事情，直到同年秋凉，才发生变化，犹如一湖静水，突被大风翻起不薄的波澜。且留以后续叙，兹以旧作小结斯篇。

一

依稀往事忆童年，光复洪都得睹先。
始创共和除帝制，新称民国庆华筵。
诵诗夏夜慈亲授，化雨春风县校迁。
怕见冤囚刑鞠苦，公堂溅血惨呼天。

二

五四高歌爱国潮，宣传演戏市尘嚣。
自由呼唤研新艺，人道追求鄙俗僚。
教学耘禾尚守德，牧牛车水岂无聊。
欣逢北伐风云会，反帝锄奸怒火烧。

(注一) 即荷梭标游行，易以现在的说法是武装示威了。

(注二) “打花会”为清末民初民间聚赌的一种方式。

(上接第50页)

令长官，广东部队（第四军，六十五军，六十六军）要全部调回广东，归张指挥，赣北前线由俞济时等军负责。吴奇伟即命令部队向南开发，总部经南昌、吉安、赣州，过梅岭到达南雄，设司令部于始兴。十一月，我奉令到重庆参加陆军大学十七期复试学习。学习完后，我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开赴滇南战场去了，仍归第九集团军指挥，总司令是黄埔一期的关麟徵，吴奇伟改任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我到重庆后，才知广东部队调回广东原因。当时太平洋风云已起，英军要求我国以两个军驻于香港附近，必要时增援香港。国民党统帅部考虑第四、六十五、六十六等军，都是广东部队，人地两宜，所以南调。

万家岭战役已过去四十七年，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回忆录，无资料，无地图，全凭记忆，所以许多地名，特别是山地标记不得了。战斗紧张时，第九集团军指挥的部队达到二十多个师，调动也频繁，番号也无从全部回忆。不过在一九三八年南浔线战斗中，万家岭战役都是第九集团军负责，我是总部主管作战的参谋，整个经过亲身经历。当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特写出来以作纪念。

万家岭战役的回忆

胡 翔

抗战军兴，我由成都军校重兵器助教调部队任连长，旋调到第四军军部任少校作战参谋。一九三八年四月，部队奉调湖北麻城，我偕上尉参谋周荣洛随同军长吴奇伟，乘车经南昌、株州转汉口，在汉停留约十天，即赴湖北麻城。部队则由南昌经九江渡长江经蕲春、浠水、新洲向麻城集结，企图在大别山脉阻止敌人向西突进，包围武汉。当时军部驻于麻城宋埠，只驻扎了两个月。一九三八年六月，吴奇伟调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军长一职由欧震接替，突然又奉令调江西。记得部队还未全部到达麻城又折回渡江到赣北，这样忽而由安徽经江西到湖北，忽而又从湖北调江西，劳师往返，真不知统帅部是如何打算的。后来我明白了：国民党的部队，最讲派系山头，谁指挥惯了的部队，在谁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时，都希望指挥原来自己领导过的军队。那时薛岳驻南昌，他也是从第四军起家的，同时，在江西的还有六十五军李汉魂，六十六军叶肇等广东部队，把第四军又调回江西，可能是考虑广东军队在一起，由广东将领薛岳指挥比较有利的缘故吧！

在七月初的一天，天气非常闷热，我随同总司令吴奇伟到达南昌，欧震已在南昌等候。一刻也未休息，我即同吴奇伟、欧震两人乘一辆敞蓬车从南昌出发，经德安马回岭到达离九江不远的庐山脚下。欧震回第四军去了，我和吴奇伟在一茅屋内住着。不久侍从副官朱某，译电员吴道香带电台一部及少数卫士乘车赶到，我们就在茅屋内设立了战斗指挥所。这时隆隆炮声从九江方向传来，我们与部队联系，才知日军第一〇六松浦师团附战车一个联队，重炮多

门，在多艘兵舰炮火掩护下，在九江强行登陆。当日深夜，张发奎率领参谋长及卫士二十余人，突然来到我们的战斗指挥所。他一进门，就说：“丢那妈好家伙，几十门军舰大炮齐向我岸上阵地开火，头也抬不起，只好后撤，脱离敌火炮射程。我已命令各军撤至沙河铺东西之线，右翼依托庐山在沙河铺、黄老门、新堰铺、范家铺之线阻击敌人向西南突进。梧生（吴奇伟字梧生），这里交给你，我回南昌去了。”谈完之后，他即连夜赶赴南昌，后来他调到曲江负责四战区，南浔线最高指挥权交给薛岳，归九战区节制，南浔前线则由第九集团军吴奇伟负责。电台架好之后，就频繁地和各军、师联系。记得划入第九集团军战斗序列的，有俞济时军团的第七十四军，李觉的第七十军，欧震的第四军，李汉魂军团的第六十五军，叶肇的第六十六军。我集团军右翼以庐山为依托，左翼衔接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的川军），在沙河一线与敌展开了战斗。战斗指挥所作如下处置：一，令总部各处人员及警卫部队附野战宪兵一连，迅速到达德安马回岭附近成立总司令部。记得总部是设在鸭咀垅一个姓熊的公馆内（据说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二，通报各军向总部联系，并严令在沙河铺一线阻击敌人南下，特别是左翼的第六十六军要顽强阻击敌人西进。三，将情况通报第三十集团军。四，令兵站分监，迅速架设南昌电话线，将弹药粮食补给，向德安输送。我们在战斗指挥所呆了几天，情况逐渐明确，沙河铺战线已基本稳定，友邻部队和受指挥的各军师也已联系上，在汉口的统帅部和薛岳司令部都能通电话了，吴奇伟带着我们战斗指挥部人员，就回到鸭咀垅司令部。

当时抗战形势是，敌人占领南京、徐州后，战略目标很明显是指向武汉，其部署是分江北、江南两兵团沿长江两岸齐头并进，采取对武汉实行南北大包围的钳形攻势，企图消灭我军主力，占领武汉，迫使国民党政府求和。从九江登陆之敌，陆续增加到三个师团之多，并附以众多的特种部队，它是敌军南岸纵队的主力，准备从瑞昌经阳新、大冶、咸宁、崇阳、通城，直扑武汉之背。我军意图

则是消灭西进敌军主力，尽量迟延敌军西进企图，使大武汉有时间做好保卫的准备工作，并在沙河铺一线，不时出击威胁敌军侧面，使其不敢放胆西进；因此敌军对我沙河一线也不时攻击，以掩护其侧翼安全，并倾其全力，向西突进。

武汉周围皆为沼泽地区，湖港甚多，山岭甚少，保卫武汉，必须在其外围阻止敌军进攻。在东北面有大别山脉，在东南面则为幕阜山脉，幕阜山南又有九岭山，修河则从两大山脉之间经武宁、柘林、永修流入鄱阳湖。敌军向西突进，必须经过幕阜山，幕阜山山高地险，乱草丛林，由西向东北而来。沿途险要之地甚多，如鲤鱼山，笔架山，万家岭，棺材山，是阻止敌人的良好阵地，当时在这一线布防的是李汉魂军团的六十五、六十六军两个军。一九三八年七月（疑为九月——编者），敌主力一〇六师团，附重炮一个联队，战车一个联队，在空军掩护下突进至万家岭附近，我六十六军进行顽强阻击，战斗在崇山峻岭中展开。武汉军令部来电，要我们将该敌消灭于万家岭地区。我和少校参谋石金格（东北人，军校同期的同学），随同吴奇伟总司令到箬溪附近一小村内六十六军司令部设立指挥所，就近指挥万家岭战斗。记得有一次来到庐山脚下草棚内，正是敌人在九江登陆的时候，敌机终日扫射轰炸。我时而在树林中隐蔽，时而进屋问吴奇伟有何指示。吴奇伟一直在屋里守着电话机，我叫他出来避一下，他笑着说：“不要紧，‘爆’（广东话炸的意思）死算了。你快去隐蔽，要留下人。”后来轰炸扫射得更厉害了，我怀疑敌人已发现我们这里是指挥所，便又跑进屋去叫他，他却伏在桌上睡着了，鼾声还不小。敌军被阻，逐渐增加兵力，集结于万家岭周围地区，我军亦将李汉魂兼辖的第六十五军投入战斗，形成对敌军包围态势。战斗越打越激烈，每个山头，每个村庄，反复争夺，一日而数易其手。敌空军每日均来轰炸助战，但有时双方相距甚近，敌机也不敢投弹。我们战斗指挥所，每日均被敌机袭击，总司令吴奇伟，军长叶肇和我们参谋人员，几罹难其中。当时前线无防空设备，听到飞机声，才由防空监视哨吹哨子报警，

每每哨音一落，人还未跑出房门，敌机已飞临头上。敌机因我缺乏高射火器，飞得很低，擦树梢而过，而其飞行员竟伸出来，将机侧飞，以观察地面目标。有一次，我和石金格跑不出去，只得卧于床板之下，敌机扫射房屋中弹，满屋硝烟呛人，所幸我们均未受伤。

被困于万家岭之敌，抱困兽犹斗之心，对我军围歼进行顽强抵抗。有几次我军已攻至其师团部附近，但是夜间攻击，也不明瞭何处是敌首脑部，天一亮敌机就来助战，我军又退回原来攻击阵地，如是者多次。后来据敌俘说：“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你们坚决前进一百公尺，松浦就被俘了或者切腹了。”万家岭之战，由于每个山头，每个家屋、村庄，都反复争夺，因此双方伤亡惨重。记得七月（疑为九月——编者）的一天，敌机十余架，在万家岭上空投下二百余，我们认为是敌以伞兵增援，后来见未继续空投，判断是补充下级指挥官，据俘虏供称，果然投下的都是排连级干部。至八月底（疑为九月底——编者），万家岭被我完全控制，残余敌人退到万家岭以东山地掘壕固守，以待援军，我军亦因要休整补充，未予追击，暂成对峙胶着状态。我军攻击万家岭时，曾通报友邻部队三十集团军，他们派了联络参谋来，我参谋处告以我军企图，要求他们协助，派有力部队，防御麒麟峰，不让敌人向西南窜逃。在马回岭正面，从庐山经黄老门、王家铺之敌，是敌的左侧掩护部队。为了掩护其主力侧翼，并保证后续部队从九江登陆继续西进，该敌经常向我发动攻击，使用部队都不大，最多以联队为单位，但飞机则天天向南浔线进行轰炸，炮兵亦经常向我阵地轰击。我军当时是以确保德安以北防线不使敌进逼南昌为目的，故在这条线上，每天都有战斗。

值得记述的是我军右翼，依托庐山，监视鄱阳湖湖面敌人动态，守军为七十四军、七十军，俞济时任军团长。七十四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辖五十一师王耀武，五十八师冯圣法。大概在八月初，狂妄的敌人以一个加强营兵力，从鄱阳湖登陆沿庐山东面向上

攀登，妄图袭我之背。当他们爬至三角尖张鼓峰、香炉峰半腰一块平地时，竟敢架枪做饭。不意这一企图，被我发觉，我军驻守庐山三高地的一个团，把全团火力集中，布成火网，待敌军造饭时，一声令下，炮弹枪弹倾盆而下，将退路封锁，敌军措手不及，战斗约几小时，敌全大队五百余人，无一漏网，悉数就歼。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在黄老门前线的为第四军的五十九、九十、一〇二等三个师，左翼为第三师，在丘陵地带与敌周旋。再向左就是打万家岭的六十五、六十六军了。记得第三师有一个连长叫陈德生，四川人，军校十期学生，善于打逆袭战。敌人攻击时，他把部队撤至反斜面，待敌攻上来立足未稳，他就进行逆袭把敌人打下去，这样避免了在敌人炮击时在山头挨打，减少伤亡。在逆袭前先组织好火力，把敌人打下去，又居高临下射击，杀伤许多敌人。这个打法要指挥员沉着、机智、大胆、勇敢，特别是要抓住逆袭时机，士兵也要斗志旺盛，我们总司令部表扬了陈德生。

赣江北支流，多半是自西而东沿幕阜山脉而流入鄱阳湖。七八月（疑为九、十月——编者）间，天气炎热，残暴的敌人把死尸放在阵地上，杀了居民的猪，摆在地上一两天，人尸、猪尸全部腐烂，敌人便抛于河中，敌人在上游，我军要吃下游的水，一股尸臭实难饮用，但将士们也挺过来了。敌军还在七十军正面使用毒气，我军士兵，中毒后昏迷，又无防毒面具，只有用毛巾打湿后捂住嘴鼻，顽强战斗。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不顾前方十几万将士在拼命杀敌，竟下令南昌以北各县破坏南浔公路（南浔铁路已不通车了），致使运输发生问题，军粮运不上来，一个短时期内，我们靠吃庐山脚下老百姓种的南瓜度日，我军将士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奋勇杀敌的。

南浔线上空曾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空战。当时苏联志愿空军，常常出击敌人，有一次在德安附近上空，与日机遭遇，发生空战，我方有几架飞机负伤，飞行员跳伞，而人民群众分辨不出谁是敌机，谁是我机，见着跳伞的就认为是敌人，开枪射击，等伞落下，才看

见不是日本人，打着了自己人和朋友。后来才在志愿空军（包括后来美空军）飞行员身上穿一件背心，前后用大字写“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避免误会。

名记者刘尊棋曾率领一个慰问团到九集团军总部慰问，专门到参谋处采访。当时九集团军参谋处，全是年轻人，他看见我们满屋都是作战地图，上面标志着敌我态势、部队番号，电话不停地在响，一种紧张气氛，他称我们是九集团首脑部，给我们照相，合影留念，可惜这些珍贵纪念物，都荡然无存了。

万家岭战役历时一个多月（1938年9——10月），歼敌松浦师团及附属特种部队等三万余人，这是继台儿庄会战胜利之后，武汉外围阻击战的又一次胜利，为此，武汉举行了游行庆祝。可惜我军采取单纯防守战略，没有积极进攻，趁战胜之机，把敌人赶下长江，而只是守着阵地，致敌人从容增兵。敌第九师团在富池口附近登陆，八月（疑为十月——编者）下旬敌人从九江增援了部队，派出大量骑兵，从九集团军与三十集团军地境线空隙处突进。一天，敌突至我总司令部附近，威胁我整个后方联络线，警卫营长王坦（四川人）来报告，子弹已落到总部门口，警卫营拉上去了，建议迅速撤退。我们先向前线各军师发出撤退命令，叫他们自行选择路线，撤至修河之线进行防守。参谋处于夜间十二时撤退。翌日下午我们到达了涂家埠，各军师也逐渐撤至预定地区，沿修河建立了一条防线，由间隙突进之敌骑兵部队，转向三十集团军右翼进行威胁，三十集团军也跟着后撤，这时敌人目的已达，增兵也到，即继续沿长江两岸突进，对武汉作南面包围。后来六十六军同事告诉我，他们撤出又经过万家岭，遍地尸骨垒垒，多数土堆上插一木牌，上书日军死亡将校士兵名字。这些侵略军，葬身异域，暴尸山野，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疑为十一月初——编者），第九集团军奉命增援广东，原因是广州失守，韶关设立了第四战区，张发奎为司

（下转第44页）

回忆长沙会战的赣北战役

王仲模

一九三九年四月，占领赣北的日军进攻高安失败后，与我军在锦江北岸亘虬岭之线，成对峙状态，为期半载。敌为策应其进攻长沙，复开始蠢动，向我高安、会埠方面进犯。我第七十四军自前次克服高安，于七月下旬将高安防务交给第三十二军后，开赴分宜、上高、万载等处整训。九月十六日又奉令以五十一师向会埠、上富推进，堵击由奉新西犯之敌。第五十七师推进至水北街，第五十八师推进至东港各附近地区待命。军部进至上高，第五十一师已先后到达指定地区。是时敌步骑兵千余，已进占伍桥何、村前街。我三十二军当面之敌，已进占高安、石脑圩、龙团圩各附近。奉新以西之敌，已窜至罗坊、上富附近，情势甚为紧张。旋奉令第五十一师归还建制。该师即占领右自石头街、泗溪、胡家渡、棠浦及以北之线，掩护友军转进。九月十八日，第五十八师由万载到达泗溪、东港后，即接替第五十一师石头街亘泗溪、坑口冷之线阵地。另以一团进占杨公圩附近高地。第五十七师因尚在点验，以一团进抵水北街，军部即向上高推进。

九月十九日，我五十一师将村前街之敌驱逐后，当即占领村前街。第五十七师即转向上高以南水口圩集结。复奉令右联系三十二军应占领青浦、泗溪、官桥街至棠浦北侧高地之线，当令第五十八师占领青浦至坑口冷（不含）之线阵地。第五十一师占领坑口冷至棠浦北侧高地之线阵地，并于杂树下、花桥各派一部警戒。九月二十日，另以五十八师之一团占领杨公圩、牛家山、磨子岭亘龙王岭线之前进据点。以五十一师之一团占领曾家山、虎形山、大石岭、凤

凰山之线阵地。第五十七师已到达水口圩及城坡圩附近，军部进至上高之董村。

九月二十二日，南山何、斜桥、城岭附近敌之警戒部队，被我五十一师所部驱逐，乃退据伍桥何附近。九月二十三日奉总部电告，我第三十二军已克复高安。第七十四军应派一部以村前街为基点，确保南山何、院前邹庄、店前各要点。当令五十一师确保前记之线，军部于是日推进上高东北下陂新屋。九月二十四日奉令，五十一师应右联系三十二军占领南山何（不含）、院前邹庄、店前、李家山之线，准备向车坪方面之敌攻击，并协力会攻会埠之敌，并相机进占白鹭桥、仙女寨之线对北警戒，确保下观、富楼、幸家至包公庙各要点；左与一八三师切实取得联系，五十八师即占领泗溪，左起棠浦以西之既设阵地，其青浦至泗溪间阵地，另派队扼守，进驻花桥之一营，待一八四师到达后，应以一部留置周庄监视上富之敌情，余归还建制，五十七师应由水口圩推进至东港附近。

旋又奉令：（一）由会埠、治城西犯之敌约千余刻在上富附近与我六十军一八三师对战中；（二）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即由东港出发限有（二十五日）午到达花桥、山田桥附近，宿日（二十六日）开始向上富治城之敌侧击，协同六十军将该敌歼灭而占领之。军奉令后，即变更部署如下：

（一）第五十七师即由东港开始行动限有（二十五日）子到达花桥、山田桥附近。宿（二十六）日开始向上富攻击，协同六十军务将该敌歼灭而占领之，左与第一集团军切实取得联络。

（二）第五十一师应以有力一部，位于下观附近，策应五十七师之进攻，其余仍服原任务。

（三）第五十八师现在山田桥之一营，应确实掩护五十七师之开进，尔后仍位于花桥，其余仍服原任务。

（四）军部即推进至棠浦。

九月二十五日得知情况，由甘坊西窜之敌，经我六十军一部及一〇五师夹击，现退至治城、甘坊附近，上富、罗坊间有敌二千余，

与我一八四师一部在长里源激战中。下午五时第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李琰所率之一六九团及一七〇团已到达山田桥附近，当晚即展开于花门楼左右高地之线搜索前进。五十ー师当面之敌五百余人，经我痛击后，仍退据伍桥河、王家脑附近顽抗。

九月二十六日，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及一七〇团于本日拂晓向上富攻击前进。将敌之警戒部队驱逐后，已进占枫树坳、天马山、虎形山及4710高地之线。至下午三时与千余之敌于铜鼓山、旂山、马形山、包公庄各要点展开空前血战。第五十一师当面之敌，本日以炮火掩护，向我李家山、以易山、樟树岭之线进犯，均经我击溃，我乘胜曾一度攻占伍桥何。后因敌增援反攻，遂退回原阵地，第五十八师仍占领原阵地。下午奉令：第五十一师、五十七师仍履行原任务，第五十八师应在官桥街附近集结待命。九月二十七日给予各部队命令要旨：（一）第五十一师除占领南山何、店前、幸家之线拒敌西犯外，应右与四十九军切实取得联系，并以有力一部向会埠、车坪之敌压迫。其茅树坪之一营猛烈截击罗坊之敌，相机占领之。（二）第五十七师应努力歼灭当面之敌，确保上富、治城之线。（三）第五十八师应以主力集结官桥街附近，一部于棠浦、泗溪附近待命。本日伍桥何方面之敌约步兵三、四百，炮四门，自晨至暮向我六千岭阵地攻击，均被我击退。我进攻罗坊补充团之一营将上下茅坪之敌击退，已占领河南岸各高地。第五十七师之一六九团及一七〇团本日进击，已占领上富河南岸各要点，准备渡河再兴攻击。

九月二十九日奉令：第五十七师应以一部在上富、治城之间向敌佯攻，竭力阻敌西犯。以主力由桐纸山、毛祖源攻占横桥，腰击该敌，相机协助六十军解决甘坊之敌。九月三十日下午，第五十七师之一七一团由大冈、江口桥地区进击。当晚将下南岭、竹林山之敌警戒部队驱逐后，即冲入横桥与敌发生激烈巷战。至十月一日二时，该团完全占领横桥及以北高地之线。上富方面之敌，仍据上富河北岸桥头阵地顽抗，经我数次进攻、迄未奏效。伍桥河之敌，

经五十一师猛攻后，形成对峙态势。

十月二日，军奉令以五十七师速将上富、横桥以北之敌击溃后，除留一部于原阵地外，以主力占领山田桥、同安市之线，掩护五十一师之转用。第五十一师将现阵地交四十九军后，应集结宜丰、上高间地区待命。第五十八师即开万载以西株潭附近集结。另派一部位于桐木，对铜鼓东门市方向警戒。十月四日，五十一师交防一〇五师接替后，当晚即集结于宜丰以东地区。五十七师之一部，仍于上富河南岸与敌对战中。五十八师先后到达万载附近，军部移驻宜丰城南石龙寺。十月五日，奉令以五十一师集结同安市，五十八师由万载向宜丰西端集结。当日五十一师即以一部接替第一集团军横桥、甘坊、龟山线防务，主力进击于仰坪、下求庄附近，准备攻击石溪、九仙汤之敌。第五十八师一部已由万载到达芳塘，其余正向茜湖咀集结中。十月六日晨，第五十一所将大源坳、桐柘约二百余之敌驱逐后，已抵大源坳、桐柘。第五十八师完全到达宜丰以西地区，军部推进至棠浦。

十月七、八两日，第五十一师于坳下吴庄、龙头匪、袁家、谢家坑、刘庄、朱梓桐之线，与陆空联合二千余之敌，血战至两昼夜，于七日晨卒将要地九仙汤克复。八日拂晓，敌由邱家街方面增援，步炮联合约四千余之敌，向我猛烈反攻，赖我官兵忠勇用命，以前仆后继誓死奋斗精神，卒将进犯之敌击溃。我遂占九仙汤以东中阳坪、罗家坳各要点。第五十七师自七日起，以全力进击上富河北岸之敌，另以一部由鹅婆岭及上富右侧渡河逐次将敌围困于狮子山、爬头山附近。八日，敌陆续增援，并施放毒气及空军掩护向我反攻，企图突围东窜，被我歼灭颇众，残敌退据白石岭一带。

十月九日，第五十一师一部向敌进击，已进占仰山街。十月十日，以五十一师一团沿九上公路，向南压迫。五十七师补充团一部向田谢庄迂回，将敌包围歼灭殆尽，我完全占领上富以北山地。同时，五十一师已进占邱家街、仰山街。

十月十一日，以五十七师一部接替仰山街守备。五十一师集结

于李庄、下堡桥头、九仙汤附近。本日得知情况如下：（一）进犯湘北之敌，已被我各个击破，现向新墙河北岸溃退，战区主力已进至平江、长乐街、黄沙街以北地区。我三十二军一三九师正向石门楼挺进中。旋奉令以第五十一师于十二日拂晓展开于天子脑、盖田、老屋之线，进出会埠以北地区，协力四十九军一〇五师聚歼会埠之敌而占领之。

十月十三日，第五十一师已到达指定地区，协力第一〇五师攻克会埠。当晚奉令，该军以一师以会埠为基点，协同第四十九军向奉新之敌进攻。十月十三日，即以五十师两团于月形山、岑贩山、曾家脑之线，向奉新挺进。午刻，该师一团已渡过潦河支流。据守秋坑、杨梅坳敌之警戒部队被我驱逐。第五十七师已集结于上富附近，第五十八师由宜丰向棠浦集结。

十月十四日，第五十一师攻占白马庙、张岐山、从九山，劳山各高地。敌一部退据鹅掌山、沥里徐，大部溃据五步城、狮子山、廖家山、蒋家坪之线既设阵地顽抗，我继续攻击，于午后即占领万家脑、结子山、港口游、后林陈各要点，逐次压迫当面之敌。另以一部向干洲街挺进，仍与敌激战于义门第、法济寺、龙仲头附近。十五、十六两日，敌猛力反攻，于白马庙、万寿宫、结子山、李公脑之线发生激战，继犯我从九山、鹅掌山阵地，均未得逞。

十六日八时，敌向我右翼第一〇五师阵地反攻，被突入白塔、徐铺头赵附近高地。十月十七日，敌继续攻陷麦木江邹、长头凌一带高地。同时敌一部向我结子山、下浊江头、港口游、后林陈阵地进犯，均被我击退。本日五十八师推进至罗坊附近。旋令第一〇五师归本军指挥，并以五十师主力，协同围歼当面之敌。十月十八日，五十师以全力向敌实行猛攻，与一〇五师取夹击姿态，将突入之敌击溃，敌向东逃窜。我遂克复上下李、长头坡、麦木江邹之线。第五十八师奉令彻底破坏罗坊东坪段公路。十月十九日，右翼四十九军当面之敌，向我高安方面企图反攻。第一〇五师奉令归还建制，本军以五十师即占领上下翟、官材山至桃家塅之线阵地构

筑工事，相机攻取奉新，时第五十七师已到达棠浦集结。旋奉令：

(一)旬日以来，敌在上富、九仙汤一带被我击溃后，近已退据奉新、靖安地区，似图确保九月中旬以前阵地模样。(二)第七十四军将防务交代后即开上高、官桥街、棠浦一带集结。十月二十日，五十八师将罗坊至车坪公路破坏已毕，于本日向棠浦集结。十月二十三日，五十师将防务交三十二军接替完毕，本晚开始向上高磻村移动。时五十七师已到达水北街，军部移驻洞村，于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本军参加赣北作战，遂告终结。

附参加此次作战的敌军兵力及指挥官姓名：

敌一〇六师团第一四五联队第一四七联队各一部附炮十余门，骑兵一大队，该师团长为中井良太郎，一四五联队长池田直三，一四七联队长园田良夫。

敌军伤亡概数：

我第五十一师方面

(一)村前街、伍何桥之役：击伤敌军官约五名，士兵二百余，击毙敌军官三名，士兵百余名。

(二)九仙汤之役：击伤敌军官二十余名，士兵五百三十余名，击毙敌军官十余名，士兵三百余名，击毙马十余匹。

(三)奉新攻击之役：击伤敌军官十余名，士兵三百余名，击毙敌军官约十名，士兵二百余名，击毙马约十匹。

我第五十七师方面

(一)上富镇之役：击伤敌军官三十多名，士兵六百余名，击毙敌军官数名，士兵五百余名，伤毙敌军马百余匹。

(二)横桥之役：击伤敌军官十余名，士兵百余名，击毙敌军官数名，士兵七十余名，毙伤军马二十余匹。

获得战利品共有轻、重机枪八挺，长短枪一百二十八枝，掷弹筒九只，战刀、钢盔、太阳旗（即上书武运长久旗）等甚多。

结 束 语

赣北多山，层峦叠嶂，密林蔽天，其间，九仙汤附近，标高较高，地形复杂，荆棘丛生。此次敌军进犯，其战略目的是与湘北之敌会合，达到攻略长沙的目的。时属抗战前期，政治上比较开放，在军队中，同仇敌忾，因而在局部战斗中，表现英勇无前。如十月七日拂晓，五十一师一五三团一部，迂回至敌九仙汤左侧高地，敌感威胁。同时，五十一师一五一团于八时三十分攻占珠樟岗，遂于九仙汤东南展开激战。困守坳下、吴庄之敌，陆续向九仙汤溃退，我军乘胜追至九仙汤西端高地。集中炮火向九仙汤射击，官兵奋不顾身，克服仰攻困难，反复肉搏，于九时三十分，完全收复九仙汤。九仙汤是赣北有名温泉，事后打扫战场，温泉中死尸不少。

战斗结束后，军委会，第九战区长官部，十九集团军总部，纷纷来电表彰，有功官兵三百五十二人，受到不同奖赏，负伤住院官兵，由军部组织了慰问团慰问。

作者附言：一、文中在电令中的“有”“宥”等字，是当时公文中采用诗韵韵目，代替日期的习惯代用字。

二、原第七十四军参谋处科长吴翥同志曾帮助回忆写成此文，谨此致谢。

回 忆 武 宁 阻 击 战

陈 德 邵

一九三八年秋，日军向武汉进犯的同时，另以一部沿赣鄂公路前进，妄图从鄂南包围武汉，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以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指挥第三师，于江西武宁县东北罗盘山、棺材山地区阻敌西进。由于敌众我寡，蒋介石令杨森加派一个师受李玉堂指挥，杨森转令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域率领该师，由醴陵出发，经浏阳、铜鼓、修水至武宁、蒲田、大桥各附近集结，此时已是八月下旬了。罗盘山、棺材山战斗要地，已陷敌手。军长李玉堂令一三三师向该两山进攻。由于日军武器精良，又居高临下，我三九七旅屡攻受挫。师长杨汉域乃改用白天固守要点，夜间猛袭的战术，几次攻下罗盘山、棺材山。但次日敌军用重炮轰炸后，猛烈反攻，在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几次得而复失，形成拉锯式战斗。杨汉域另以三九九旅七九七团（团长陈亲民）由罗盘山以西，经过第三师阵地，攻击日军侧背。三九七旅同时向当面之敌佯攻牵制敌人。陈亲民团乘敌不意，初战重创日军，午后日军集中优势步骑兵在炮兵掩护下，向陈团反扑，副团长滕君甫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部队一度后退。杨汉域即令通讯连连长陈德邵（兼代参谋）率领该连冲锋枪排，前往督战。陈德邵立即执行，并亲往第三师联系，请其协同陈亲民团围歼侵入山谷日军。经两部共同努力，激战约一小时，日兵即狼狈溃逃，陈团入夜返回原防。继因三九七旅伤亡过大，杨汉域以三九九旅接守该旅阵地。该旅采用坚守要点，入夜以精锐小部队分道奇袭强弩之末的日军的战法，使无力再犯。最后一三三师在军长李玉堂的领导和第三师的配合下，经过二十五昼夜浴血奋战，终于重创日军，从而粉碎

追忆血战高安

毛羽芳

一九四〇年（疑为一九四一年——编者）春天，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并附有飞机、坦克、大炮，大举侵犯奉新、高安、上高等县。当时我是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第一营一连连长。

我师一七四团在高安县上富、罗坊一线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师长冯圣法命令一七三团担任攻击罗坊，歼灭入侵之敌的任务。团长蔡人俸命令一、三两营在二十四小时内歼灭入侵罗坊之敌。营部命令我连在当晚拂晓前攻占罗坊左侧梧桐岭。深夜十一时，我连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十一时三十分，团部信号弹飞上天空，全线吹响打

其从鄂南包围武汉的阴谋，完成了任务。后由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接防，一三三师回湖南平江，归还建制，整顿补充。在二十五昼夜激战中，师长杨汉域因病请假两天，由旅长周翰熙代理指挥，亲临前线被围，旅警卫排长周汝火为掩护周翰熙，壮烈牺牲。景嘉谋营因战绩卓著，景营长被升为七九三团团长。连长任怡、吴天佑、许怀安等负伤后，坚持指挥作战，直至稳定战局，才离战场，战后均获勋章。是役一三三师伤亡之大，仅次于上海战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负伤团长周炳文、徐昭鉴；营长周拱言、刘占雨、许忠云、田阡陌、向有余等；连长任怡、许怀安、冯灿、吴天佑、唐时信、唐巍等。阵亡副团长滕君甫、团附黄建中、营长卢光荣、连长周代尧、晏华章、唐勋、曹宇江、王大宣、李永命、排长周汝火等，士兵伤亡约六百余人。

冲锋号，喊杀声、爆炸声震天动地。就在这时，我率领一、二两排向梧桐岭冲杀，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梧桐岭的左侧山峰已被我连全部占领。

在打扫战场中，我们发现日军遗尸十余具，还缴获敌铁把轻机枪两挺，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我一排排长王文森身负轻伤，一班长肖子芳阵亡，战士阵亡三人，伤五人。我随即命令全连官兵抢修已被我军炮火所破坏的工事，准备抵御敌人反扑。

三时左右，我发现我营二连在梧桐岭右侧被敌人轻重机枪的火力控制，无法强行夺取右侧主峰，我即命令副连长陈壬成指挥第一排坚守阵地，我率领其余部队向二连正面之敌的侧翼出击冲杀。由于黑夜中短兵相接，日军飞机、大炮无法配合作战，只有以刺刀相对拼杀，致使敌人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二连长率领全连官兵在我连发起冲锋的掩护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以同仇敌忾、誓雪国耻的战斗精神，勇猛杀敌，双方展开肉搏战。经过约两小时反复搏斗拼杀，终于将梧桐岭的日军全部击溃，敌军大部随即向上富方向逃跑。

我一、二两连官兵胜利会师，面面相对，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有日军的污血。清点人数，方知二连副连长和第一排排长阵亡，二连伤亡人数已超过一半，全连剩下官兵仅有八十余人；我连二排排长吕得芳阵亡，我在战斗将要结束之际，左腿被日军步枪弹射穿重伤，全连官兵共伤亡三十余人。日军在梧桐岭共遗尸八十余具，我连共缴获日气冷式重机枪两挺，掷弹筒十余具，长短枪四十余支。

东方将要发白，蔡团长、陈营长已登上梧桐岭最高峰，详细询问一、二两连官兵战斗经过和伤亡情况，并向全体官兵亲切慰问嘉勉，还发给了慰问金。随即命令卫生队将所有负伤官兵护送后方医院。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供稿)

扼守盘豆镇和潼关的回忆

乐 典

一

国民党军七十八师，原是第一师分出来的一个旅，扩编成师。七十八师的番号原属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在福建被蒋介石消灭后，即刻将七十八师番号交给胡宗南扩编第一师为第一军，所以七十八师实际是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并不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改编的。该师是甲种师的编制，有步兵三个团，番号是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师直属部队有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搜索连（即骑兵连，后来取消了）、特务连、通信连、输送连、卫生队、迫击炮营（后分属各团）、防毒排等；武器装备比较齐全，是胡宗南最基本的王牌师。抗战初期，该师曾参加过上海战役，后来撤到陕西归第八战区指挥，从此没有离开过陕西省境。

胡宗南先任第三十四兵团总司令，总司令部驻西安南关小雁塔庙内，后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另组副司令长官部，仍驻小雁塔庙内。当时日军已侵占山西全省主要城市，前锋进到黄河东岸、北岸。胡宗南即以第一军第一师扼守潼关一带；第一军第一六七师扼守朝邑一带，与日军隔河对峙；第一军第七十八师控制在华县赤水镇附近，作为机动部队，加强训练；第一军军部则驻在华县县城及其附近。

一九四二年二月，胡宗南调我到第七十八师担任少将参谋长，师长是许良玉。我长期在国民党军事教育机关工作，对国民党的军事教育和军事动作，特别是德国军事动作比较熟练，经验比较丰富。因此，我到七十八师后，即协助师长，将军校一套训练方法和器材设备，全部搬到七十八师来，开始在七十八师驻地赤水镇附近兴修住

地，设置各种演习模型场：如步兵战斗演习模型场，炮兵战斗演习模型场，工兵演习模型场，通讯设施模型场，辎重运输模型场，战时卫生设施（如开设绷带所、野战医院、伤病兵后送顺序等）模型场等；又租用民田荒地，设立各种实兵演习场，如战斗射击场，班、排实兵实弹演习场，对钢筋水泥工事突击演习场，手榴弹实弹投掷场，对空射击场，刺杀演习场，炮兵小口径射击场（将步枪管装入炮筒内，练习近距离瞄准射击）等等。令各部队到各演习场轮流演习训练，收获很大。

师长请胡宗南到七十八师视察检阅数次，大为满意。即转报蒋介石、何应钦（何当时任总参谋长），何应钦又通知长江以北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派出参观团到七十八师参观学习。在两年中，先后到七十八师检阅、参观的，计有白崇禧（副总参谋长）、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孙连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各军师长率领的参观团，亦络绎不绝。蒋介石还指示外交部邀请英国议会代表访华团，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先后到七十八师参观，以显示中国军事力量，谋求取得美、英两国的援助。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十八师移驻宝鸡渭河南岸的姬家店营房内。继续加强训练，并成立校尉班，轮训营以下军官。

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日军突然调集五、六万侵略军对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发动猛烈进攻。该处国民党守军主要是汤恩伯的部队，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驻在洛阳，汤恩伯是副司令长官，他所指挥的部队是第一战区的主力军，也可说是第一战区的支柱。但日军从四月十七日发动进攻开始，很快就突破了平汉路防线，四月二十二日郑州失陷，五月一日许昌失陷，五月九日驻马店失陷。汤恩伯部队逐步向豫西南方向败退。五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了洛阳，蒋鼎文仓惶西逃，听说逃跑时，鞋子都掉了一只，只穿上一只鞋子，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因此，蒋鼎文痛恨汤恩伯，

说他自动向豫西南撤退，没有向蒋鼎文报告，以致长官部来不及准备，即在慌乱中撤退，损失很大。

日军占领洛阳后，向西跟踪追击，很快攻陷陕西，突进到灵宝县。胡宗南急命第一军张军长指挥一六七师，占领函谷关及虢略镇迤南之线，阻击敌人，并命七十八师由宝鸡乘火车疾速开赴潼关增援，以防日军进袭潼关。于是七十八师顿时转入战斗状态，补充粮弹后，即乘军用专车开赴潼关。

一

大约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六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七十八师开到潼关西站下车，即向潼关南原疾进，通过老虎章以东一条大深沟（由秦岭太峪流出的一条小溪，北流经潼关东门外流入黄河），即在沟东集结、做饭。时师长许良玉尚在西安向副长官部请示，未到。晚餐后，由我根据当前情况，将部队展开在太峪镇以东到阙底镇之线，命二三二团在右，二三三团在左，二三四团为师预备队，立即选择地形构筑阵地，并向前方一千五百公尺处选择地形，派出警戒部队，构筑警戒阵地。炮兵营在东沟东北高地后方占领阵地，对阙底镇以东铁路两侧及原上大道两侧准备射击（当时根据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各部队的阵地位置及任务均有详细指示，现在地名记不清楚了），工兵营分派部队协助各团构筑掩蔽工事及师指挥所工事，师指挥所位置在沟东小村庄内。各部队展开后。当晚即开始构筑工事，重要的地方架设铁丝网。这里的地形，阵地右翼是一洼地，受前面秦岭山脉向北伸出的一座高山的瞰制，若敌人占领前面高山，则我全阵地都受到控制，尤其右翼阵地站脚不住。阵地中央是一高原突出部（在下面看是丘陵高地，到了上面又是平地，这就叫原或高原）可以瞰制前面铁路及大道两侧，又是有利地形，但阵地左翼阙底镇附近又在高原之下，地势平坦，利于敌人坦克活动。

次日，师长来到，我们同几个团长到实地勘察，对阵地和机关

枪的具体位置作了一些修正。命令继续加强工事，阻绝阵地前的公路、大道，提高警惕，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过了两天，我师又奉命向东推进了十余里，这里地形较好，立即命令各部队构筑工事。这时，前方退下来的伤病官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通过我们阵地线，我们便在公路和大道扼要处设检查站，没有证明的不准通过，以防敌探混入和逃兵。接前线通报，我军一六七师扼守函谷关至虢略镇的阵地右翼，在日军步炮坦克协同猛攻下曾被突破，我右团指挥所被冲击转移，后经我一六七师组织预备队进行反攻，才将日军击退。后来这个右翼团团长贺一持以失守阵地被胡宗南枪毙了。

从此以后，日军即退守陕州，派出一个步兵连（营）盘据在虢略镇以东的险山庙，在山顶建立一个坚强据点，死守不退。

这样，前线情况比较稳定，军部即命令七十八师推进到盘豆镇及其以南至喊山之线，构筑坚固工事，作为战守准备。

盘豆镇属于河南省境，东距阌乡县城三十里，西距潼关县城六十里，北濒黄河，河北岸为日军控制区，河岸高陡，没有渡口，南抵秦岭山脉的喊山约二十余里，喊山高耸绝壁悬崖，难以攀登。喊山东麓有一条小溪，曲折北流到盘豆镇西北汇入黄河，溪水所经，形成一条小河谷，我们即利用这条小河谷的西岸作为阵地前沿，构筑工事。当时我师配属有工兵第三团担任钢筋水泥工事的构筑和钢丝网的架设，配属炮兵第十一团（12公分榴弹炮），炮兵第五十二团（57战防炮，专防敌人坦克）加强我师防御火力。当即拟订盘豆镇防御配备及工事构筑计划，报请副长官部批准，然后征集木料向后勤部门请领钢筋、水泥、木板、有刺铁丝等，开始构筑半永久性阵地。

阵地正面共约十公里，于是配置一个师，必要时增加两个师，在第一线（主阵地）配置两个团；第二线（预备阵地）配置一个团。各线阵地由散兵壕、各种火器掩体及交通壕、铁丝网、外壕等组成。在第一线计划构筑二十四个钢筋水泥重机关枪掩体（堡垒式的，包括纵深的重机关枪掩体在内），及若干轻重掩蔽部。还利用

村庄及高地构筑四个堡寨式的据点，即在村庄外围或高地顶端，挖掘深宽各四五公尺的外壕，将外壕取出的土，堆积在外壕的内部，形成一道高数公尺，厚一、二公尺的围墙，围墙四角构筑重机关枪掩体，实行侧射斜射，围墙上构筑步枪兵和轻机关枪兵的掩体，围墙内部构筑掩蔽部，一个据点内配备一排至一连的兵力，作为第一线阵地的支撑。在第一线阵地前方和据点外围架设铁丝网，并准备埋设地雷。又在第一线阵地的前方约一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大道的拐弯处，南北排列着两个村庄，相隔一千公尺，在此构筑了两个前进据点，同样挖掘外壕，筑成围墙，以阻止敌人过早接近我主阵地。前进据点以炮兵火力进行掩护。

士兵们经过约半年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阵地的工事，并修筑了阵地后方的交通要道，使之能通行汽车、炮车、辎重大车。然后令各团进行进入阵地和防御战斗的演习，及夜间战斗演习。副长官部还通知河防各军师组织参观团到七十八师参观盘豆镇阵地的构成、设施和防御计划，请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计划，加强工事，使阵地更加巩固，计划更加周密，以确保潼关的安全。但是参观将领只是赞扬，很少提出修改意见。我师只好自己群策群力，反复研究敌情，反复进行防御战斗演习，从而总结经验，不断加强阵地工事。

三

第七十八师在盘豆镇及其迤南构筑坚固阵地，并作好战守准备，约达十个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间，奉命撤回潼关，接替第一师扼守潼关河防的任务。

潼关是陕西关中第一重门户，号称百二雄关，自古以来即视为军事上的重要关隘。由河南进攻陕西关中有两条路，一是由潼关攻入，一是由武关攻入，两条道路都很重要，尤其是自陇海铁路通车后，潼关扼陇海铁路进入陕甘两省的咽喉，更为重要。

潼关县城北临黄河，南倚秦岭。滔滔黄河，自禹门口奔流南下，

一泻千里(实际有数百里)到达潼关西部，即折向东流，水势汹涌，曾多次冲垮潼关城墙的西北角，几经修复，城墙西北部仍不稳固。

潼关城隔河相望有一丘陵，名为风陵，其下即风陵渡，是山西到潼关、河南的重要渡口，抗战时已经封锁、禁绝由此过渡。潼关城的东边、南边、西南都是高山，潼关处高原的北缘。因为在潼关城内向南仰望是高山，但爬上山顶又是平原，即所谓潼关南原。南原有一道大深沟，沟中有一条小溪，经秦岭太峪北流入黄河，把南原分割成东西两部分，限制了东西方的交通。

潼关的东门石刻“第一关”三个大字，关外山势高耸，只有一条隘路通向火车站，陇海路到此要通过三个大山洞(隧道)，到了潼关城内的南门附近，才出山洞，向西进入关中平原。所以潼关城内，东南部是山地，无居民。北部、西部是平地，有街道、商店、居民。

日军占领风陵渡后，设炮兵阵地在村附近(在风陵渡北边约五、六里)，专门对我陇海铁路往来火车射击。因此，火车通过潼关，要在夜晚，叫做闯关。

第一师原来在潼关黄河南岸，构筑有河防阵地，南原北缘构筑第二线阵地，南原老虎章北部构筑榴弹炮兵阵地，设炮兵观察所于潼关南门外的高地上，此地较黄河北岸的风陵要高，可以瞰制北岸，对日军的炮兵阵地看得很清楚，日军炮兵向我火车射击，我炮兵有时也还击，但为了节省炮弹，射击是有限度的。河防工事的重点，在潼关东门外黄河南岸的河滩上，正对风陵渡。这里构筑了一个营的防御阵地，所有散兵壕、交通壕，各种火器掩体，及营连长指挥所全部工事均有掩盖，阵地内并设有战士俱乐部。阵地外面，全部用草皮伪装。我们从交通壕入口处进去，如果没有阵地守备官兵引导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大有进入诸葛亮所设置的“八阵图”中，有进难出的情况。又在渭河流入黄河的河口处，设有乱藤、铁丝网，以堵塞河口，防止敌艇窜入。

七十八师接替第一师的防守潼关任务后，大体按照第一师的部署配置兵力：以二三三团守备潼关城及风陵渡口的南岸阵地；以二

三二团驻守筠庄附近，守备渭河口至潼关西关（不含）之线（以后二三二团曾互换防区）；以二三四团守备潼关东门外的火车站至阌底镇之线。炮兵阵地及观察所仍在原处，师指挥所在老虎章。

我师接替潼关防务后，即详细勘察附近地形及阵地构筑情况，加派便衣谍报员偷渡河北，侦察当面敌情，研究情况，重新拟定潼关守备计划。分令各团加强工事，演习和熟练防御战斗动作，提高警惕，加强警戒。这时黄河北岸的日军没有发现变化，炮兵也没有向我方及火车射击，两岸沉寂。

大约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美国派遣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为了准备向侵华日军发动反攻，经中国统帅部同意，将来西安视察战地情况。胡宗南得知后，立即通知七十八师拟定视察项目，作好一切准备。过了几天，胡宗南陪同魏德迈将军来到潼关，先招待在潼关城内司令部大厅中休息，次由我挂好预先绘好的敌我态势图，向魏德迈和胡宗南汇报当面敌情及我师兵力配备和防御阵地设备情况，魏德迈听了后提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予以答复，魏德迈表示赞赏。魏德迈问我有无抓到日军俘虏？我说抓到两个俘虏。他叫我带来审问一下，我即把由后方俘虏营中调来的两个日军俘虏带到大厅请他审问，这两个日军俘虏不知何时何地抓到的，根本不了解黄河北岸的日军情况，所以答非所问，最后一声不吭。幸而胡宗南带来的英日语翻译事先交代好了，从中掩盖作假翻译，魏德迈看到问不出什么情况，即命带出不问了。

接着请他视察风陵渡南岸阵地，由该阵地守备营长缪银和引导说明，魏德迈当场作了一些指示，并说可参考美军筑城教材，缪营长说，我们没有美军筑城教材，魏德迈回重庆后，立刻寄来一本美军筑城教材，交缪营长参照修改一部分工事。是日中午，请魏德迈在“战地酒保”（即战地酒吧）中餐。这个酒保，是过去为招待外宾而临时设立的，有外宾来，即从西安请来著名厨师及年青秀丽的女服务员（一律穿白色工作服，其中有人能说英语，都是事先培训好的）到潼关来担任接待，外宾走了，她（他）们也回西安。魏

德迈看了，很觉惊奇，认为中国战场上也有“战地酒保”，这是没有听说的。其实他不知这是哄骗外国人的花样，中国战地官兵是享受不到这种优裕生活的。

下午，我们请魏德迈参观一场小部队的实弹进攻演习，地点在南原老虎章东南，该地原有一个废弃的钢筋水泥地堡（重机关枪掩体），四周围以铁丝网，我们即以此为进攻目标，组织一个加强排进攻，其中包括一个步兵排，配属火箭筒一个，战防炮一门，火焰喷射器一具，工兵一班。演习前，在参观地点，设置一个现地沙盘，在沙盘上，用兵棋摆好进攻地堡的战斗经过。魏德迈到达参观地点后，先由我在沙盘上介绍演习计划，然后吹号演习开始，一时枪炮齐鸣，假设敌在地堡内的机关枪也不断地射击。进攻方面的步兵在机枪、战地炮的掩护下，各个跃进，到接近地堡约一百公尺处，火箭筒开始向地堡射击。工兵匍匐前进，破坏铁丝网，火焰喷射兵接近地堡到三十公尺处喷射火焰，最后将地堡中的敌人全部消灭。演习即行停止。

魏德迈是看到士兵动作熟练，各种火器协同良好，演习完全切合实战，表示赞许。看完后，即与胡宗南等一同乘车回西安。

从这以后，副长官部请来美国军事顾问多人，不时有两三个年轻顾问到潼关来了解前方情况，因此七十八师师部专门请了一个英语翻译官担任翻译，但是，美国顾问并没有向我师提出过什么有益的建议，只是东看看西看看，吃一两顿饭，即乘吉普车回西安去了，不久又会来潼关。他们纪律很坏，坐在汽车上，看到飞鸟或其他野物，即随便开枪射击，使田间农民、来往行人非常震惊，深恐被流弹击中。但美国顾问都毫不在乎，扬长而去。

“西线无战事”，七十八师就是这样安静地扼守潼关达半年之久。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了，侵入中国内地达八年之久的日军投降了。胡宗南立即命令七十八师徒步行军，开赴郑州，保卫胡宗南长官部到郑州受降及接受日军人马武器物资的移交。于是我们欢欣鼓舞地在潼关居民鞭炮欢送中离开了潼关。

（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供稿）

我在抗战中所经历的战斗

邹 宏

我是一个奋战在抗日前线的下层军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现将我在卢沟桥附近、娘子关、台儿庄几次作战情况回忆如下。

一、奔赴抗日前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我所在的二十六路军接到上级命令，火速赶赴抗日前线。我们当时正在江西抚州训练，接到命令后，迅速进行了战前准备。七月中旬，我部到达了抗日前线，河北房山一带。从抚州到房山行程数千里，我部只用了四、五天时间。沿途所见尽是逃难的人群。有钱的人带着家人，坐着车子或赶着大马车逃往城市；一般的老百姓多是衣不蔽体，愁容满面，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也不知逃向那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些被侵略者逼得无家可归的父老乡亲，心中顿时怒火燃烧，恨不得一下子赶到前线去和日本侵略者拚杀。

部队按指定的地点驻扎在河北房山一带。这里离卢沟桥已经不远，日军飞机每天都向我们二十七师阵地空袭、扫射、扔炸弹。为了减少部队不必要的伤亡，我们一方面抓紧一切时机抢挖防空、防御工事，构筑碉堡阵地；另一方面组织对空射击，使敌机机不敢低飞，因此，飞机投下的炸弹也就命中不了目标。当我们看到被击中的飞机拖着黑烟坠落时，心中感到非常高兴。为了主动打击敌人，我们还利用夜间偷袭日本侵略者。我先后三次带领士兵摸进敌人驻

地，把梦中的敌军打得晕头转向，等敌人集合部队时，我们已经撤走了。三次夜袭敌人缴获了一百多枝枪，受到上级表扬。

在平顶山，我们与日军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战斗打了一整天，日军依仗着现代化武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妄图一举拿下平顶山。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进攻时，光用大炮猛轰，还有数十架飞机轰炸，紧接着，机枪猛烈扫射。我当时是一六〇团一营重机枪连上尉连长，我抱定以身许国的决心，沉着指挥我连四挺重机枪射击敌人。当敌人一接近我们火力射程时，我们四挺重机枪立即发出了怒吼，敌人应声倒下一排尸体。当敌人调整火力向我机枪阵地轰击时，我们也作了调整，我用两挺重机枪配备正面，两挺放在侧翼，形成火力交叉。当敌人第二次向我阵地反扑时，我指挥着全连以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打得敌人无法接近我们的阵地。敌人一天之内三次向我阵地发起进攻，由于全体战士同仇敌忾，满怀保卫国土的决心和顽强战斗的精神，终于连续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保卫了平顶山阵地。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对日作战，第一次就打得敌人狼狈溃退，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对日作战胜利的决心。这次战斗，我们缴获各种轻重武器一千多件，歼敌数百人。

二、娘子关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我部又奉命开往娘子关。由于铁路被日军炸掉，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大部队行动目标过大，于是部队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日夜兼程赶赴娘子关。娘子关地处山西、河北两省之咽喉要道，形势非常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前我军就已在这一带构筑了不少国防工事。日军为了急于夺取娘子关这一天险，扼住这一咽喉，打开晋冀的大门，不惜血本，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我们虽已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长途跋涉，一赶到娘子关，只稍稍安顿下来，就投入了战斗。这时，我仍然是重机枪连上尉连长，为了紧紧地把住娘子关，我决定将四挺重机枪就架在

娘子关上，用我们的机枪锁住娘子关。敌人的进攻开始了，他们的炮弹、子弹象雨点一样，射向我方，炮弹在我们周围开花，子弹在我们头上掠过，我和全连战士均无所畏惧。我举着望远镜一面注视着敌人动向，一面指挥机枪射击，狠揍日军。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始终占据着有利地势，密集的子弹，打得日军一排一排地倒在地上。突然敌人一颗子弹打中我身边机枪手的头部，这个机枪射手中弹阵亡，另一名射手毫不犹豫地立即接上，继续打击敌人。在这场民族革命战争中，我们的战士从未想着个人安危，使我深受教育。我们在娘子关保卫战中，坚守了三个来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们守卫娘子关新关期间，经常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在娘子关旧关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消息。由于我们守卫在娘子关上，就象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了娘子关的大门，使得日军不能逾越一步。

三、台儿庄激战

娘子关保卫战后，我部团长黄宗颜升为二十七师七十九旅旅长，我则由重机枪连调往旅部任作战参谋。这时，我部由娘子关调到了台儿庄，编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归李宗仁司令长官直接指挥。我部自娘子关保卫战撤下来后，虽未得到很好的补充和整休就拉到了台儿庄，连续作战，但我从未听到有人吭一声苦。因为我们看到了大片的国土在沦陷，无数的村庄被烧毁，无辜的百姓遭杀害，所以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神。当我们来到台儿庄后，李宗仁司令长官深知孙连仲是冯玉祥部下的一支骁勇善战、能攻善守的部队，特别善于打阵地战和防御战，因此，李宗仁将孙连仲的整个军都部署在台儿庄内外。具体部署是：池峰城师长带领其三十一师守台儿庄城里；黄樵松师长带领我二十七师，还有三十师（师长张金照）守卫在台儿庄外围。三个师相互配合，形成犄角之势。我七十九旅部署在邵庄一带，旅部指挥所就设在邵庄。部队驻扎后，立即抢修各种防御工事，构筑阵地，设置各种障碍，挖掘堑壕坑道，储存

弹药粮食。从当时情况看，知道在此必有一场恶战。我们也准备和日军血战一场。不久就听说日军板垣、矶谷要南北夹击徐州，妄图一举打通津浦线。板垣、矶谷师团都是日军的精锐部队，板垣、矶谷师团长号称“名将之花”。这些侵略军又拥有当时第一流的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侵略气焰嚣张，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三月中旬，矶谷师团与我部接触，屡次受阻，感到对方并非一般，于是加强了对我军的攻势。他们用大炮轰击我阵地，战斗激烈时，一天竟有数百发炮弹落在我阵地上。有一次，一颗炮弹打中我旅部指挥所，击中我无线电台，电台台长被炸死，还有一位少校副官长和一名刚分配到我旅的上校副员也被炸死，还炸死了五名战士。记得我当时和旅长黄宗颜正在查阅地图座标，碉堡上层震塌，我二人躲于桌下才得以幸免。于是，我和旅长干脆冒着炮火的硝烟冲出指挥所，来到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战斗越打越激烈，斗志越打越高昂，战士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当敌人的坦克冲到我们前沿阵地上时，由于没有平射炮和火箭筒之类武器，战士们就用炸药包与敌坦克搏斗，先后炸掉了敌坦克四辆。由于我们全体将士的顽强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不可一世的矶谷师团终于被我军打败。战斗刚一结束，司令长官李宗仁就亲自到阵地慰问，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拍照，全国各地的电报慰问信象雪片一样飞来，各慰问团也来到台儿庄慰问。台儿庄战役以我们的辉煌胜利向世界表明，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只不过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如今，我这个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烽火的幸存者，有幸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历史早已证明：万事团结则成、则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民族抗战的胜利；今天，更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再次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抗日英灵们即使在黄泉之下，也会含笑不已。

(朱火金整理)
(横峰县政协供稿)

记抢救坠落鄱阳湖美机的经过

罗水生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夜九时，天空一片昏黑。因为日机的轰炸和日舰近日在鄱阳湖内频繁的骚扰，都昌县城内的居民百姓一日数惊。忽然，从东北方向的空中传来一阵沉重的马达轰鸣声，城头上的守兵认为是日机夜袭，迅速发出了警报。这时，飞机已飞临县城上空，城防自卫队即开枪对空射击。奇怪的是，这架飞机盘旋数周后，并未象白天的日机那样投掷炸弹，而是掉头向东飞去，转瞬间，即消逝不见了。

第二天，都昌县政府即接到了位于县境东部的博爱乡乡公所的“巧（十八日）晚十时，乡属平池湖中落机一架”的报告。原来，十八日晚那架在县城上空盘旋的飞机，因遭火力射击后，被迫仍向东飞去，在迷蒙的夜空中兜着圈子，约于晚十时坠入离县城有百里之远的博爱、鼎新两乡的交界处——平池湖中。平池湖是鄱阳湖的一个湖汊，此时正值农历三月，春水未涨，湖水尚浅，飞机坠落后的第二天早晨，两边湖岸站满了好奇的人们，从清澈的湖水中可看到飞机已半陷入湖泥之中，离岸约二百公尺左右。县长吕琨得知这一消息，因为不知是敌机，还是我机，究竟如何处理？心中无底，急电向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泰和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防空司令廖士翹、驻浮梁第二十一军刘军长和第五区专员、保安司令酆景福进行了报告。

就在吕琨向上级军政机关发出报告电不久，即收到了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从泰和发给全省各专员、县长的“号秘”电：“丰密准顾司令长官皓电，据报巧午轰炸东京之美机一批，因气候关系，

降落于浙赣境内。各部队机关对此项被迫降落之盟国飞机与其人员，应注意抢救保护，希饬属知照。”吕琨推测，降落于平池湖的飞机极有可能是美机。这时，又接到博爱乡公所的报告：十九日晨，平池湖附近的老百姓误认这架飞机是日机，一齐出动入水拆机取物，后来乡自卫队赶到湖边，虽然制止了，但机上物品被取去已不少。吕琨深感事关重大，迅即研究了应急措施：饬令鸣凤区长，县技士戴牖民和县“人民自卫队”第一中队长率领枪兵一班协同博爱、鼎新两乡乡长保护现场。随后又派军事科长查启桢前往平池湖“验视处置”有关事宜。接着，驻浮梁的二十一军和驻波阳石门街的一四七师也分别派人赶到了平池湖。

四月二十二日，查启桢于平池湖写出书面报告向县政府汇报了二天来打捞飞机的情况：“一、机陷泥中，全身被水淹没。昨经征派民工百余打捞，绳索铁丝俱断，无法掘出。除饬博爱、鼎新两乡征借巨型船只及架设天车，拟明日继续打捞。二、机蓬损坏，翅沉水底，国籍与番号仍不明了。三、失散物件，经前昨两日一四七师王指挥官，二十一军参谋覃参谋均跟同登记外，并公推博爱乡代理乡长洪国栋负责集中保管。”

这时，都昌县政府与各有关军政机关之间，有关坠落飞机的函电纷驰。四月二十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给吕琨发来“敬秘”电：“希即从速打捞详报。”同日，又发来一电，转告顾祝同和航委会周主任关于保守机密的命令：“此次美机迫降我境，务请饬属保守机密及防范，该地区报章不可公布，至该机内文件及该机件并详转饬各主管该地军警妥为收集，毋令散失。”

为了寻觅驾驶员，把飞机打捞上岸，都昌县政府又加派人员奔赴平池湖。这时聚集于湖畔的有鄱阳湖警备司令部人员、二十一军军部人员、一四七师人员、水警队、都昌县政府、鸣凤区署以及博爱、鼎新二个乡的有关人员。为了统一指挥，协调打捞抢救工作，各方临时组成联合办事处，设于博爱乡的北汊吴村。当时，日军活动频繁，鄱阳湖上经常有日军汽艇骚扰，侵占县西北部的日军也常

常向县之东南境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必须加强警戒，预防不测。办事处决定整个警备分陆地、水面两个部分进行。陆地警卫由都昌县自卫中队第二中队和乡自卫队以及一四七师的一班士兵负责，驻于湖东岸之凉亭；水面警卫由水警队负责。清查回收机上失散物件和在湖区以外的地方寻找驾驶员，由县政府及区署并两个乡公所派员负责。在湖内打捞飞机和寻觅驾驶员尸体由鄱湖司令部参谋胡超、县政府技士戴牖民指挥，打捞所需民夫由两乡抽调，并决定如机身搬上陆地由博爱乡负责伪装掩盖。

整个部署完毕后，首先查探机内有无驾驶员的尸体。五月一下午，一名水手潜入机内，因天雨，寒气逼人，入水不久就被迫上岸。第二天，办事处又派二名水手潜入机内探查，查清该机有二层舱，上层舱为驾驶员座舱，没有见到尸骸；下层舱多系机器，不得其门而入。沿湖遍查和四乡搜寻也不见驾驶员踪影。五月六日，吕琨即电呈酆景福，报告：“经饬打捞水手潜入机舱试探，毫无踪迹，遍寻附近湖岸亦未发现尸体。”

虽然没有寻找到驾驶员尸体，但已从机上查找到《太平洋航线图》和密电码本，已可知此机系美机。其坠落的基本原由也弄清楚了。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不断起飞，猛烈轰炸日本本土。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十二架B25中型战斗轰炸机，从在中国海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于中午时分突袭日本东京后，即返航至中国大陆，原定降落于浙江衢县机场。谁知这批美机飞入中国浙江省境内后，适逢夜间，因国民党空军夜间导航设备差，事前联系又不周，遂致迷航，在浙赣等省上空胡乱盘旋，所到各县皆误认为是敌机夜袭，纷纷发布防空警报，熄灭灯光，甚至开枪对空射击，该美机无法着陆，油料耗尽，坠落于地。坠落于都昌平池湖中的这架美机就是轰炸东京十二架B25中型战斗轰炸机中的一架。

在寻找驾驶员的同时，都昌县政府，鸣凤区署以及博爱、鼎新两个乡公所还派人全力收集机上物件，以免散失，流入日伪手中。

除派水手潜入机内取捞物品外，对于十九日晨被人拿走的机上物品也进行积极地寻查。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工作，终于将绝大部分物品收集起来了。除了已找到的《太平洋航线图》和密电码本外，还有无线电台、收音机、橡皮船、防毒面具、氧气瓶、信号枪、指南针、手枪、轻重机枪、各种子弹、斧头、皮靴、航空服、二十三张地图、衬衣、袜子、帽子、领带、长裤、短裤、番布箱、英文书、扑克牌、钢丝衣架、练习本等。这些物品都由博爱乡公所负责保存，后经顾祝同来电指示，统交衢州空军总站接收了。

此时，飞机打捞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百余民工用铁丝套住机头，用两只大船进行拖绞，飞机拖至离岸丈余的地方后，因连日阴雨，湖岸斜陡，机脚受阻，加之机身过重，拖绞飞机的铁丝累拖累断。后来加派人力和船只，岸上又用牛力牵引，终于将一半机身拖出水中。县政府将打捞情况上报后，顾祝同电令航空委员会玉山二十八站站长施法祖，派出人员来都昌拆卸飞机。二十八站即派出机械士姚希农、杨全柯、蔡学铨前来都昌。哪知正在拆卸的时候，敌情突然紧张。日军于六月二日攻占都昌县城，三日又由张家岭进犯盐田、大港等乡，鄱阳湖湖面日军兵舰、汽艇连日向前推进，欲进犯鄱阳。平池湖地区处于三面环敌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已退至双桥的都昌县政府下令将拆卸的机件分别运藏掩埋，机身仍旧推入水中掩藏，二十八站三名机械士和其他各单位的人员也都一一撤走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军退出都昌县城，形势有所好转。随之，时近深秋，湖水渐退，机身又露出水面。都昌县政府电告空军二十八站，请求派技术员来拆卸机身。这时，顾祝同、曹浩森等人因事过境迁，飞机内的大多数物品已运走，空留一残破机壳，也就没有再过问了。

(此文系根据档案材料整理而成)

美国飞行员星子脱险记

徐 新 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英、苏、法五国，结成了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同盟。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志愿参加了对日本空军的作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间，一架美机落在星子县太平许村。驾驶员因受伤被日军俘获，在九江游街示众后，被日军枪杀。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美空军B25型轰炸机一架，又被迫在九江星子两县邻界的蓝桥乡降落。美国飞行员人生地不熟，举目无援，寸步难行，情况十分危急。

正当他们束手无策茫然四顾之际，从庐山南麓的康王谷内冲出来了一支便衣武装。美军飞行员迅速地拔出了勃朗宁手枪。“哈啰！”一位年约二十五六岁的便衣队员，操着英语搭话了：“不要误会，我们是朋友，是来迎接你们的。”经过互相介绍情况知道出现在面前的美国飞行员，正是第十四航空队的，为首的名字叫杰姆。便衣武装是星子抗日反敌行动队，领头的是大队附唐明球，翻译是曾经在庐山教会学校读过书的项官林。他们是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特意前来迎接救护的。

山道崎岖，时间十分紧迫。星子县是全沦陷区，敌军搜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偏偏杰姆等人，虽然天生一双长腿，却是坐惯了飞机，走不惯山路。加之山径阴湿多苔，又滑又陡，走不多远便不断有人摔倒，破皮出血的，伤了踝骨的，扭了筋的……有的痛得龇牙皱眉，干脆在山路旁坐了下来。杰姆为难地向翻译项官林说：“你们先走吧，免得连累你们一起遭殃。”项官林将杰姆的话转告了大队

附，唐明球摇了摇头说：“那不行，人家舍死忘生，为帮助我们遭了难。脚尖踩到了中国地界，我们就有保护朋友的责任。”中队长唐明林一双大手，把一个伤了“螺蛳拐”的盟军拉了起来说：“百世修来同船渡，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驮也要把你驮上山去！”“对，驮，驮上去。”于是不容分说，不管伤没伤筋骨的，队员们一人背上一个飞行员，匆匆俯着身子向山上爬去。他们感觉到了背上心脏的激烈搏动，有的人颈窝里滴下了滚烫的泪珠。

就这样，轮流背负着，我游击队员们终于把七名美国飞行员，接到了游击队的驻地庐山垅。给他们服用事先准备好了的仁丹，八卦丹，万金油等药物。因为盟友们大都扭伤了脚腿，必须休养些时间。垅里的百姓宰鸡送蛋，寻找草药，热情地照顾患难与共的盟友，替他们医治创伤，一位飞行员患了病，游击队又千方百计，搞来了二十支维他赐保命为他注射，他的病很快痊愈。在庐山垅里休息了七、八天，盟友们的身体都健康复原了。当时，外面的风声愈来愈紧。反敌行动队又为盟友们准备了七套阴丹土林布的便衣，决定越过汉阳峰，经神灵湖，把七位盟军送到驻在都昌县的星子县政府去。

八月二十六日，行动队雇了七乘竹桥，趁着茫茫夜色把杰姆等七人送到了七贤峰下“尖门口”项官林家。项官林宰鸡招待了盟友。等了两天才找到下山的机会。由占家崖小路避过日伪军的巡查，到了星子县城东三里的神灵湖桂家。八月二十九日，由反敌行动队队长钱浚等护卫，由村民桂淳贤等七人赤足涉水，将杰姆等七位盟友背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七只木船，在浓密的大雾掩护下到达了星子县抗日流亡政府所在地。抗日游击队大队附崔廷柱热情地迎接了他们。九月一日，星子县政府又派陈英烈等，将七位盟军送到了驻扎在乐平县的鄱湖司令部。分手时，一位美国飞行员将自己的一枚军功章，赠给了陈英烈作为纪念。

日军得悉美国飞行员为反敌行动队救护出境后，立即采取了疯
(下转第82页)

记陈嘉庚先生赣州之行

徐 浩 然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武汉沦陷以后，大汉奸汪精卫逃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卖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汪逆叛国投敌，当了南京伪政权的傀儡主席，日本侵略者气焰更加嚣张。这时国内的亲日派乘机进行汉奸活动，散布“抗战能抗多久”的悲观怀疑论调。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本来就不坚决，这样，有一部分中央大员和地方党政军高级官员就动摇起来，国势岌岌可危！

在此国家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陈嘉庚先生出于爱国义愤，挺身而出，在南洋发表通电，痛斥汪逆叛国投敌罪行，号召海外侨胞全力支援祖国抗战到底，义正词严，声震天下，国人振奋，敌伪丧胆，给敌伪汪逆以及一切亲日投降派以沉重打击！对稳定抗战局势起了一定作用。

陈先生还组织南洋华侨归国慰问团，到祖国慰问，越过万里关山，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受到举国朝野的热烈欢迎。

接着，我们就听说陈嘉庚先生要来赣南观光。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人们盼望着陈先生到来。当接到陈先生要来赣州的电报以后，江西四区专员蒋经国就通知有关单位，积极筹备盛大欢迎会。

当时，我担任赣州市区区长职务，届时率领全区国民兵列队到城郊欢迎。事前在东门外汽车站广场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讲台，张贴标语，整顿市容，区署全体动员，忙得不可开交。

等到陈先生要到达的那天清晨，我率领全区国民兵团七个中队

一千余人，赶到五里亭排队欢迎，队伍延伸到东门汽车站路口。还有自卫团队军警，沿途作了警戒布置。加上各机关团体公务人员和城乡市民，总共有五千余人齐集台前迎候。

上午八时，赣南党政军首脑和各界代表的领头人物，分乘三辆小轿车驰往赣庾公路上迎接。当陈先生的专车快到五里亭时，我们的先遣人员骑自行车飞驰来报：“慰问团的车子来了！”

大家闻讯，喜溢眉梢，纷纷踮起脚尖张望，不一会，就看见慰问团乘坐的两辆小轿车徐徐开来。顷刻间军乐高奏“迎宾曲”，鞭炮轰鸣，掌声四起，欢迎人群高呼：

“欢迎侨胞慰问团！”

“欢迎陈团长！”

“陈团长辛苦了！”

在夹道欢迎的热烈气氛中，陈先生和慰问团人员下车走向欢迎人群，一路检阅国民军队。军队立正敬礼，陈先生频频挥帽回礼。

这时，许多围观群众自动参加欢迎大会，还有搭汽车准备出门的旅客牺牲车票来参加大会的，人越聚越多，估计超过万人。

在军乐与鞭炮声中，陈嘉庚先生慰问团一行人员，由蒋经国陪同登上彩台，一对男女学生穿着新衣，向陈先生献上鲜花。这时欢迎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进入最高潮，台下群众个个举手高呼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起初是有人领头呼喊，后来转为自动高呼。

我当然是和大家一样激动，象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由此，我不禁暗暗思忖：只有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人，才能得到民心如此真诚的爱戴！这时我方才看清陈嘉庚先生，戴了眼镜，穿着一套蓝色条纹的西装，系了领带，虽然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还是精神奕奕，讲话声调高昂，有感情、有力量！

他一开口就说：

“谢谢蒋专员和各位女士、先生、同胞对我和慰问团如此热烈的欢迎。足见同胞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十分荣幸。我代表海外八百万侨胞，向祖国同胞们宣誓：我们全体

侨胞坚决拥护政府对日寇抗战到底，全力以赴支援全国同胞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他接着说：

“大汉奸汪精卫是无耻的卖国贼，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是全国同胞的公敌，我们华侨和全国同胞团结一致，一定要消灭汉奸卖国贼，一定要消灭日本鬼子，谁敢对日寇妥协投降，谁就是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消灭他！我再说一遍：谁敢对日寇妥协投降，谁就是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消灭他！”

陈先生讲话时显得心情十分激动，义正词严，声泪俱下。不时把眼镜上下移动，又不时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和鼻旁的眼泪，继续讲：

“四万万同胞一条心，中国一定不会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千万群众听了陈先生的讲话十分激动，对日寇汉奸的仇恨越深，千万群众含着热泪，一次又一次振臂高呼：

“消灭汉奸卖国贼！”

“坚决抗战到底！”

在千万人的怒吼和掌声中，陈先生结束了讲话。

最后，蒋经国先生也讲了话。

散会后，陈先生一行上车进城，从东门进入市区，沿途千万人夹道欢迎，鼓掌放鞭炮，高呼口号，陈先生一行在车中频频点头招手，答谢致意。真是盛况空前，丹心热血，敌忾同仇！

是日，专署安排慰问团在陶陶招待所下榻。赣州各界联合举行公宴，为陈先生一行接风洗尘。陈先生接到金字请帖之后，坚决辞谢了，只同意开个茶会，而且只能开很简单的茶会，不能多买点心，否则他就不出席参加。

蒋经国和各界代表只有尊重陈先生的意思，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而茶点甚简的茶话会，会场上摆满了大盆小钵的时令鲜花，陈先生看了点点头，非常满意。

在茶会欢迎时，陈嘉庚重申侨胞支援祖国对日抗战到底的决

心，并对蒋专员的“建设新赣南”谈了一些观感和印象。

于是，事先订好的几十桌特级酒席临时退掉了，有些吃惯了公家白食的老食客空着肚皮回去，未免大失所望。

我们仔细看看陈先生穿的那套西装，已经旧得褪了色，起码穿了二十年，皮鞋也补了几块补钉，真是出乎意外。

原先，我们总以为陈先生乃南洋华侨巨子，大企业家，一定是豪华阔绰，派头很大的，的确没有想到，他老先生的生活作风，竟是这样的节约俭朴。

当天晚上，陈先生决定翌晨离开赣州前往泰和，他恳切叮嘱千万不要再惊动群众欢送，免得耽工误业。第二天他们就悄悄地赶早走了。

陈先生到泰和后，即转赴湖南等地慰问，后来还到了延安慰问观光，同年七月三十日再次经重庆返回南洋。

(吴识沧整理)

(上接第78页)

狂的报复行动。九月十九日，日伪军三百余人，包围了驻扎在上头王村的反敌行动队。这时大队长钱浚在都昌未归。大队附唐明球率领队员二十余人与日伪军激战，由于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大队附唐明球、中队长唐明林等壮烈牺牲，他们为拯救盟友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四十一年过去了，当年获救的美国飞行员杰姆等尚健在否，相信你还记得庐山鄱水间用鲜血凝成的神圣友谊之情吧。

(星子县政协供稿)

江西青年服务团的三起三落

徐家俊 吴达明 戴雄远

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南昌建立的救亡团体，它在名义上是由国民党的江西省政府组建和领导，但它的实际工作是在中共东南分局领导下开展的。全团共有十一个大队，遍布江西全境，在我党东南分局和队内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国民党部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慰劳和民众组训工作，播下了抗日火种，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干部，在江西省的抗战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南昌改编为新四军，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办事处同时在南昌建立。十年内战时期的主要战场江西，一时出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形势。同时，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失陷，东战场的进步文化人和爱国青年纷纷向武汉转移，南昌也来了一批上海的流亡大学生和无锡流亡团（简称“锡流”）、丹阳青年救亡服务团（简称“丹救”）、溧阳流亡团、上海蚁社等有组织的进步青年，他们满怀抗敌救亡和追求真理的热情，渴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我党东南分局正确估计了这批青年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动员他们留在江西工作，并力主通过一个统一的合法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一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想把这批青年抓在自己的手里。于是作为统一战线产物的江西省青年服务团（以下简称“青服团”）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诞生了。

“青服团”的建团工作，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就开始酝酿和着

手筹备，经各方协议商定，经费由江西省政府负担，团员的招收，采取公开招考的方式。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在南昌天后宫小学举行考试，录取团员八百余人，集中在南昌市书院街工专校舍进行训练。

开学后不久，中共东南分局统战部长兼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在工专礼堂给学员们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集训期间，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支部委员有“丹救”的倪志坚等。倪于一九三五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底为“丹救”到南昌打前站，通过夏征农同志的关系，在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了陈毅，由陈毅同志指示参加江西省青年服务团。

二月十三日，集训结束，“青服团”宣告正式成立。团长由熊式辉自兼，副团长蒋经国，总干事由王枕心担任，负责领导全团具体工作（王枕心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曾与熊式辉同在北伐军中任职，和熊私交甚厚）。总团部分设总务、组织、宣传、视导四组，共产党员夏征农担任宣传组长，其余各组分别由袁啸虹（中统）、刘九峰（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后脱党）、张轶庸（军统）担任组长。全团十一个大队，除直属总团部的宣传大队驻南昌外，其余各队分别进驻全省十个专区，其中的第一、三、四、五、六等大队中有中共秘密支部。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又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作骨干，所以工作开展得很有生气，所到之处，迅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形成轰轰烈烈的抗战气氛，并深入工农群众中进行细致扎实的组训工作，同时在队内开展自我教育，发展党的组织，其它各队在宣传抗战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江西省青年服务团从成立到结束，经历了三起三落。在它存在的一年半时间中，基本上每半年改变一次，它的盛衰演变，犹如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反映了全国和江西政治形势的变化。

成立之初的半年，是青服团的全盛时期。全面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使国统区一度出现比较开放的政治气氛，因而青服团工作的开展也比较顺利，特别是党的力量较强的几个队，例如第

一大队在南昌市郊，第三大队在九江，第四大队在浮梁，第五大队在赣州，第六大队在吉安，都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虽然有些队也曾遭到地方顽固势力的疑忌和干扰，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团结抗战的事件，例如第三大队在德安工作时，当地民主人士向热生，因与该队往来较密而惨遭暗杀；第九大队在永修时，因写标语触犯县太爷而发生队长被拘留事件。但组织未遭到破坏，工作还能开展，这是青服团的第一阶段。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对青服团的防范和限制逐步加紧。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为了控制这批青年，下令抽调青服团队员去武汉战干团受训。江西当局顺水推舟，把他们最不放心的第一至第六等六个大队的青年约三百人送往武汉受训，其余几个大队全部解散。这一行动，遭到了部分队员的抵制，有的坚决不去武汉，有的去了又逃回来。后来由于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加上战局变化，九江失陷，武汉受到威胁，为了配合保卫大武汉的战斗，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在舆论的压力下（听说还有白崇禧的干预），迫使江西省政府不得不恢复青服团的建制，把留在南昌和从武汉逃回来的队员四百余人组成八个战地工作大队，分别开赴赣北前线和鄱阳湖畔的半沦陷区，从事战地宣传服务工作，实际上是想把这批青年送到火线附近，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消灭他们。结果“事与愿违”，没想到各队同志到了战地，脱离了特务的监视，更有利地放开手脚开展工作。他们在秘密党组织领导下，很快和前线军民打成一片，并与党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这是青服团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八年的十月，武汉和广州相继失陷，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内政治形势迅速逆转。江西当局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把八个战工队调回南昌进行整编，以便来一次清洗。这一行动引起我党的警觉，采取了应变措施，各队政治面目较红的党员，有的转往敌后，有的转入地下。留下的队员经过短期集训，于一九三九年初缩编为两个大队，改归江西省抗敌后援会领导。为了

便于控制，当局规定这两个大队长驻南昌，不下农村，不出南昌市境，实际上是把这支队伍禁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以防“越轨”。这是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第三阶段。

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南昌失守，这两个大队随省级机关集体转移，到吉安后再次进行裁编，一部分编入宣慰工作团，一部分编入江西省救护工作团。至此，活跃在江西全境的江西青年服务团终于被肢解和撤销。

(上饶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上接第93页)

府全部机关紧急撤退，青服团也奉命向吉安方面转移。我们第一大队单独沿公路撤退，当时公路上尽是车辆和人流，秩序混乱，拥挤不堪。当我们走到莲塘时，突然有一架敌机袭来，由于我们几十个人一律穿着刚发下不久的崭新草绿军大衣，目标明显，敌机围绕我们头顶盘旋，我们立即疏散开来，卧倒在田埂上或草丛边，敌机以我们为目标低飞扫射，劈空而下的机枪子弹，发出刺耳的尖啸声，落在我们近旁，敌机临去时还投了一颗小炸弹。幸运的是，我们的同志全部平安无事，只有一个过路的国民党士兵被炸伤了半边屁股。

我们到了新淦，就停止行进，在城郊休整。这时，队长何士德已于三月初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第一组长程光明转往孤岛上海作地下工作，队伍便又作了一些调整，个别党员转入地下，同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休整了一个多月后，我们第二组被调至吉安，编入江西省救护工作团，其余各组和第二大队被编入新成立的宣慰团工作队，几经改编的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终于被肢解撤销。

(上饶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记江西青年服务团的后期活动

眭 新 亚

我是中途参加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直接经历了青服团后期活动的全过程，有些片段，至今记忆犹新：

武汉邂逅和墙外接应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丹阳青年救亡服务团的流亡队伍三十三人，经过千里跋涉，到达江西九江，其中大部分同志转往南昌，成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基本成员；我们未去南昌的同志，转往武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部队第十三军的战地服务团，去徐州前线从事战地宣传工作。

半年后，我们从徐州突围，回到武汉时，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正当盛夏季节。号称全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天气特别炎热。当时我们的行李衣物全在突围途中丢光，发下的生活费也很快花完，情状十分狼狈。我们丹阳的同志，临时住宿在汉口前日本租界的一个小旅馆里，晚上在室内热得睡不着觉，露宿在江边马路上，白天四出活动，寻访在武汉工作的同乡、亲友，谋求经济上的接济。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汉口的马路上碰见了参加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一个丹阳同志，才知道他们正在战干团受训，其中有在青服团四队的丹阳同志倪志坚、洪流、戴逸、程坤源等人。为了了解他们的处境和留在南昌的同志的情况，我和吴达明等同志第二天中午就过江去武昌看望他们，倪志坚等在战干团的会客室里接待了我们，彼此困境相逢，格外亲热。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国民党把他们强行

调来武汉受训，是一个政治阴谋，一方面以“釜底抽薪”的办法迫使青年服务团解体，另一方面对这批青年施行所谓“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治灌输和军事管训，以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他们进了战干团之后，原先的编队被全部打乱，分散编入各队，身上的现金除留下少数零用钱外，一律交给队里“代为保管”，队员们人心浮动，很多人想开小差。原先的正副领队何士德和桂家鸿也自动返回南昌。他们六人准备第二天中午乘大家午睡时出走，要我们届时去围墙外接应，帮他们转移行李。我们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当即把亲友处借来的钱，凑了十元塞给他们作路费。

第二天中午，我们准时到战干团围墙外一个僻静处等候，约摸到一点钟左右，听到围墙里响起了清脆的击掌声，我们立即击掌回答，接着就有六个背包从围墙里抛出来，我们一一接住，运送到指定的路口。不一会，就见他们六人满头大汗地急步奔来，我们交还了背包，就和他们互相紧紧握手告别。后来听说他们先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躲了几天，然后经长江局介绍到豫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后转入新四军彭雪枫部队。

我们不久也离开武汉去河南南阳向汤总部报到。后因受到汤总部的歧视和限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请示上级党同意，转往江西南昌，和留在南昌的“丹阳青年救亡服务团”同志会师，参加了战地工作队第八大队，同他们并肩战斗。

鄱阳湖畔的战斗

战地工作队第八大队，全队约五十人，党的力量较强，队长向法宣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不参与队里的组织生活，党支部书记周婉如，组织委员眭珏英（即任迈烈士），党员有眭玉英（许英）、陈云霞、孙卓云、华英等十余人。

一九三八年下旬，我们奉命出发，去鄱阳湖畔的都昌县工作，这里接近赣北前线，属于半沦陷区，敌伪活动猖獗，地方恶势力也

比较嚣张，境内武山（？）地区有一支内战时期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田英同志于抗战爆发之初，下山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合作抗战，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制造的这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

这一带我党的地方组织属于中共浮梁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下设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中心区委，领导四县具体工作。中心县委书记朱辉，中心区委书记由东南分局指定战地工作队第一大队文书彭炎同志担任。队长向法宣是都昌人，熟悉当地情况，我们进驻都昌后，首先由向法宣队长介绍了都昌地区的斗争形势，然后根据战工队公开工作的要求，在县城开展宣传，号召群众协助军队抗战，保卫家乡；主动承担运输、担架、破路等战时任务；严防汉奸敌特的破坏活动；积储粮食物资，实行坚壁清野；加强自卫武力，维持地方秩序。

接着我们就分组下乡，开展工作。第一组（组长眭珏英）先在县城，后去蔡家岭；第二组（组长张××）去徐家埠；第三组（组长刘锡中）去三汊港。当时东南分局给我们支部的任务有二：一是和武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帮助田英同志牺牲后失散的党员恢复关系；二是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支部在都昌境内设了两个点，一个点在县城，由陈云霞同志负责，主要开展公开工作，另一个点设在蔡家岭，由周婉如和眭珏英同志负责，以秘密工作为主。当时战工第一大队驻万家埠，驻地离我们很近，彼此互通声气，配合默契，两个队的党员同志，也常有往来。

我原随第三组在三汊港工作，后来支部派人通知，要我去县城接受一项重要任务，我匆匆赶到县城，陈云霞同志传达支部的指示，要我和战工一队的党员小宗同志一道去武山参加党训班的活动。我是一个入党才三个月的新党员，政治上还很幼稚，更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现在要去当年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和仍处地下状态的游击队员打交道，心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和我同行的小宗是广东人，个子不高，年纪与我相仿，但很老练精干，一见面就使

人感到有一股令人信赖的魅力。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后上路，山上派来一个游击队员为我们作向导，他一身农民装束，手上挎了一个大菜篮，里面装了一些猪肉和日用品，从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过路行人。他不紧不慢地在前面走，我们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在后面跟行。走完大道就是弯弯曲曲的山路，约摸走了三、四个钟头，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个位于密林深处的山村，党训班设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聚集在这里学习的有三十多个地方党员，都是游击队的骨干，这些被诬蔑为“土匪”的游击队员，都是善良朴实的农民，他们非常关心外面的时局，知道我们是从南昌来的，围着我们问长问短，有的问八路军、新四军打了那些胜仗？有的问日本鬼子离这儿多远？他们的抗战情绪很高，但十年内战所种下的阶级仇恨和田英同志被杀害的血的教训，使他们对国民党是否真心和共产党联合抗日有着很深的怀疑。组织上派我们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他们讲统一战线的道理，讲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策略。

我和小宗同志的分工是他讲大课，我教唱抗战歌曲。游击队员会唱不少当地流行的山歌和红军歌曲，学唱抗战歌曲也很容易上口，我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保卫大江西》等歌曲，大家学得挺认真，一个个象孩子似地放开嗓门歌唱。他们不大识谱，音阶也唱得不那么准确，但却感情强烈，精神昂扬，唱出了民族尊严和对侵略者的仇恨，表明了这些武装起来的贫苦农民正是抗战的主力。

我们在山上和他们同吃同住，很快就搞熟了，休息时间常在一起聊天，他们给我们讲内战时期打土豪的故事，我们给他们讲了南昌的情况和新四军血战繁昌的战讯。他们和田英同志的感情很深，谈起他的被害，就禁不住流泪。有一个老队员说：“要是老田还活着，领我们打鬼子，准会把鬼子赶下鄱阳湖喂鱼！”我们在山上呆了十天左右，下山归队时，游击队员们依依送别，把我们送了好远一段路。

我们归队后，队里的情况起了一些变化，有的同志转入地下，第一大队的彭炎同志去景德镇任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战工一队驻浮梁代表，我队眭玉英同志以战工八队代表身份，随老彭去景德镇工作，并以假夫妻关系为老彭作掩护。眭玉英体质素弱，到景德镇不久，得了严重的伤寒病，生命垂危，幸亏组织上不惜代价，延医诊治，彭炎同志和景德镇市委组织部长严兴让同志、宣传部长张山圭同志等，象亲人一样精心护理，才把她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严兴让同志后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化名李丹，斗争坚决，一九四二年六月在赤石暴动后反动派的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后来东南分局派人来通知：“南昌的特务机关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其中有彭炎同志的名字。”组织上指示彭炎同志立即撤退。眭玉英不久亦和浮梁中心县委联络部长孙章录同志（锡流成员，青服团五队队员）一道，撤离景德镇，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

彭炎同志离景德镇时，战工一队队长何士德骑了一匹从日本侵略军那里俘获的白马，在中途接应。后来这匹马送给了都昌武山游击队队长老许（？），老许（？）赠送了一支手枪作为回报，这支手枪由彭炎同志带到南昌转赠黄道同志佩带。彭炎同志经过都昌时在我们八队住了一夜，和周婉如、眭玉英等研究了工作，第二天一早就离开都昌前往南昌。为防特务暗害，他到南昌后，根据组织指示，住在新四军办事处不露面，等我们回南昌整编时，他已撤离江西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转往苏南敌后工作。

难忘的南昌三月

我们回到南昌后，东南分局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和工作需要，作了一些新的部署，除布置彭炎同志撤退外，抽调华英、孙卓云等同志去赣东工作，并利用战工队听候整编的空隙，组织我们留下的党员进行学习，由黄道同志亲自给我们上党课，记得几次党课都是晚上在三眼井附近的新四军办事处上的。我们吃了第二顿饭（当时南

昌的习惯每天只吃两餐)等到天黑，就装着上街闲逛，分散去三眼井附近徘徊，乘无人注意时迅速走进办事处。黄道同志总是预先在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这位名震东南的闽浙赣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方志敏的亲密战友，身材魁梧，方方脸盘，见到我们，满面笑容，态度十分亲切！他给我们讲了党的基本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武汉失守后的国内外政治形势。这几次党课使我们终身难忘，这是我们和黄道同志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一年半之后，黄道同志就不幸在河口镇被国民党特务暗害逝世。

一九三九年初，青年服务团的八个战工队被缩编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何士德，第二大队队长陈凯原，两个队按当局规定长驻南昌，我们第一大队的驻地为南昌市石头街附近二郎庙小学。全队分三个组，第一组长程光明，第二组组长张××，第三组组长李伯敏，党支部书记吉鸣九。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我队这一阶段的方针是“七分学习，三分工作”。

我们在南昌整整待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政治学习抓得比较紧，经常整天关门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论持久战》《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还有《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抗战三月刊》等。支部通过开展自我教育，提高青年们的觉悟，培养建党对象，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也使党的组织有所发展。

在开展政治学习的同时，还狠抓了业务学习，大队长何士德是作曲家、指挥家，为了提高全队的音乐素质和歌咏水平，他每天早晨都亲自带领队员练嗓，并结合练唱，传授基本的乐理知识和科学的发声方法，提高大家的识谱能力。有时还指定一个歌曲，叫队员们一个个上台试唱，由大家进行评议。记得有一次，他挑选了《歌八百壮士》这首歌里最美也是最难唱的乐句“飘荡……飘荡……飘荡”进行测试，对受试者的音质、音准、音量、吐字和感情节奏一一作了评断和纠正。名师出高徒，由于他的严格训练，培养了一批优秀歌手，提高了全队的歌咏水平，因此我们第一大队的歌咏表演在整个

南昌市是享有盛名的，每当我们上台表演合唱时，观众不仅对我们整齐雄浑的歌声报以热烈的鼓掌，也为指挥者优美的富有激情的指挥艺术而倾倒。我们发挥了本队在歌咏方面的优势，在市内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派出一批同志深入到学校、街巷和铁路职工、码头工人中教唱抗战歌曲。

我们还结合全市性的宣传活动，在南昌进行了多次综合型文艺演出。有一次，江西省抗敌后援会为了募款支援前线抗战部队，在全市开展义卖活动，省市的知名爱国人士雷洁琼、彭文应等都亲自在义卖大会上向观众推销义卖物品，我们在会场进行了演出，演唱了何士德临时创作的“义卖歌”，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第二天江西省广播电台邀请我们去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演唱了这首歌。

我们还曾组织了一支经过精选的演出队去青云谱附近的飞机场进行慰问演出，飞机场的空军部队用十几匹马来接我们。对大多数队员来说，骑马还是第一次尝试，大家怀着好奇和欢乐的心情跨上了马鞍。开始时在驯马战士的控制下，马队排成长串，以小跑的速度，秩序井然地行进，大家骑在马背上，觉得很平稳，顿时消除了紧张心理，一路歌唱说笑，不料到了郊区后，排头的一匹马，忽然撒起欢来，放开四蹄奔驰，带动了所有马匹都奔跑起来，颠得同志们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吓得一些胆小的女同志尖声叫喊。幸亏驯马的战士飞步赶上去勒住了缰绳，大声吆喝，才制服了奔马。我们到了机场，惊魂甫定，就向空军官兵进行了慰问演出，演出效果却比平时更好，演出结束谢幕时，我们和飞行员们同声合唱了抗战歌曲《保卫大江西》。台上台下汇成一片歌声的海洋，掀起了慰问演出的高潮。

疏散吉安，肢解撤销

三月下旬，战局突变，九江方面的日军向南昌猛扑，江西省政
(下转第86页)

记战时丰城妇女指导处

范 纪 华

在抗日救亡时代，妇女们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纷纷走出校门，走出家门，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抗战洪流中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由于抗日救亡形势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推动，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应运产生，其任务是组训全省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业。省妇指处成立后，先后在全省各县分批设立县妇女指导处，沦陷区则暂缺。

丰城县妇女指导处，就是在这个烽火漫天的岁月，一九三八年春天成立的。

县妇女指导处设主任一人，指导员三人，省处另派一位辅导员驻县辅导工作；县以下有区队附、乡队附、保队附，规定了凡是十九岁到四十五岁的妇女，都编为妇女队员。

县妇女指导处主任和指导员以县城为驻点，经常巡视各区乡指导工作，领导各区乡妇女队附安排任务，她们接受任务以后就回到区乡展开工作，区乡长有责任协助和解决她们工作上的困难。

丰城县妇女指导处首任主任是艾萍，后为戴卓力。戴卓力是东北流亡青年，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三九年在泰和被中统特务逮捕后变节。省处驻县辅导员：辛翼，东北流亡青年，中共地下党员，后得半身不遂病。指导员：熊毅如、周舜如、余月桂，都是丰城人。

各区妇女队附：一区盛芸芳，丰城城里人；二区陆瑞祥，丰城城里人；三区刘九如，丰城三区人；四区范纪华，江西瑞昌人；五区朱银枝（五区是沦陷区，无法开展工作）；六区曾瑾芳，政治面

目复杂，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平时不下乡不上班，是光拿钱不干事的。

丰城妇指处成立以后，首先展开扫盲工作。各区乡经常是定期开办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对她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解基本科学知识，清除封建迷信思想。

丰城地处抗战前线，支前征募任务比较繁重，逢年过节慰劳前方战士，特别是征募军鞋数字大，但丰城妇女对这些任务都完成得相当好，多次受到表扬。

在当时，我们采取各种形式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神圣的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广泛深入地开展支前工作。如经常演街头剧，利用当集或节日组织演讲队，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大道理，使广大妇女同胞普遍认识到“要生存只有抗战到底”。

一九三九年冬季，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县妇女指导处牵头联合县自卫大队、抗日宣传慰问团在白马寨开办为期一个月的“丰城县妇女基层干部训练班”，生活管理实行军事化，每天三操两讲，开展演戏，大唱革命歌曲，进行家庭访问等活动，彼此配合得相当默契，训练班办得生动活泼，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地下党的领导。那时候，吴建业烈士是中共地下党丰城县委书记，胡宗澹、刘茂海、戴卓力、辛翼等人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带动下，同志们的干劲相当大，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大家争着抢重担挑，拣最苦的工作做。

训练班一结束，我们成立了一个战地救亡服务团，由妇女指导处主任带队，开往前线阵地，向正在对敌作战的第一〇五师战士进行慰问。在战壕里，帮士兵写家信，补衣服，钉纽扣。在营房，白天给战士拆洗衣被，晚上演戏、唱歌，大大激发了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斗志。

我们除了宣传抗日救亡以外，还着重启发妇女们向封建礼教宣战，大力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从四德”的谬论，宣传男女平等，取缔买卖婚姻，痛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弊病，禁

止虐待童养媳，禁止一夫多妻，取缔娼妓。在全县妇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经常有妇女三五成群前来询问有关婚姻，有关童养媳转回娘家等问题。一段时间，妇指处简直应接不暇。后来，经过讨论，我们规定每逢星期一、三、五为接待日，安排同志们轮流值日，对来访的妇女所提出的问题，热情详细地予以解答，起到很好的效果，为妇运工作的开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每年征募寒衣和军鞋，总是提前完成任务。

一九四〇年冬，妇指处主任戴卓力去泰和开会，被中统特务逮捕，她供出了丰城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一年农历元宵节，我爱人吴建业在丰城《剑锋报》社不幸被捕，第二天我也由南昌三江口押解到丰城来。吴建业同志（又名吴大可）后来在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备受种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痛斥敌人，并在狱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串连革命同志与特务作不懈的斗争，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被国民党特务在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杀害。我被特务关押了三年才出狱。

(丰城县政协供稿)

(上接第102页)

放了一段时间，直至抗战胜利，才又重返南昌。但南昌馆舍被炸，前面办公大楼及宿舍全毁。留守馆工袁冀祥竟被日寇惨杀，曾由厅拨给其家属抚恤费一百四十元。省馆在不得已情况下，只好暂借官巷省民教馆一部分作为临时馆舍。后来得到江西救济分署拨给丐粉九千袋，作为重建经费，才马马虎虎在原有基础上，盖起了两层楼房，以蔽风雨，更谈不上恢复旧观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南昌

抗战期间的江西省图书馆

熊 飞

一、在轰炸中撤离南昌

一九三七年冬，京沪弃守，武汉震动。我当时正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校读完第三学期，还差一学期毕业。由于人心浮动，大家都急于寻找出路。我便利用学校散放寒假之机，参加了武昌明月桥东北救亡总会所创办的湖北汤池农村工作人员游击训练班。结业后，战局又暂时稳定下来，学校仍继续开学，我依旧回到文华读完这个专业。

一九三八年四月某日，校长沈祖荣突然问我，愿不愿回江西去，说江西省图书馆来信向他们要人，并把信递给我看。我想起时局如此动荡不安，真是瞬息万变。今后自己何去何从，很难预测。加之离家日久，亲老家贫，思乡之念，油然而生，便不禁脱口而出：“去，就去吧！”

同年六月下旬，我刚考完毕业考试，便匆匆搭上汉口开上海的长江航轮，在九江码头登岸。再改乘战时南浔路最后一班车，直奔南昌。

江西省立图书馆位于南昌市中心的百花洲。前面有宽阔的马路，后面有楼台亭榭，绿树成荫，小桥流水，风景绝殊。我远远望到这样的胜境，不觉心意盎然。那时馆内进出，必须经过省科学馆（现改建的少年宫）那边大门。前面有一道围墙，里面是一片空地，中间却矗立着一栋五层大楼的馆舍和书库。我会见了该馆负责人李蓉盛，他是辽宁省复县人，东北大学毕业，“九一八”后流亡

到关内，再读文华图专，比我早两年毕业。他看完介绍信后，非常高兴，便把我安置在大楼顶层一大房间内住下，里面设备齐全，地面还铺有地毯。

象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说老实话，我是从内心感到满意的，吃饭睡觉都相当舒服。晨起到大楼前面空地做一会儿体操，锻炼身体；晚间就在四楼前面平台上纳凉，还可远眺全城灯火万家的夜景。我所担任的工作是负责采编，每月薪金一百一十元，七折发给。那时物价尚低，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可是好景不长，一星期后，防空警报突然拉响，全馆工作人员迅即躲入斜对面防空壕内（今省图书馆宿舍）。俄而，日机飞临市空，就在省图书馆后边湖面上，丢下两枚小型炸弹，幸而都没有炸开。加之南浔线战事日趋紧张，敌机滥施轰炸，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计，我馆被列入首批撤退对象。便迅速雇好民船两艘，装上全部平装书和卡片箱、用具等（线装书二百五十二大箱，六万二千九百六十三册，早已运抵永新，后分迁泰和、遂川乡间保管），每船搭乘职工三、五人，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由南昌启程，沿赣江上溯吉安。

时当溽暑，气候炎热，我们在途中整整航行了二十六天。有时大家坐船舱内，说说笑笑，闲聊一会；有时独坐船舷，极目四顾，则是水天一色。行程中如碰上逆风上滩，整日只能航行三、五华里，有时还需要我们青年男女全部下船，赤脚上岸，协助船家拉纤。大家齐声哼着流行的《船夫曲》，哎哎啊啊地唱起来，倒觉得饶有风趣，会使你忘记腰酸腿痛，晚上睡觉时，会觉得特别甜。

沿途经樟树、新淦、峡江、吉水等市镇。每到一处，我们都抛锚上岸，大家三、五成群，结伴上街闲逛一会，有时还找个把馆子小吃一顿。记得有一次在峡江县城，我们一行四人，上馆子吃了顿午餐，算是加油，大家都吃得心满意足。

八月六日，船到达吉安码头，大家都忘记了旅途的劳顿，高高兴兴地登岸，总以为到达目的地了。谁知消息传来，说在吉安已找不到适当馆舍，大家听了不禁又冷了半截。后晤得民（李蓉盛字）

兄，始悉已奉厅令分迁泰和、遂川、安福、永新四县，总馆设在泰和，其余都为阅览所。于是，大家又兴奋起来，便夜以继日，忙着分书分卡。在不到半个月内，便把二万多册图书全部分配好，近十万张卡片全抽插完。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在吉安临时办事处开了个会，讨论分迁以后办法，得民和我则搭交通车先去泰和联系馆舍。各阅览所所雇民船，均于八月二十五、二十六两天分别离开吉安。九月初旬，都先后到达目的地，两三天后，均陆续开放阅览。

总馆所雇民船，于九月四日到达泰和。我们已找好城内大街中山堂为临时馆舍，将房屋稍事修葺，将图书和设备整理好后，即借附近泰和民报社厅堂，于九月六日先行开放报刊阅览。

二、积极开展救亡工作

得民原是省图书馆采编部主任。他比我大三、四岁，熟稔世情，长于交往，有一定领导才能。且能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我那时刚离校门，学生习气较重，又无家室之累，对工作却有火辣般的热情。因与得民多一层同学关系，遇事只要先征得他的同意，也就毫无顾虑，放手做去，在业务上可说是言听计从的。此时总馆人数，除两老年人外，其余都很年轻，中有四人还是刚刚高中毕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那时购书比较困难，新书进馆不多，我们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便倾注全力，配合抗战宣传，集中搞了大量的推广工作和辅导阅读工作。

这些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可分下列四点：

1、创办《读者战线》半月刊 该刊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创刊的。那时“敌人诱和之一途已走不通了，就只剩下那冒险的一途，对华作孤注一掷的战争了……《读者战线》半月刊，恰值在这时期中问世，由是它所负的时代使命，也更加重大。”在这里我特别引用该刊发刊词中两段话，说明该刊创刊的时代背景和任务。

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刊物。内分：一般时事评论、书报评介、时事集锦及抗战文艺等。共出版了一十三期（十二、三期合刊），一至九期由我负责主编，十至十一期改由李鶴负责，最后一期则由董重负责。由于当时上层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该刊文字内容表示不满，曾多次向李蓉盛馆长提出口头警告。他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才不得不如此煞费苦心，走马换将了。但出版到第十三期时，终于还是逃脱不了停刊的命运。

2、举办战时报刊巡回展览 为了宣传抗战，鼓舞后方人民的抗战情绪，我们呈准省教育厅在本省后方几个重要城市，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报刊巡回展览。收到展品一千余件，其中有大小报纸二百九十三种，展出时均按地区分开排列，以本省为最多，达四十五种，上海、浙江、湖南次之，甘、宁、康、藏最少，每省仅有一种。杂志四百二十六种，分类陈列，以综合性的较多，占全数五分之三，自然科学及史地类最少。画报三十三种，共九十三份，其它公报小册约一千余种。尚有解放区寄来油印报刊小册四十六份，还有国外及港澳等地寄来报刊如华商报、星岛日报等。从一九四〇年元旦起，分别在泰和、遂川等地有关单位展出多次。三月十五日起至四月八日止，又分别在吉安、赣州、宁都、兴国等县、市巡回展出。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地方人士的盛情招待。在赣州市展出留言簿上，一青年参观者写道，在沦陷区后方，能看到这么多的报刊展览品，真使我感到高兴！希望能多巡回一些地方，对激励人民的斗志，是会起较大作用的。

3、办理民众夜校 总馆及永新阅览所各办有民众夜校一所，专收商店店员、学徒、及社会失业、失学青年。虽不收任何费用，但还是招收不到学生，只寥寥一、二十人。后来经我们多方了解，方明其究竟。便派遣女职工亲往附近各商店和家庭上门访问。因赣南各县劳动妇女较多，家庭地位亦较高，没征得老板娘或家庭主妇同意，他们是不敢随随便便报名的。此外，我们还供给一些书报，交他们自行管理，以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又每逢星期天召开

谈话会一次，除听取他们的意见外，还给他们讲述故事、笑话或做游戏、教唱歌等。这样一来，学生人数激增，多时竟达五十余人。

4.组织读书会 为了提高读者阅读的兴趣，和指导他们学习的方法，我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内容分时事问题讨论、文学作品研究、或其它学术专题讲演等。会前印好讲述大纲，有时还聘请大学教授或专家学者，作总结性的发言或讲述。如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就召开过一次时事讨论会，题目是《世界大战会爆发起来吗？》每次开会，除会员必须参加外，还欢迎广大读者旁听。

除上述工作外，我们还编辑了隔日墙报和每周壁报，以及馆务消息等，还建立了巡回文库和流通处，开办文化服务部等。那时全馆职工人数不多，而从事这一揽子工作的，寥寥不过三、五人。为应付非常时期的需要，为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大家只好尽量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象办理民众夜校、编辑墙报、壁报、刊物等工作，都是利用晚上来进行的。

三、挨炸后的要求

初到泰和，省图书馆原为一阅览所编制，李蓉盛也只是个负责人。一九三九年十月，厅令恢复省馆编制，并任命他为馆长，调整各股股长为部主任。是时，南昌已沦陷敌手，省属各机关单位，均陆续迁来泰和，省政府迁上田村，省党部迁泰和中山堂，另拨孔子庙为省图书馆馆址。

在省馆未迁入孔庙以前，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四日，我馆不幸挨炸，四周落弹七枚，幸均未命中。八月十三日，敌机五架再次轰炸泰和，省馆宿舍及厨房落弹二枚，所幸重要图书器具，早于七月八日悉数搬往泰和河南岸何家祠内庋藏，大部分职员亦迁往该处办公，故损失甚微。只有青工小戴和我躲在一起，他头部被碎片炸伤，血流满面，我立即送他到附近县医院包扎诊治；李蓉盛馆长和

熊振湜正出差往永新编造善本书清册，突然接到本馆被炸电告，竟徒步赶来泰和，归来后，由于旅途备尝艰苦，两人都先后大病一次。

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李馆长曾在一次全馆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化的要求。他说，在长期抗战时间，我们的工作该怎样去做，可分三项言之：（1）要科学化：自采访图书做起，次则登记，再次分类编目、典藏，以至于阅览、出纳等，都要合乎图书馆学的办法，无论何时何地，绝不可手忙脚乱。不但对图书管理如此，对事务管理也得有一定的步骤和致密的办法。（2）要研究化：凡在馆工作人员，无论在哪一部门工作，都是要与书报接近的。我们的对象是读者，我们须得有丰富的知识，要有一种不断学习的精神，时刻留心研究自己所应做的工作。例如阅览、出纳需要熟练精细，对于馆藏都要一清二楚，否则，读者一问三不知，甚至吵起架来，使读者不能满意，因而产生对馆不满。（3）要合作化：图书馆各部工作要联合，不能各自为政。阅览方面不知采访了什么书，新书编目了什么，典藏方面少了书不知道。结果，全馆不是整个的，而是散漫的、无纪律的，成绩当然谈不上。上述三化的目的是合乎图书馆学和经济原则的，不能浪费时间与金钱，要以最少的人力和财力而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要担负起供应后方民众精神食粮的责任。

四、我被迫离开了泰和

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我因受到特务的迫害被迫离开了泰和，离开了双亲和未婚妻，离开了自己曾倾注过心血的图书馆事业，只身前往沦陷区前线，从事战区教育工作，直至抗战胜利以后，才又重新归队。

据说我离泰和不久，日敌窜扰泰和时，省馆曾搬去兴国县城开
(下转第96页)

抗战时期江西的驿运事业

周 希 敦

一、战时驿运的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后，机械运输工具之制造遇到困难，外国来源亦受封锁影响。为适应战时需要，加强运输效能，只有发挥我国巨大的人力、物力潜在力量，以弥补机械运输之不足。因此，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全国驿运会议，决定复兴我国驿运制度，接着各省驿运工作相继展开。

驿运的特点，就是分程接运，或分段输送，可以说是省时、省力而又持久有效的运输方法。我们把潜在的人力、物力和器材充分调动起来，可以节省油料、器材和资金，是战时运输的有效途径。

战时驿运，包括兽力驮运，依靠人力的舟、车联运，还有汽车、轮船配合使用，这是驿运新的含义。从驿运性质说，非普通商业机关可比，其一切人力、兽力、器材之征调募集，不专赖国家经费雇用，而系出于义务供应，属半公半义务性质，所以也是动员群众的一种方式。

二、本省驿运机构的建立

一九四〇年初，江西省建设厅鉴于机械运输器材，燃料来源不易，即有倡设人力、兽力运输之议。由该厅设立运输研究会，开始筹备。但同年七月间全国驿运会议后，遵照中央规定于同年十月一日成立省驿运管理处。将省战时贸易部汽车队和船舶总队的船舶管

理业务并入。由中央派建设厅长杨绰庵兼任处长，副处长杨根南（后为杨得任）。

该处内部分设运输、业务、总务三科和视察室、汽车队，外部设驿运管理区、分段、站，并另设有驿运总段。为适应当时运输环境之需要，随着战局之推移，外部机构常有调整。成立初期，曾于萍乡、吉安、赣县、浮梁、上饶、南城、宁都、樟树等地分设八个驿运管理区，另于吉安、宁都、赣县三处成立第一、二、三驿运总段。一九四一年一月底，遵照中央规定，将上项机构一律裁撤，改在吉安、宁都、赣县、樟树、南城、上饶、浮梁分设七个支线驿运总段，增设驿运站十处，并分别划定其业务区域。同年五月底，因紧缩开支，将七个驿运总段裁为三个驿运总段，另在河口增设一个直属分段。

该处经费，在成立时曾由中央拨发开办费三十万元，但是经常费及各段站员工薪饷、办公费等则概由征收驿运管理费项下开支。至一九四二年度江西总预算内，虽则有驿运处经常费二十万元，仅驿运处员工薪金及办公费，尚嫌不敷。至于各段站员工薪饷、办公费，只能仍以营业收入项下支给。为鼓励员工卖力，由业务费项下拨给20%为员工奖励金。

由于驿运专业人才很缺，人民大众对此不甚了解，因此，除扩大宣传外，驿运基层干部之训练实为当务之急。故第一期训练班于一九四一年在省政干团建设人员训练班举办，学员都是由各段站抽调现职人员，结业后返回原单位。以后举办的，还酌收外界社会青年，施以短期技术和精神训练。

三、运输管理

根据本省地理条件，河道纵横，自以水运为主，而以陆运配合联接，形成一个庞大驿运网。水业又分轮船运输与帆船运输二种，均营载客或货运业务。陆路除自有汽车外，以人力手车分站接运为

主。兽力驮运，受着地理条件限制，为数极少。现就运输种类分别简述如下：

1、轮船运输：驿运处自备轮船在赣江行驶者，计有煤轮五艘，柴油轮六艘，维持赣（州）泰（和）、吉（安）樟（树）航线班期。其他商业轮船在赣江有二十余艘，信河、饶河间有十一艘，往来鹰潭、波阳、乐平间营业。

2、帆船运输：帆船搭载量及速率虽较差，然其数量大、航行耐久、成本低、运价廉等特点，实为本省货物运输之主体。本省河流纷岐，船舶流动无定，普遍统制，比较困难。驿运处自备帆船，数量甚微。仅赣州总段有帆船数百艘，行驶贡水会昌、筠门岭一带。因此，必须利用广大民间工具，以适应战时运输需要。

3、手车运输：陆路运输，除汽车外，包括人力、兽力运输；人力为手车、肩挑等，兽力为骡马等。只是本省骡马出产少，而山岭地带亦不适宜牲畜运行。人力肩挑，因耗力多而运量少，自以利用手车为宜。驿运处自有胶皮双轮车百余辆，并曾设计制备三轮手车和双轮竹架手车，行驶黎川、光泽、浮梁、婺源等县。但是大量手车均属民间，有以运输为业者，有为农民自行置用者，均无组织，急须统筹编配，按段组织，分站接运。手车运输，在省际联络间亦居重要地位。如萍乡、芦溪、莲花、界化垅直达湖南；大余、定南至广东；河口、光泽进福建；上饶、玉山通浙江；浮梁、婺源往安徽，均可利用手车运输。

那时，驿运处尚有汽车二十余辆，是由省战时贸易部运输大队拨来，队长为陈孝儒，专门运送省内外重要贸易货物，行驶会昌、筠门岭等处，并设有汕头办事处。有时，汽车还配合铁道，抢运军公物资，起到了一定作用。

驿运处曾在战时省会——泰和近郊区域，试用马车短途运输，以载客为主，但车马不多，成效甚微。

运输管理，主要在管制驿运工具，统一调派。驿运处公有运输工具，虽每年有所添置，为数不多。而帆船、手车遍及全省各地，

亟须集中力量，以便灵活运用。一九四一年秋，驿运处曾举行车船、驮畜登记编队工作，依照江西河系划分为四个督编区，以吉安、鹰潭、南城、赣县四地为中心点，每区酌设三组或四组不等，各组均以驿运分段所在地为办公地点。一九四二年初步统计，其登编总数为：手车8376辆；帆船2572艘；入驮3501人；牲畜212只。同时，核发帆船、手车、入驮登记表证160,000枚及牌照20950件。

其次，订定运力价格，管理运输商行。本省私业商行及转运栈，数达五百家以上，包揽商运，且及公运，手续费超过运费百分之十，甚至扰乱运价，造成黑市。为贯彻政府限价政策，驿运处按照本省各河系运输情况之差异，各地物价之高低，运驮船民生活实际需要及其工具成本之多寡，核定各主要路线运价，并报请省政府通令各县协助，交由各地驿站管理。同时，通知各驿运区加强管制运输工具，统一收运货物，禁止行帮及运商自由揽运货物，检举违法黑市，以期统制货物的运输。

四、业务概况

驿运处业务，按其性质分为军、公、商、短途客运及临时抢运等项目：

1、**军事运输**：江西位居东南前线，为第三、第七、第九三个战区共辖。军运较为繁重，曾先后承运三战区弹药，和三、七战区的军粮等。不过军运总数中，由各驿运总段负责运输的，仅一小部分，而各总段拨交船只、车、轮由各部队自行押运的军用品，却为大宗。

2、**物资运输**：是指公、商物资运输而言，包括盐、粮、钨、锡、茶、煤等主要项目及其他接济后方各省之物资：如服装、药品、饮食品、烟叶、日用品、农产品、杂货等项。据统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内，总产量为五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余吨。此外，本省各机关批运之公物及中央文化驿站免费代运的各种书籍、

刊物，以及江西邮局给运的一部分邮件，运量亦甚可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盐、粮运输。一九四一年十月，驿运处设立赣县、鹰潭两运输食盐办事处，接运信丰、筠门岭至赣县、鹰潭至樟树、韶关至赣县及樟树至新喻等处食盐，仅仅三个月即达31,335公担。省内粮食，是与省田粮管理局订约，分段承运。如临时省会——泰和用粮，多从永新、吉安等地运来。当时的盐粮运输积弊较多，为掺杂短斤，且发生多起案件，如老河口运盐事件，酿成命案，后由赣州盐管局处理。

3、短途客运：一九四一年间，曾举办由波阳至浮梁、鹰潭，宜春至樟树，萍乡湘东至湖南醴陵各线民航快班，补助机力运输之不足，一时行旅称便。

4、临时抢运：是于每一战役发生前及延续中进行。如一九四一年五月间，浙东战事紧急时，对本省公商各机关存宁波、温州、金华等地重要公物之抢运。又如一九四二年一月间，日军发动赣东攻势时，对经济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暨本省各机关堆存鹰潭之油类，以及中国茶叶公司大批茶叶抢运。同年六月樟树危迫时，吉安总段奉命调集大小帆船百余艘，水轮数艘，逐渐将接近战区各地之人口物资作有计划之疏散等。

根据驿运处《征收驿运管理费办法》，在指定办理业务路线内，对以运输为职业的车、船、驮、畜，经各级驿运机关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而承运各级驿运机关所交货物者，按照运费数额，陆运征收5%，水运征收10%。这样，虽然增加了驿运收入，却加重了公私运输费用负担。从营业比较看，该处一九四一年六月前运费占71·2%，管理费占28·8%，运费超管理费很多。六月后，运费减到与管理费几乎相等，说明从机械运输到人力运输的变化。从运量比较看，同年六月前，盐米运占88·7%，军公占2·04%，其他占9%；六月后，各类运量比例还是保持原状，而总数却比六月前有成倍的增长，反映发挥人力运输后情况。

统一运力价问题。驿运处规定：各驿站应详细调查就地物价，

确立原订运价标准，精确订定分等运价，以保持平衡公允要求。但是军运运价，一般较低，除商请酌量提高外，采取回程尽先派运货物办法，以达到“差役平均，利益相等”原则。

以上是就本人所知抗战时期我省驿运事业办理经过的梗概。当时驿运虽然起到一定的疏散物资作用，但对人民群众的干扰和限制，亦受到不少影响。自一九四四年秋日军侵占泰和后，江西临时省会迁往宁都，省驿管处亦随同迁往该处，业务随之大减，但情况不详。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省政府迁回南昌，不久该处即告裁并结束。

1985年5月25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供稿)

(上接第115页)

库，收支由李刚队长批条。

缉私队员工薪，和一切旅差什费，会计室按月一笔拨给，由李刚转发。因该队人员来去不定，工薪高低常有变动，我对该队的人员多少，那些人领取工资多少，一点也不清楚。只知道该队的帐目数额有时很大，有时一元无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管会随江西省政府迁到宁都青塘墟后，李刚队长没有随到青塘，王鹤林只见到过两次，此后再也没来过。物价管制委员会成立以后，物价照样波动飞涨，老百姓、教师、小职员叫苦连天。缉私队缉获的物资堆积如山，最后却是一笔糊涂帐，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我们奉令就地办理结束，人员遣散。结束后根据决算表，报经正副主任签字批示，余款悉数上缴金库。我亦奉调到江西地质调查所会计室工作。

战时江西官场现形记

赵昌蓉

一、敌兵犯境官先乱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江失守，南浔铁路沿线敌我双方展开激战，南昌市民人心惶惶，机关团体纷纷疏散。

当时我在江西省政府秘书处会计室工作，身在江西省行政机关的最高层，却未看见一丝一毫政府领导民众沉着应变的样子，一听到日军要打过来，当官的首先乱作一团，霸车封船，只管自己逃命。

省府各厅处，表面上留有负责人员在南昌，重要的档案文卷已经分批迁往吉安、泰和遂川等地，一些机关、学校、银行，以及有钱有势的阔老也早已迁走。然而普通的老百姓，由于无钱、无势、无车船，只有靠肩挑手提，扶老携幼步行逃难。

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间，由于万家岭大捷，战局稳定下来，疏散才自然停止。但此时的机关工作则已陷于半瘫痪状态。

二、后房秘书与夜秘书

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是主席熊式辉夫人顾竹筠的福建同乡，又有亲戚关系，故而受到熊式辉的信任，刘在省府秘书处任用了一些福建同乡，成为福建派。他把同乡陈憩园安插在地方法院当书记官，又在省府秘书处给他安排一个晚上的兼职，名为帮助文书工作，实则是刘的清客，每月送佚马费一百元，故人称陈为“夜秘”。

书”。

刘又假借处理机密文件需要，引用福建同乡黄林荪，在秘书长办公室的后房办公，每月支薪二百元，人称“后房秘书”。

这些人，都是秘书长刘体乾因人设事，滥用职权引用的私人，都是编外人员，他们的薪金是经熊式辉批准在烟税协款内开支的。

原来省政府只有熊式辉有一部小汽车（各单位除外），后因抗战局势紧张，人员物资急需疏散，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汽车，除分给各厅外，秘书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出纳股长邵德，业务股长邓警铭，交际股长刘存忠（蒋介石的学生，是宋美龄当面介绍给熊式辉的），秘书长刘体乾，主任秘书陈轩霞（熊式辉的老部下）都分到了，连后房秘书和夜秘书也一人分到一部，刘体乾实际拥有三部。

平时，他们可以进出小车抖威风，疏散逃难时他们也有办法了。其余各科室人员想搭车只有靠私人关系想办法，然而那实在是很难的。

三、贩卖鸦片烟土的大老板

前面谈到的烟税协款是什么款呢？说起来滑稽得很。

原来国民党政府一面禁烟禁毒，还煞有介事地设了一个禁烟总监，蒋介石亲自兼任禁烟总监以示郑重；而同时又规定，只要交了烟税便可自由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因此，贩卖鸦片的后台大老板是谁？当然是不说自明的了。

熊式辉在上海当警备司令的时候，为蒋贩运烟土而巧立税名，因而，大赚其钱。蒋因熊为他办事有功劳，就假借协助江西税收为名，每月在烟税中拨给数十万元作为补助，至于总额共收多少？如何开支？出纳股长邵德另外有一本账，由他侄儿小邵拐子记账，也没人敢查问这个账目。我虽然记了此项外账，但未经手记细账，也没有月结年结，因而这笔账是一笔糊涂账。

四、大师傅义正词严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是旧历年除夕前一天，那时省府各厅处留下的人员大部份都是单身汉，配有大小汽车和司机，待令随时撤退。

出纳股长邵德见大家闲坐无事，提议来一次聚餐。在坐的人一致赞成，于是委托主席小厨房代办，没想到小厨房的大师傅张立三对此非常气愤，他说：

“大炮在耳边轰，飞机在头上炸，什么时候吃它下的蛋也不晓得；街上连走路的人都没有几个，还想办酒席过年？拿什么东西来弄？不打算走的，白天大叫抗日的家伙，晚上敌人来了马上变成迎敌分子，有的县不就是这样吗？我是气得饭都吃不进，还有心思搞这个名堂？！”

张立三这番话义正词严，说得大家面红耳赤，邵德气得面色发青，但因张说的句句是理，又不便发作。只好强忍愤怒冷冷地说：

“不办就不办，发这些牢骚做什么？”

张立三边走边说：“你们有汽车说跑就跑，我们的死活有那个来管？”

在场的人无言以对，不欢而散。

五、熊式辉在南昌撤退前夕

万家岭大捷以后，战局稳定了一个时期，虽然远方时有大炮声传来，也已习以为常，大家都觉得南昌城垣一时无问题，市内依然灯红酒绿，毫无战时景象，谁也没有想到南昌市很快就要沦陷。

日军强渡修河后，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占领了安义，进逼南昌。但是，九战区前敌总部并没有把这一紧张战况通知江西省政府。幸而江西防空司令部安义防空哨将这情况转报给省府。这时，敌人已

逼近西山万寿宫，南昌已能清晰地听到炮声，省府各厅处留守南昌的人员非常紧张而又震惊，头头们齐趋省府要求下令撤退，坐守南昌的省府秘书长刘体乾，就向临时代省主席的民政厅长王次甫身上推。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正在南岳参加高级军事会议，二十二日，王次甫把这消息用电话报告了熊式辉，熊回话说：“即归”。在南昌留守的省府所属官员，职工，司机都坐在省政府等待命令。当晚约十二时，熊式辉来到省府时，大家都从四面八方拥出，我也跟在其间。走到最后堂屋会议室（即现在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处后楼原址）的台阶上，熊才突然止步返身向着大家很轻松的说：

“我们不是作好了疏散的准备吗？大家要走都赶快走就是，要下什么撤退命令！”

听了熊式辉此话，如奉纶音，于是大家迅速回散奔走相告，在南昌的各机关二十三日各自抢封民船向吉安撤退。

六、撤离省城

二十三日中午，我办完几件私事回到省府，一进大门，偌大一个省府，只见到几个武装门卫，待我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只有朱麻子同肖治吟（他是熊式辉宠爱的旧部肖治平的兄弟）。我问他们：“邵股长呢？”他们气嘟嘟地说：“跑了。”我说：“他安排了我同他一道撤退的。”肖冷笑道：“这是什么时候？他还会安排你！”我又走到西大街省会计处，我寻思，我一个单身女子找一座位总不会困难。哪知会计处办公室满地纸片，财政厅门口停了一辆汽车，旁边站了几个家属尚在争吵，我这时才如梦初醒，感到自己太幼稚，太天真了。在此紧急关头，东西碰壁，街上行人稀少，真是空街空巷又空城，更增加了我恐惧的心情。所谓同事、同僚、首长的情谊关系何在？奈何！奈何！

正在紧急关头，碰上了龚以奎老师，后来是在他和建设厅杨厅

长的帮助下，我才得同他们一道撤退。三月二十七日，日军进占南昌，此时已是一座空城。

七、省参议会幕后种种

一九四〇年，我来到刚成立的江西省临时参议会任会计股长。

当时参议会的会址在遂川五峰书院，议长彭程方、副议长王有兰，秘书长刘凯钟，主任秘书周维新，议事股长黄寿颐，总务股长刘郁华，参议员名额有五十多名，由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中共及进步爱国人士二十几名，常来开会或驻会参议员有欧阳武、谢远涵、任寿祺、王枕心、熊在墀、辛安世、何人豪、薛秋泉、胡兰畦（女）、熊大蕙（女）、刘家树等，大部份都是由各县议会推选出来的，共产党员参议员名额九个一直空设。省参议会每期有驻会参议员十人，每年开大会一次，每月由各厅处长到会作工作报告一次，参议员分别提出质询，必要时在两周内带所属单位主管作补充报告和解答。

据我所知，参议员们对建设厅的工作认为很满意，杨厅长在参议员中间应付得也很周到，在当时物质供应紧张困难的情况下，他从福建、广东、湖南弄到一些供应，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参议员对民政厅的工作（主要是对各专署及各县），有褒有贬，第四区专署的做法很受称赞，其余几个专署及所在县的参议员意见不少，尤其是对保安团的质询，每次都是在熊式辉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并且要保安司令廖士翘来作解答。廖总是以军务很忙不能脱身，拖延一个时候。

有一次熊式辉作工作报告时，欧阳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意见：“释放政治犯”。并且说：“我们的右脸给日本人打肿了难道还要帮着他们把自己的左脸打肿吗？”熊式辉面红耳赤，没开完会就退场了。有的参议员为欧阳武捏把汗，但这位老都督仍然谈笑风生。

一九四三年，江西竞选国民参议员，名额十个，规定要通过临

时参议会选出。参加竞选参议员的人不少。在酝酿其间，我自早到晚都周旋在这些参议员中间。参议会每日要开五、六桌菜饭。我那时兼任总务股长，恐怕经费不够，于是向彭程万议长请示，彭议长对我说：“你大胆去做，菜饭还要体面些，钱不够我会向省政府要，你年轻不了解，有三种人不能得罪的，第一是议员，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则是名流、学者；你大胆去做，要做得体面漂亮，你若显得小气，他们会骂我。”

当时参加竞选参议员的人是煞费苦心的。刘凯钟秘书长也参加竞选活动，但他没有钱，他的竞选活动，系由他带来的王秘书出面争取选票。王秘书要我去请一个名厨师，以刘秘书长名义出面请客，至于钱由谁出，他没有明确表示，我就请凯园的名厨师办了十桌高级鱼翅席。

这个事被议事股长黄寿颐知道了（他是王有兰副议长的人），他告诉主任秘书周维新（他是彭程万议长的人）。周主任将我叫去问明了情况，并要我自己去对彭议长解释。我来到议长办公室，彭议长满脸的不高兴：“刘秘书长请客的钱是谁出的？这个帐要算在他本人身上，不能出公帐。”

我下楼将此话转告了王秘书，王说：“这好办，一共化了多少钱，请算一下。”经核算，包括烟酒，一共化了二百八十余元。王秘书就打了一张借条由刘秘书长批示作为借支，这一借就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到临时参议会结束而不了了之。

当时在遂川亲自参加参议员竞选活动的有：王又庸、何人豪、薛秋泉、刘家树、辛安世、王枕心、王德舆、刘凯钟等，请酒席是刘家树带头办的，这些竞选者都先后仿效。

有一天王有兰副议长问我竞选参议员的人请酒的事，我大概说了一说，并且把刘秘书长请酒席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大家都请了，我弟弟王又庸参加竞选也就不能例外，何况他本人又在这里吃了别人的，麻烦你同黄寿颐主任协商办一下，需要多少钱记在我的帐上。”

竞选参议员的各班人马都化费了不少心思，其中竞争最激烈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几派。投票日期的前三天，刘凯钟秘书长不等会议结束，就动身到重庆去了。投票揭晓前夕，何人豪、薛秋泉与刘家树当面捶桌破口大骂；辛安世与熊在墀也争吵，各班人马都参加起哄。

最后，通过江西临时参议会，选出了十名参政员。除张国焘是蒋介石电报江西省政府主席指定出选的外，其余竞选的人都各有各的后台背景，其实名单早已内定好了。这十名参政员是：张国焘、罗隆基、王枕心、刘家树、王造时、许德珩、王德舆、李中襄、王又庸、燕延骏。

八、所谓“物价管制委员会”

一九四四年初，江西省政府感到当时各种物质供应困难，布匹粮食不但价格高涨而且奇缺，因此成立物价管制委员会，地址在泰和上田村肖氏宗祠，主任曹浩森，副主任胡家风，主任秘书张泰会，文书、会计各二人，出纳一人。还有一个缉私队，定员三十人，队长李刚，二个副队长，一个叫王鹤林。缉获的物资由该队专人负责保管，保管地点也不让我们知道，仅有一次，李刚对我说：

“现有一批从新喻、新淦缉私而来的土布数千捆，由王鹤林副队长等押运，即刻就到，因土布太多无处可放，只有放在肖家祠堂内，你们会计室二个人帮着点数证明。”

我觉得这事一直与我们无关，我作什么证明，当即表示不同意，但我也知这人厉害，我接着说：“我请示了胡家风副主任后再说。”经请示，胡秘书长认为这不关会计的事，不必作正式会计制度及手续办。并要李刚自己处理。

次日，李刚宣布这批土布没收并变价拍卖，布匹变价款经胡秘书长批示，由会计室暂代作特别收入帐册登记，现款由出纳收入存

(下转第108页)

八年离乱六记

万永福

背井离乡 颠沛流离

一九三九年，日军逼近德安，敌人飞机不断来南昌市区轰炸，市面人心惶惶，官员们更是带头逃走，南昌岌岌可危。我的企业和员工雇不到汽车，只好雇民船二只，将全部货物财产装走，循抚河去临川。当时滩干河水浅，舟行甚缓，沿途又有无数关卡和散兵敲诈勒索。约经一个月，才到达抚州市。我万般无奈，只能依靠出售存货为生。而当时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当地保甲长，恶似豺狼，常以征兵相要挟，甚至半夜抓人。在此情况下，我们在抚难民遂发起组织九县旅抚同乡会，推裕民银行万君勉经理任理事长，我也是常务理事之一，与当地政府进行合法斗争，并向旅抚工商界募捐，筹建同乡会馆。同乡会确为难友们做了一些公益事，如施送医药，施棺救贫，对当地县政府作抗兵、抗税的斗争。当时，省绅伍毓瑞、龚师曾等也在赣东，有时他们也肯仗义执言，支持难胞们的正义斗争，所有这些，都深得难胞们好感。

南城遇敌 洗劫一空

一九四二年，日军分几路向赣东、赣南迂回进军侵略，抚州又首当其冲。我不得已，被迫第二次逃难。仍雇小船溯抚河而上去南丰，不料船到南城万年桥时，却听见枪声从上游而来，一打听，才知敌人已窜在我们前头。一时两岸秩序大乱，敌人在南城一带放火

杀人，封船劫财，欺辱妇女，无恶不作。一些地方官吏在人民面前凶如虎豹，在敌人面前则驯似羔羊。这时我家货船被抢走，我父亲被捉去当苦力，我伯母被散兵打得遍体鳞伤，一家老小只得徒步循小路逃往南丰，沿途之苦，罄竹难书。在南丰的几年，靠经营行商度日，天天提心吊胆，更怕保甲长抓兵抓夫，整天犹如惊弓之鸟，真是度日如年。

货车被烧 损失惨重

我家十余口，靠做行商为生，那个年头，经商不易，途中到处有抢劫，一经碰上，轻则失财，重则丧命，谋生维艰。一九四一年，我在金华贩运一批货物交铁路托运至鹰潭，谁知车厢在横峰失火，烧得片木无存，几经交涉，时隔年余，才由铁道部照章赔了“损失”。当时货币天天贬值，所得赔款，竟不及成本二十分之一，只好自认晦气。从此，我家道更趋衰落，生活日渐下坡。幸我父亲被敌人抓走后逃到陷区南昌，经朋友接济，又潜回吉安，父子相别一年，全家又团圆了，真算是虎口余生。

虎口争食 屯溪办货

一九四三年，抚州重光，我家又回到抚州，重操旧业。当时海口封锁，工业品只能通过屯溪内运，而临川到屯溪只能循小路步行，千里迢迢，只能靠铁脚板做行商，为了追求利润，也只有这一道途，才能谋生。当时还只能雇独轮小车运毛边纸去屯溪，再从屯溪带布匹百货回来，钞票夹藏在毛边纸中，靠天保佑。如果中途遇匪，则人财两空；如果侥幸人货平安到达，则利市可观，二者必居其一。当时中途被劫者只有仰首呼天而已。抗战时期的商人，真是几家欢乐千家愁，尤其是中小商家，风里来雨里去，谋生不易！

历尽艰辛 上海走险

一九四三年，我只身由宁波，经镇海乘德平轮去沪办货，沿海交通条件甚苦，乘客拥挤，秩序混乱，是条险道。但我家吃饭人多，俗话说坐吃山空，何况几遭损失。不得已，我只有铤而走险。我抵达上海码头时，心里十分害怕，甫登岸口，即有外国人把关检查，他见我白白胖胖，疑是官员，我即用沪语答话，我说：我是商人，是由江西来上海经商的，并出示难民证（旅抚同乡会所发）。他不理不睬，抄身尤严，并用手指比划，似乎问我：你带了金条没有？我仍用沪语回答：“我没有。”他一无所获，始悻悻而去。那时，我真吓出一身冷汗，怕坐洋牢，后悔不该来沪。后来在沪小住，并托友好赊购了一大批日用百货，仍循宁波进口，那时货运困难，在宁波等了几十天才提到货物，经溪口、金华、鹰潭而运到抚州，几经波折，总算安全到达。不久，宁波又沦敌手。非怪那时有人说，商场如赌场。这种押宝式的买卖，只能将命运交给上帝。我这次深入虎穴拔虎牙的险事，总算侥幸获利，使我濒于破落的家业又获得一线生机。

赶走倭寇 换来豺狼

一九四五年，日军被迫投降，佳讯传来，万民额首称庆，抚州各地大放鞭炮，难民更是喜出望外，兴高彩烈，在抚工商友好纷纷请酒志欢，共庆苦尽甘来。我也知道我的原店房被毁，住屋被拆，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但一想到颠沛流离、惊惶受怕的生活已经结束，重整家园心切，我第一批就回到了阔别八载的故乡——南昌市。南昌，这座省城，这时只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成堆；市内还能见到一些零星残敌，歹徒仍出没无常，入夜秩序更乱；除中心区洗马池、中山路外，郊区更是一片荒凉，人迹稀少。

唯独百花洲、江西大旅社、南昌市商会、万寿宫等照旧，许真君亦无恙。当我们正在庆幸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满怀重建家园的欢乐时刻，谁料送走了瘟神，又换来了一群又一群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接收大员。这批豺狼，抢夺战果竟变成了“五子（即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登科”的新宠儿，大肆抢占国家财产，给灾难深重的广大人民又带来了灾难。当时，人们不禁要问：人民何年何月才能得到解放？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天总是会来到的。一九四九年五月，果然这一天来到了。

（省民建、工商联供稿）

第十七辑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46	9	第五军	军
160	7	点钞	点钱
161	11	秘决	秘诀
162	倒7	硬学	硕学
177	倒4	地下党委	地下党员
185	倒5	二百来户	几十户
188	倒6	二十几户	五十几户

日机轰炸“黎明号”目击记

一九四二年农历五月上旬的一天，日军飞机追击一艘国民党军的军舰，追到乐安河万年县石镇街境内，然后对这艘军舰进行轰炸。然而，这艘军舰在群众帮助下脱险了。当年目击者吴国祥（六十六岁，原国民党石镇警察分局警官）、孙金水（五十三岁，商人），和当年受害者李细保（七十岁，被炸房主之一）、李会坤（七十七岁，被炸房主之一），李海林（农民，当年“黎明号”舰上水兵住他家里）等人回忆说：

一九四二年，即民国三十一年，端午节过后，时正涨水，鄱湖水满。一天，日军十多艘武装汽艇由长江开进鄱湖。国民党军鄱湖司令部发现日艇行动后，即刻派出“黎明号”、“福兴号”两艘军舰迎战。“黎明”、“福兴”两舰在湖口附近与几艘日艇相遇，双方摆开阵势，开起火来，经过一番激战，双方互有伤亡。此时，日军汽艇约有七八艘陆续赶到，前后十几艘汽艇同时向“黎明”、“福兴”两舰冲来。“黎明”、“福兴”见日艇势众，只好边打边撤，最后向余干方向驶去。

“黎明”、“福兴”两舰撤至余干马背嘴停泊。不一会，几位群众前来报信，说一队日军步兵约七、八十人已向马背嘴开来。“黎明”、“福兴”得到急报，立即起锚，掉转头向余干康山方向开去，不想日艇早已在康山设下埋伏。当“黎明”、“福兴”两舰刚刚驶入康山时，立刻被十多艘日艇团团围住，双方随即又拉开战幕，据说“福兴号”在战斗中不幸被敌击沉，舰长金××身负重伤，为国捐躯。“黎明号”则朝敌一艘汽艇猛烈开炮，这艘汽艇被击中，另一艘敌艇急忙前来救援，“黎明号”又向前来救援的汽艇

冲去，敌汽艇来不及躲避，立即被撞翻，两艘汽艇几乎同时葬身湖底。黄昏时候，“黎明号”冲出重围，离开鄱湖，顺着乐安河连夜向石镇街方向开来。

第二天上午十时许，“黎明号”开到了石镇街河内。人们一听军舰来了，都跑出来看。不到几分钟，北寺山，对河李家沿岸都挤满了人。没多久，一架飞机沿乐安河直冲石镇街上空飞来，这架飞机在石镇街上空时而盘旋，时而俯冲，循环往复，足足找了几十分钟，终于在石镇街河内发现了目标。起初人们不知是敌机，没有跑开，及至飞机在上空盘旋时，大家才知是敌机来了，这时，人群纷纷向四处逃散，石镇街上有的商号急忙把店门关闭，有的来不及关店门就往屋里躲了起来，还有的人携儿带女往屋外逃走，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顿时，石镇街处于一片慌乱之中。

这架飞机发现目标后，立即返航复命去了。“黎明号”舰上人员，对敌机的跟踪早有戒心，他们趁敌机返航复命之机，迅速把舰只开到对河李家堤岸边一棵大树下停泊。抛锚后，他们把舰上的枪炮子弹和军用物资一一搬上岸，以防敌机轰炸。程舰长对士兵们说，敌人决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要来轰炸，我们作好准备，给予还击。随即命令士兵在堤岸边架起枪炮，迎击前来轰炸的敌机。当地群众见后，连忙进言道：“千万不能打，要打整个村庄将会被炸毁。”程舰长考虑了一下，为了对河李家的安全，只好命令士兵收起枪炮，迅速隐蔽起来。

十几分钟后，这架日机“翁翁”地又冲石镇街飞来，盘旋一阵之后，见所发现的目标消失了，岂肯就此罢休，于是，不停地在石镇街上空飞来飞去，继续寻找目标。这架敌机飞得极低，几乎是挨屋顶擦过，发出“翁翁”闷雷般的响声，为了显示淫威，它还不时地用机枪朝地面扫射。后来，这架敌机在“黎明号”附近上空盘旋一阵之后，猛地俯冲下来，投下两枚炸弹，“轰隆”一声，一颗炸弹在河里爆炸，溅起一丈多高的水柱，还有一颗投入河中，无声无响。这架飞机投下两枚炸弹后，又用机枪扫射了一阵，然后才翘

起尾巴走开了。

没过多久，这架飞机第三次飞来了，在空中盘旋之后，又投下两枚炸弹，一枚落在对河李家村边，炸塌了一幢靠近堤岸的旧式民房，幸未造成人畜伤亡；另一颗落入河中，没有爆炸。敌机见两次投弹都未击中，便疯狂地用机枪向地面扫射了一阵。之后，又只好“翁翁翁”地飞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这架飞机再次飞来了，先是一阵机枪扫射，接着投下两枚炸弹，在“黎明号”附近爆炸了，喷起两股几丈高的水柱。“黎明号”被震动得剧烈地晃荡起来，这下敌机满以为中了目标，于是，洋洋得意地飞走了。

敌机走后，当地群众对程舰长说，呆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一旦被敌人发现，敌人是不会罢休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军舰开到安全的地方去躲避一时，程舰长听后，无限感慨地说：“惭愧！惭愧！国难家仇，何时才能报！”但为了保全“黎明号”，他还是下令立即离开这里，向乐平方向开去。“黎明号”直开到乐平张家桥这个地方，才停了下来。张家桥有条小港，直通乐安河，两岸古木参天，遮天蔽日，“黎明号”便开进这张家桥港汊内，舰上再覆盖了一些树枝，就在这里隐蔽起来。

后来，日机连续几天飞到乐安河上空，寻找“黎明号”的下落，结果一无所获，日机也就没再来了。

“黎明号”在张家桥港汊内停了几个月后，才开回石镇街河内停泊，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黎明号”才开回南昌待命。

(汪世平、胡厚清整理)
(万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回忆日军侵占湖口的一些见闻

孙渺生

在纪念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对日军侵占湖口的一些所见所闻，作了一次回忆。我们现在回顾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对今天进一步认识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意义也许不无裨益。

一、沦陷之前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侵略军进逼彭泽马当。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马当设防线，利用江面窄、水流急、两岸山峰陡峭的地形优势，将数以百计的帆船载石沉没江底，企图阻塞日本兵舰航道。由于日军采取对策，国民党军中有人通敌，很快地就突破了马当封锁线。

国民党军队在马当修筑防线的同时，从彭泽方向调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奔赴湖口，分驻在三里、马影的学校寺庙里；还征派民夫在老台山一带的山头大挖战壕，好象要与日军拼一死活。可是，后来竟一枪不发，于五月间向九江方向撤退。

日军尚未侵占湖口之前，约有一两个月时间，敌机三架、六架、九架成群，经常侵入湖口、九江上空，进行侦察、扫射、轰炸，闹得民心惶惶。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大叫挖防空洞，成立防空小组，设立瞭望哨，在月亮山古城楼上挂起一口大铁钟，分配哨兵守候，当听到飞机响声，便敲钟发出预备警报或紧急警报。每当警报钟一响，那些老爷、太太们就挤进防空洞。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进防空洞的资格，每当飞机一来，只好躲藏在桌子底下，或者跑到大洼

塘、洋港和山洼里。当时几乎天天闹防空，街上冷冷清清，贩鱼卖菜的也寥寥无几，只有偶尔出现穿着绿衣服装、背着湖北条子的国民党士兵在街上巡查。

湖口县城，由于地形显要，日军多次作为空中袭扰的目标。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敌机多架窜入湖口县城上空，疯狂扫射，轰炸长达一小时之久，沿江一带的房屋顿时变成一片废墟，炸死炸伤老百姓五六十人。县城西门国民党一艘军舰也被炸毁。第二天，又飞来九架日机，反复盘旋投弹、俯冲、扫射约一小时，受害的有三里、马影、凰村、文桥、流泗等地的许多村庄，光三里乡戴家垅孙百仓村附近就落弹四枚。

同年六月间，县城即将沦陷，县城的工、商、学界人士各自扶老携幼前往山区逃难，寻亲找友，借宿容身。城内的船民带领老幼，驾船摇桨，日夜兼程，逃往都昌、波阳等地。县城附近的农民噙着眼泪，抛弃田园，牵猪赶牛，背井离乡，逃到文桥、武山、江桥、舜德等地，过着餐风露宿，忍饥挨饿的难民生活。

六月三十日，日军一千余人，由彭泽侵入湖口棠山附近。七月一日清晨，从棠山方向响起了炮声、枪声。第二天叭冬、叭冬响得更近了。七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凶猛沿彭湖公路向湖口县城进攻。七月四日，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一枪不响，弃城而逃，全城留下五六十名老弱病残的百姓，大家都躲入天主堂内游神父处，县城变成一座空城，第二天上午被日兵侵占。

日兵一到三里，首先追击退却的国民党军第一四七师的一支部队。该部先头部队本想经过芝麻塘向文桥方向退却，由于看错了地图，误把白浒塘当作芝麻塘，当进入白浒塘时，一看前有一望无际的鄱阳湖波涛翻滚，白浪冲天，上有敌机盘旋扫射，背后有日兵追击，前进不能，后退无路，孤军无援，顿时死伤遍野。当时只有一个营长带领一个连的兵力，请一位老人带路夜间摸着小路逃到马影桥。其余部队除少数水性好的，搂着木材或乘着临时扎的木排逃走外，多数官兵被日军包围，在炮火中牺牲。

湖口县城沦陷前夕，国民党县政府已迁到流芳附近。后又迁到文桥和武山，最后迁到都昌石婆涧。当时国民党军第一四七师的一个旅退到景湖公路沿线和流芳一带设防，旅部设在殷家山，把马影桥、苏官渡、五眼桥作为第一警戒线，彭泽太平关、湖口张青社、殷山、曹均桥为第二防线，文桥、武山、石婆涧为后方。

二、日寇暴行

日兵侵入湖口的血腥罪行，骇人听闻。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日军约一千人，由彭泽侵入湖口棠山附近，在周玺村四周的山岗上扎营，发现中国人就开枪射击，当天打死了无辜的百姓周兴武、周四姣、李细娥等十余人。

七月二十日清晨，驻扎在周玺村的日兵，突然进行大搜查，把该村团团地包围，岗哨林立，警戒森严，把周元沃夫妇、周世太夫妇等百余人（其中有彭泽县逃难的）全部抓住，除留下十八个壮年农民为日军运送担子外，都押到一栋大房子里，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无辜的百姓顷刻死于日兵的屠刀之下。当天日军还把七十三户民房一烧而光。日兵离开周玺村，前往童家垅驻扎，又用刺刀逼着十八名送担的农民，挖一个大坑，然后在坑边用刺刀捅死十六人，一个一个地踢到大坑里，还要剩下的周遇桂（尚健在）、周遇池（1980年病故）两个农民用锹铲土埋上。约埋了一尺多厚的时候，日兵团回营吃饭，留下两名士兵监视。他俩趁看守的士兵坐下低头打开饭盒吃饭的时机，逃走了，侥幸逃出敌兵的魔掌。

七月二十四日，驻在三里乡的日兵到周家坞村骚扰，抓住农民周文力、周崽子、周麻子、周凤员、周志瑞、周喜龙、周大华、周细华、周火念、周元凤、周火协等七十多人押到门口田里，架起三挺机枪扫射，七十余人惨遭屠杀。敌兵还把周家坞村三十四户房子全部烧光。当时周水龙（现年63岁）躲在村庄背后山上的树林深处，亲眼目睹日兵惨无人道的烧杀，直到晚上才逃到马影。

七月三十一日，驻扎杨家山（今流泗乡）的一批敌兵突然包围棠山村，农民周赐寿、周华年拼命向村外逃跑，当即被日兵开枪击毙。日兵又把躲在村里的周玉盛、周勇轩、聂大毛、周斌寿等九人拖到房外，活活打死。还把周喜情、周道盛及其妻子时氏等五人押到塘边，推入塘内活活淹死。敌兵还把全村二十六户房屋烧毁。

同年八月二日，驻在三里的敌兵闯到孙百仓村，把没有逃走的男女二十九人集中关在一栋大八间堂房内，用机枪一扫而光。惨遭杀害的有孙汝荣、孙庆龙、孙汝义、孙银生、孙道顺等二十八人，只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名菊娥）中弹未死，日兵走后，她苏醒过来，可是身负重伤，欲走不行，她下定决心，一定要爬出去，把日军集体屠杀的暴行告诉村里人，告诉所有的人们。经过一夜慢慢爬行了两公里路，越过了日军的警戒线，终于爬到了马影学堂岭村，找到几位相识的人，把自己和乡亲们的遭遇，告诉了他们。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日军又将鸟林岱村的农民周旺名、周寿灿、周奎苟等五十余人用机枪扫射，同时烧毁民房七十六户。

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给予湖口人民的灾难，令人惨不忍闻。棠山周围原先有六百多户，遭受日军的屠杀、烧毁和洗劫后，仅存五十多户，死于日兵的刀枪之下的有五百多人。扎在县城石钟山的日军宪兵团，更是杀害中国人民，特别是杀戮爱国志士仁人的刽子手。他们把抓到的所谓“中国兵”嫌疑犯杀死，装入麻袋，从石钟山矶头上投入长江。

日军占领湖口一两年之后，虽然“三光”暴行有所收敛，但依然是暗无天日，它们任意烧杀，鱼肉中国人民的罪行时有发生。一九四〇年春的一天，四名日本联络兵，骑着大洋马，行至李家坂旁的大桥时，一马受惊，四马突然飞奔，其中一马失足，连人带马一齐落水。驻在县城的联队长以为是中国兵袭扰，派二辆汽车和几十名日兵，飞奔失事地点进行搜查。驻沈仲村的日兵也旋即派兵搜索，两头夹攻，企图活捉中国兵。当这一百多个敌兵把李家坂村紧紧包围搜查后，不见中国兵的踪影，便抓了一批老百姓，凶三恶四

威吓：“你们交不出中国兵，就统统死啦死啦的。”当时我担任日军翻译，对日军套子中队长说，捞到尸体看看是怎样死的。结果把尸体打捞起来一看，敌兵的头部是在水中乱石上碰伤的，套子中队长这才把老百姓放回去。

一九四二年，我抗日游击队活动频繁，日兵千方百计剿灭抗日游击队。四月间的一天清晨，日军宪兵团经过周密策划，组织一百余人的队伍（包括警察队、警备队），乘坐四辆汽车向屏峰一带大“扫荡”，四辆汽车开到江桥后，日兵下车步行，每辆车只留一名敌兵押回县城。当车子回到王阳明村时，遇到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打响。前面两辆车被击毁，后面两辆见势不妙，掉转车头向横山日军中队部逃窜。游击队活捉了两名敌兵，另两名死在驾驶室。消息传到县城，日军联队即刻派两辆坦克开路，几辆军车跟随赶到现场，包围附近村子彻底搜查，没有搜到游击队的踪迹。

三、傀儡政权

一九三九年春，驻湖口的日军在湖口搜罗一些汉奸组成傀儡政权，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开始称为湖口县自治委员会，汉奸叶耐芳任主任委员。他首先在湖口县城内组成维持会，维持会会长、干事、村长，给居民发“良民证”。当时持有良民证的老百姓，经过日伪军的检查后，才能进城做买卖；如果没有良民证就以中国兵论处，遭到杀害。

一九四〇年间，日伪湖口县自治委员会改为湖口县政府筹备处。叶耐芳担任筹备处长。内设秘书科、交通科、财政科、总务科、庶务室，由安徽省管辖。原自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冀北、高殿吾、陈正初、王梦平、沈传志、杨绍芳、王道平分别担任科长。还组建了以沈美德为队长的日伪警察队和以李淑山为大队长的日伪自卫队，共有三百余人。粮饷由伪政府筹备处供给。伪军的武器是由

日军的宪兵队、警备队搜查来的一些破烂枪枝。一九四一年，日伪湖口县政府筹备处又改为湖口县政府，叶耐芳任县长。同年在县下面设区。三里为第一区公署；张青为第二区公署；江桥为第三区公署。区以下设乡、保、村，原来的维持会改为乡。以上日伪政权机构统治湖口人民长达七年之久。他们狐假虎威，为虎作伥，镇压百姓，搜刮民财，不知干了多少坏事。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在九江成立伪九江专员公署和伪江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这时伪湖口县政府由伪江西九江专员公署管辖。一九四四年日伪湖口县县长叶耐芳被调任日伪九江专署副专员，同时派肖敷祥（泰和县人）接任日伪湖口县县长之职，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

四、经济侵略

湖口县地处三省边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在抗日战争前就盛产淡水鱼、黄豆、棉花、生猪等，商业比较繁荣，城内私人商号、行、店、栈近二百户。日军侵占湖口后至一九三九年春实行经济封锁，商业一坠千丈，市面萧条，经济衰退，全城只有几户南杂店铺。一九四〇年，日军开始在湖口建立垄断性的商业，依靠军事手段，挤压我们的民族工商业，大量剥削搜刮人民的血汗。我记得最早是日商在湖口开办了樱桃食堂、阪神馆、东山慰安所一、二、三食堂、新亚酒楼等服务性行业。没过多久，又由日本私商开办昭和通商、松永洋行、吉田洋行、富士洋行、中岛洋行、大道洋行、山田洋行、德田洋行、颍川洋行等十多家日本洋行，其中六家服务性行业是比较大的。此外还有日本退伍军人在湖口组成的在乡军人会，他们联合起来搞长途贩运。日军在侵占湖口七年中，垄断了湖口县的市场，他们规定中国商人不准运黄豆、棉花、大米出口。没有出口证，日兵就不放行，而日本商人则可以随便运进运出。当时湖口县城的市场，日本商人办的商业占70%左右，中国商人经营的商业只占30%左右。老百姓吃的食盐和糖类也要用鸡蛋从日本人的

物资交换所里排队换到。当时湖口的工业仅有一户简单的修理店，修理自行车、汽灯之类，还有一家做几种糕点饼子的作坊。县城住户照明是煤油灯，农村是点菜油灯。

五、投降之后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一夜之间，日本驻军突然调换，湖口日本宪兵队、海军基地队、联络所和医院的日兵不见了，调换一些从湖南长沙外围遣来的日兵。这支部队是桧部队（桧代表日本大阪市部队）第八十四旅团的一个大队，他们的武器已经交给国民党军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了，只有每十名士兵留下一支自卫步枪和一些有线通迅器材，以及少数的载重汽车。这时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八军驻九江的第一八三师，派来了五四八团副团长李子夔所带一个营到湖口再次搞接收工作。他们把我从九江花园饭店找来做翻译，协助他们接收。当时从长江上游开来一支日军船舶队，“三战区”兵站抢先要挡这批船只；三战区的鄱湖司令部也想买船舶队的自卫枪枝，乘机发财。结果李副团长让这支船舶队往长江下游开走了。在外，日伪县长肖敷祥也将日伪县政府的一部分公物如食盐、粮食等物资交给了国民党湖口县长陈鉴扬。

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日军侵占湖口棠山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在七年多的岁月里，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虏掠、凶恶残暴、无所不为；湖口有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惨遭杀害。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盼来了抗战全面胜利的这一天。

(骆小平整理)
(湖口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日军侵占泰和的暴行

尹 建 华

抗战期间，我省泰和县曾经沦陷过二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元月（即农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元宵）；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即农历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全县人民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极其悲惨的生活。现将我所调查、访问以及亲身经历的一些材料，对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泰和县时期烧、杀、淫、抢等暴行分别记述于下：

（一）

日军流窜我县，虽时间短，但店房、民房烧毁不少。他们的恶意在于：一是进行毁灭性的破坏，使我中华民族遭殃，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二是表示反动信号。他们的先头部队到了宿营地放火，以示后续部队的行径，末尾的部队也放火，使先头部队知道其后续尾部的距离；三是报复性的放火。一九四五年农历六月十六日清晨，日军一进马家洲，就放火烧店。从青石桥烧起，烧至后街、半边街、前街、横街、公路街，一直烧到武丹桥附近。烧毁店房、民房、茅棚将近三百栋。永昌市七十八岁的老人严金沂，当时被日军抓去当过挑夫，他亲眼看到日军开差前，把驻地屋内的桌椅堆在厅堂中，面上放着棉被，底层倒煤油燃烧。同月十八日，日军在永昌市放火，把永昌市从赣江边到现今农机站，除枫书坛自然隔离火线外，所有店房、民房、茅棚二百多栋统统烧光。据七十一岁的邓莲秀诉述：“日军窜犯时，我家损失很大，在永昌市街上被

烧了店铺、布匹货物；在农村的家又被日军杀了牛，损失五万多元。”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有两个“乞丐”在沿溪乡新龙村附近行走，被人发现他们手上戴了金戒子，便抓了一个审讯，原来是日军侦探，村民出于气愤，用菜刀宰了。不料，逃跑的那个串通了日军，第二天就来数十人，烧毁全村十栋三十四间住房。躲藏在山上的全村群众，远看村中火焰冲天，目睹住屋家产，行将殆尽，也不敢回村抢救。

(二)

日军占领泰和后杀了二百多人。一九四五年农历六月中旬初，我县民众听到日军要来窜犯的风声，人心惶惶，弃家逃命。男子挑担，妇女抱婴，少年牵牛，纷纷躲往深山。没有逃跑或跑不及的就被抓、被杀。日军在我县杀人如割草，挑担不起者杀，拒奸者杀，重挑者杀，甚至杀人取乐。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晨，塘洲乡高城村大部分人在家，日军从赣江上岸围村，一次抓走了四十八人。据~~三~~七十八岁的永昌市老人严金沂诉述：他被日军抓去当挑伕，到了吉安水白沙脱逃，沿路上亲眼看见横尸一百多具，都是因挑担走不动，被日军用刺刀捅死的。当时县城东门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陈子鑫被日军抓去，强迫他挑八十多斤，他挑不起，走到城北十多华里，就被日军刺死。县城彭积澍，北大毕业，在家度暑假，也被抓走，一去不返，不知死在何地。

杀人的惨景，真令人寒颤。杀人最多的地区是碧溪乡坽口、大湖，被杀二十一人。沿溪乡龙洲村一口不到三分面积的水塘里就有九具尸体。抗日时期泰和县的龙洲惨案，其原因是前面所述的两个日军化装成乞丐的那件事。日军除大肆烧毁房屋外，还在龙洲抓了当地村民二十五人，关在村前右侧碾米间，日军把被关者逐一拉出，跪在碾米间右侧樟树下，并把衣服剥光，强令招供被抓日兵下落，不供就杀。日军不是用枪击，而是用刺刀乱刺，刺死后丢在一

口小塘里，塘水染成殷红。如果丢在塘里还有挣扎，日军就用门板去压，真是惨不忍睹！冠朝乡凰舞村谢尧澡当时有七十多岁，被日军抓去当挑夫，七十多岁挑七十多斤，没走五华里，日军就把他推下河里淹死。塘洲乡严达泗，父子被抓，挑担走了十多里，其子见父行走艰难，换挑。日军喝令严达泗跪地，随即用大刀朝严肩膀连砍数刀惨死！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早饭时，日军从赣江登岸，去塘洲乡龙口村抢劫，一进村就遇到一个国民党中央军校学生，名叫陈笃汉，日军见他穿黄衣服，举枪就射，陈应声倒地！日兵在马家洲去石滩的渡口边，看到渡船上有两个武溪乡的公丁，举枪即发，一个死亡、一个重伤。碧溪乡大湖村张贞妹，三十多岁，眼瞎，日军来时来不及走，当时，她手上抱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日军要强奸她，她反抗不从，母子二人就被推下河里淹死。塘洲乡严秋菊，年仅十五，被日军抓获，欲奸，严不从。日兵二人将她脚倒提，头浸入水，数起数落，窒息而死。万合乡湖尾康定禄，躲在中埠村，到村口一望，恰遇日军进村，康拔脚就跑，日军即发一枪，毙命。冠朝乡山田村尹在涤的表兄郭东生，被日军杀死在其楼上，还覆盖棉被，尸首臭不可闻，后来尹在涤只得请人埋葬。

(三)

日军铁蹄所至，见妇人就抓，宿营后，就到驻地附近追妇女。无论老年、青年、少年、产妇、病妇。不择室内野外，厅堂和炉灶房，抓获即奸，不从就杀。冠朝乡六十五岁的郭元婆，视力不明，被日军抓住强奸。栖龙乡大岭村有个妇女未跑脱，被日军抓住在其厅堂上奸污。塘洲乡龙口村白润秀，日军强奸后还把她推下塘里淹死。云谷乡伪乡长胡元培，俩夫妻躲在大冈村山上，其妻被日军抓获奸污，还被刺刀劈死。万台乡下塘村一产妇卧病在床，被日军三人轮奸。塘洲乡洲头村罗连秀，年届三十，被日军轮奸，她哀乞停止，日军竟用枪尖乱捣阴处，竟被刺死。碧溪乡大湖有位五十多岁

的妇女尹鳳后，被日军轮奸达九人，最后还被日兵用木棍捅死。

(四)

日军所到村镇，翻箱倒柜，见金银等贵重物品就劫，布匹被帐撕烂，其他家具砸碎，墙壁凿洞，煮饭不用柴薪，专劈新床、桌椅。见猪就杀，见鸡就打，肆意毁坏。当时有位八十一岁的郭希元老人被日军抓去摇船，亲眼看到日兵把村民的时钟、炉坯等乱砸，见新被新帐就撕。每到扎营地他们就一丝不挂，扯民家的新被新帐裹身。冠朝乡山田村，四十二户人家，被日军杀猪七十一头，宰猪不吃，只在后腿割一点精肉，其余挂在房内或丢在床上，有的在猪头上砍一刀，杀死在猪栏里。鸡被打光，不吃就丢在暗房床下，或置入油缸、米缸。由于到处是死猪死鸡，群众回村后臭气熏天，使全村一百六十多人感染病毒，患痢症疟疾。塘洲乡下村刘致恭，日军过后回家，发现房内一床棉被不知盖了什么，旁边一双女鞋，刘致恭以为是杀了一个妇女在内，吓得拔脚就跑，后来家人回来，揭开被子一看，才发现是只死牛。日军历经之地，十室十空，据塘洲乡高城村六十八岁的老人徐文忠提供，当时永昌乡公所进行过一次统计，全乡被抓挑夫五百多人，财产损失值二千多万元。全县十三个乡遭灾，短短四天，损失达四亿多。

日军窜犯我县，罪恶累累，激起民众无比愤怒。当年，大湖村抓住一个掉队日兵，村民用菜刀刈它脖子，最后还用一块大石砸碎他的头。塘洲乡渔民康昭元，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上午，在茅洲上被一日兵逮住，日兵用手枪指康的后脑，不断地嚎叫，意即威胁康跟其快走。康眼疾手快，夺取日兵短枪，旋即拳打脚踢，把他打死。

日军在泰和的血腥暴行，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日本人民是好的，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泰和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供稿)

会战声中上高民众英勇杀敌故事

王道平

我们检讨这次会战的胜利，军事长官的指挥有力，前方将士的勇敢效命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还有民众伟大的力量。在这次会战中，战地民众的确是尽了不少的帮助，担任后方勤务的不待说，就是在阵地上协助我军作战，出生入死，以及自动杀敌，悲壮牺牲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多至不可胜计。笔者此次曾亲身参预战役，就见闻所得，举出几个例子来，一方面是表扬忠烈，一方面也是藉以给全国人民作一个榜样。

× × ×

上高会战，在赣北可谓是最烈最伟大的一役，因此，上高这次遭受敌寇的蹂躏也特别惨重，尤其在锦江北岸一带更为骇目惊心；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动人的民众杀敌故事，以及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也多数在那里扮演。王全昌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王全昌，住在上高第三区墓田乡八保的峨抗村，人一瞧就知道是个淳厚的农民出身，他一向是当甲长的，在这村子平日就很为人信仰。当疯狂的敌寇窜到墓田附近的时候，王全昌在炮火的压制下，已再没有撤退的可能，他只得领导全村的民众，向附近山中暂避，但因为太仓促了，仍陷入敌寇的包围。敌寇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庄，机枪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可是，王全昌亦不害怕，仗着地形和道路的熟悉，终于不顾危险，率领着民众冲了出来，到达了我军阵地。

这时，我军正扼守在××一带，面向着敌军严阵以待。当我们的指挥官听到王全昌的报告，而明了敌寇盲动和整个的情况以后，决

定抽调兵力，迂回包抄，准备给敌寇一个前后夹击！王全昌为复仇的怒火烧着，他自告奋勇充当向导，带领一群兴高采烈的战士，爬山越岭，穿林涉水，偷偷地到了敌寇的背后土地岭。

战斗激烈的开始了，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也没有机关枪，有的只是震天惊地的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惨烈的呼号和金属的撞击；这是出于敌寇意料之外的，他们也许连思索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在刺刀和手榴弹的拼击下，一个大队的人马就全部解决。光荣的战果，使战士们脸上放出胜利的光辉，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王全昌却在我敌酣战时，受伤过重而长眠地下了。

× × ×

继王全昌作同样壮烈牺牲的还有熊先移烈士。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住在墓田乡第十二保的蒲城村。正因为他是知识青年，他不仅爱着自己的故乡，更有对抗战的深刻认识。当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就先把家属疏散到安全的地方，自己为杀敌的热情所驱使，不愿轻易离开，经过驻地我军的允诺，担任义务的情报工作。

蒲城村距泗溪不过十多里，敌寇窜到泗溪的时候，蒲城跟着沦陷了，熊先移也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被捕了。起初，敌寇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迫他充当役役，熊先移并不害怕和反抗，很顺从地忍受着鞭鞑，为敌人扛运粮弹，甚至还比别人努力，这样使敌寇更不疑惑，当作忠实的顺民看待。其实，熊先移烈士决不是凉血动物，也决不甘愿做奴隶的！他所以如此，正是别有用心。

夜晚，敌寇宿营在村里，过度的疲劳，使他们疏于防备，到了午夜，熊先移乘着敌人已经酣睡，悄悄地起来，将军用地图和重要的作战文件检了一大包，偷偷地潜出警戒线，奔向附近的山林藏匿。不久，敌寇发觉被窃，惶恐异常，立即派队追捕，暗夜昏沉，结果毫无所获，当然敌寇并不会罢休的，仍将整个山林包围着，不使有他脱身的机会。

这样一直支持到第二天微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偷渡泗溪河，因为那儿有敌人把守，熊先移烈士这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不慌不忙

地先把文件地图包在一起放入中流，让它漂向对岸，然后自己再纵身入水。可是，不幸得很，敌寇已经望见了，机关枪，掷弹象雨点一样扫射着，只要是血肉的躯体，谁也没有办法抵挡！熊烈士终于壮烈牺牲了，但敌人所化费的代价却也不少。

× × ×

尽忠尽孝，矢志不屈的，罗柏会烈士真可以为我们表率。罗柏会是下陂乡第八保×村人，为人慷慨轩昂，平日除热心地方公益以外，而且常常劝人为国要忠，对亲要孝。这次敌寇窜到下陂桥一带，罗柏会因为有八十多岁的老娘，不能行动，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拼着性命，立定志愿准备与老母同殉难。

当罗柏会和年衰的老母同时被虏时，敌寇曾强迫他做向导，他置之不理，残酷的敌寇便放火焚烧他的房屋，以作威胁和报复的表示。在熊熊的火光中，眼见自己财产房屋将化为乌有，这是何等痛心和愤恨的事！罗柏会也不能忍耐了，不顾一切的去扑灭火焰，一面却抄起扁担向着敌寇挥击。无耻的敌寇，对着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居然大发其武士道的“威风”。在几挺机枪的射击中，罗烈士“打倒日本强盗！”的呼号，仍响彻云霄。

× × ×

奸淫妇女是敌寇惯有的无耻勾当，这次在上高的敌扰区内，被辱的妇女很是不少，而且多数是奸后又被残杀的。但宁死不辱，以全贞节的也很多，龚陈氏可谓是一个代表者。

龚陈氏住在墓田乡第七保的塘下庙村，敌寇由高安西犯时，首先便是这村子遭受到蹂躏，那时龚陈氏还在家里，当然不能幸免。但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女儿，谁又甘愿忍受污辱呢？当横蛮的敌寇正要强行逼奸时，龚陈氏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拾石块投掷，把敌寇打得头破血流。这样一来，敌寇更恼羞成怒，大发兽性，锋利的刺刀戳进了胸膛，龚陈氏随着惨厉的呼声躺在血泊里了。

× × ×

这次会战中，敌寇被我歼灭极众，尤其在退却的时候，民众更

发挥了很大的力量，随时引导及协助我军，跟踪追击，处处予敌以痛创，敌寇狼狈不堪的情形，竟同拿破仑的莫斯科大败一样。

敌军败退经过泗溪附近，我军曾在石上龚家及冷水坑山地拦击，展开空前激烈的歼灭战，杀毙敌人七百余，马百余匹，并夺获大炮两门，军用品极多。这次胜利得力于当地民众刘长庚不少，因为没有他的侦察和向导，是不会恰到时机，予以围歼的。

象这样的担任向导和侦察工作，协助我军围歼残敌事实，是很多的。在章舍水以北，有杜溪村的民众杜早兴，因为引导我军围歼敌人，至玉山附近被击伤。上樟塘的民众冷树立，曾引我××师追击残敌，在墓田以东二里的山地虾蟆岭附近，歼敌一百多，马凡十四。在界埠乡的洲上村，六十多岁的老翁晏自成，深夜带领我××师奇袭堆口，除将敌全部击退外，还俘获敌兵十多名，战马凡十四，弹药无算。还有上高县立中学的学生曾谈文，还只是个十七岁的青年，在敌军攻至锦江南岸的禾埠时，他协助我军侦察敌情，不幸在禾埠附近为敌枪杀而为国牺牲。

从上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只有一个认识，就是“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不可欺”！在这次会战中，烈士们是光荣地牺牲了，可是他们的精神仍活在每个中华民族儿女的心里，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只要不是自甘堕落的汉奸，谁都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为模范的。

同时，在这次会战中，我们更可以相信：这些蕴藏着的民力，只要能够在一个目标下动员起来，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正是指日可待。上高大捷还不过是胜利的开始，我们更应该如何的自励，如何的努力呢？

——选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战地文化》（上高会战大捷专号）
(省民革、上高县政协供稿)

胜利的狂欢

——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宁都狂欢之夜

周效之

抗日战争初期，江西省会由南昌迁至泰和。一九四四年日寇在太平洋地区节节败退，企图固守中国战场。为东南亚日军准备退路。这年冬天，日寇由广东南雄窜入江西赣州，打算沿赣江而下，与南昌日军连接起来。由于泰和在江西中部，位于赣江之滨，首当其冲，受其威胁，一九四五年二月间，江西临时省会又由泰和迁到宁都的青塘。那时我在建设厅工作，也随单位转移到宁都。

青塘距宁都约二十华里，处于四面环山之中，只有一条临时公路可达。由于交通不便，江西省政府在这里只设有秘书处，其他厅处都分散在宁都、兴国、永丰、于都等地。仅旧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秘书长胡家凤坐镇青塘。但每个厅局长的私人公馆却多设在宁都。

从一九四五年一至九月，这段时间里，所有在泰和、吉安、赣州等地的机关、银行、商店、报社（民国日报、力行日报）、剧院、以及三青团等单位，大都受战局影响先后转移到宁都。连江西唯一的“中正”大学，也由泰和的杏岭迁到宁都的长胜。

宁都地处江西东南，从当时地理位置来看，东连上饶，南通福建长汀，北毗兴国，西接赣州，是连接浙、闽、湘、粤的交通枢纽，是三、九战区的连接中心，是东南前线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江西政治、军事、交通、商业的临时中心。一个冷落、偏僻的宁都，一时变成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热闹城镇。

那时宁都，虽是江西第八行政专署的所在地，整个县城却只有

一条东西相连的大街，另外还有一条横街和一条靠北面的环城马路。由于城区范围小，人口多，每当傍晚时分，街头上便出现了拥挤的人流，公务人员、学生、军人、工人、商人、司机、难民等，都走上街头，熙熙攘攘接踵而来，磨肩而过。在总长不到两华里的大街上，一个小时内，可以和朋友们碰上几次面。转移到这里的人，大都在战乱中度过了八年的流离生活，心情是非常沉重的，都盼望着早日传来胜利的消息，恢复和平，结束战争。正如一匹从战场中逃出的战马，“哀鸣思战斗，回立白苍苍。”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在闷热的天空里，传来了一个兴奋的消息，盟军美机在八月六日凌晨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在长崎又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使广岛、长崎变成一片焦土。

八月九日又传来第二个兴奋的消息，苏联八月八日向日本宣战。

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十日下午八时二十五分，在宁都收到重庆传来的最好消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啊，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了！消息传来，人们欢喜若狂，大街小巷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狂欢群众，职员、军人、工人、学生、商人都自发地组合起来，涌上街头，形成一队队的游行队伍，由东到西，再由西到东，在街头上欢呼、狂喊、握手、拥抱，所有商店都自动燃放鞭炮，庆祝胜利。一时欢呼声、歌唱声、鞭炮声，交汇在一起，此起彼落，互相回响，好像一支巨型乐队，在演奏一只动人的狂欢曲，响彻空际，震撼全城，整个宁都城里浸沉在狂欢之中。当时在宁都出版的《民国日报》，在八月十一日头版刊登《伟大的日子》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特写：

“消息传来，霎时，全城轰动，成千累万的人群像疯狂的在街头上狂笑欢呼。朋友见面，紧握双手，欢笑到说不出话来，甚至热烈的拥抱，甚至遇见陌生的路人，亦不禁握手拥抱起来，人与人之间，都显得格外的亲密，无法压抑的感情，都从每人心灵中流露出来，不论操何职业的人，都一同舞蹈、欢呼，宁都，这赣省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自昨晚八时二十五分起，开始发狂了。”当时我和几位新闻记者也参加了游行行列，只顾在人群中一个劲的欢呼，一串爆竹向我飞来，竟烧破了我的衣衫。事后一位同事劝我将这件衣衫好好保存，留作胜利纪念。事经四十年，衣衫早已遗失了。这种自发的狂欢，是八年来从未有过的激动场面。这也难怪，八年的战乱生活，已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苦难的人民是多么盼望着胜利，现在胜利终于来了，人们焉有不从内心发出喜悦的激情？！

是晚我特地走访了一位逃到宁都的诗人陈隆恪先生（陈散原老人的次子，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胞兄），请问他对胜利有何感受！他欣然命笔在白纸扇上题写杜诗一首：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杜甫名诗，虽是描绘唐代安史乱后人们对胜利的喜悦，但对经历八年抗战的人们来说，也有同样的感受。人们对胜利的喜悦是古今相同的。

狂欢高潮过去了，夜深人静，人们在睡榻上作着不同的美梦。流离他乡的人们，开始考虑归计，将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抗日战士，考虑复员，作着解甲归田的计划。政府人员，考虑迁回南昌，接收南昌，将如何重建南昌。美梦虽然各异，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和平，从此过着和平的日子。

1985年8月10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供稿)

△————△

·宁都狂欢，一说八月十四日。——编者

江西抗战大事记

田 和 勇

一九三七年

七 月

七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八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力援助抗日自卫战争，组织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进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会见外交部长王宠惠，商谈卢沟桥事变处理事宜。

十三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江西各界民众向卢沟桥抗日将士发出慰问电，并成立“江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

十六日：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谈话会，讨论应付抗战问题，出席谈话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一百五十八人。

十七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再次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人在庐山会谈，讨论有关红军改编、共产党的地位、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及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谈话，指出：中国已到“最后关头”，“我们不能不应战”。

十八日：蒋介石主持庐山暑期训练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

八 月

二日：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讲话，称“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绝无与敌谈和余地”。

△南昌市政府成立。

八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宣言，要求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一致抗日。

十四日：日机十二架首次空袭南昌。

九 月

十一日：陈毅在大余县长彭育英陪同下，到达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本月底：项英到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达成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十 月

二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分散在湘、赣、浙等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二十一日：救国公债募捐委员会公布：江西省八十三县认捐数目已达五百余万元，其中丰城、吉安、上饶等县市各达十五万余元。

本月：蒋介石派戴笠押解杨虎城将军到达南昌，监禁在二纬路一号。

十 一 月

五日：江西抗战宣传周开始，本日公布抗战标语四十四条。

二十七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由南京返赣，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代省主席职随之解除。

十二月

九日：中国空军在南昌上空击落一架日本飞机，送往市湖滨公园展览，民众欢呼，观者如堵。

十三日：日军侵占南京，对南京民众进行大屠杀。

十六日：中国军事当局在九江附近江面布置新封锁线，阻止日本海军西犯。

二十日：中国军事机关征集轮船十八艘及大批帆船沉塞马当江面，成为长江第二道封锁线。长江下行轮船止于九江。

二十五日：江西省妇女战时服务团在南昌成立。

一九三八年

一月

一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二千万元，年息六厘，以钨砂作担保。

二日：日机今午袭南昌，我空军在鄱阳湖迎击，击毁日机一架。

三日：蒋介石核定“统一兵员征募及补充方案”，并令豫、皖、赣、闽、粤、湘、鄂、川、陕九省，先设立军管区司令部。

五日：新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今日到职视事。

六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委兼副军长。随即在南昌、武汉设立办事处，南昌办事处由曾山、黄道负责；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负责。

十日：江西省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熊式辉兼任团长，服务团随即分十个大队在全省各地展开抗日活动。

十九日：参加淞沪抗战的陆军九十八师负伤官兵千余人，在南昌养伤痊愈后，由旅长方靖率领重上前线，南昌民众前往车站热烈欢送。

二十三日：“江西省救济难民互助会”成立，该会确定将难民分批遣送泰和等地垦荒。

二月

五日：熊式辉就任江西省军管区司令。

九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发命令，要各县抗敌后援会组织的自卫队立即撤销。

十二日：江西省政府令民众所藏枪枝一律交县政府统一注册烙印。

十六日：女汉奸吴玉梅在江西省体育场被枪决。

十九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南昌成立，由朱克靖任团长。

二十日：新四军军部令江西各支游击队向皖南岩寺集中。

本月：中共南昌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曾山任书记。

同月：爱国将领张学良被蒋介石押送至萍乡软禁。

三月

十七日：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在南昌湖滨公园举行盛大歌咏会，会后两万余人参加了游行。

二十日：南昌文化界抗敌会成立，王造时、罗隆基、许德珩等出席会议。

本月：在南昌成立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协同第三、第五战区作战。

四月

四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迁往皖南岩寺。

五月

本月：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由陈丕显任总队长。

二十八日：世界学联代表团由武汉抵南昌，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六 月

十七日：南浔铁路开始拆轨。

二十三日：日军使用毒气进攻马当要塞。

二十六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要塞。

二十九日：彭泽县失守。

七 月

四日：湖口县失守。

七日：南昌各界举行抗战建国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组织群众游行，受到国民党特务冲击，被捕多人。

十一日：熊式辉提出让日军在江西“三不自在”、“四不准”，即走、吃、睡不自在；不准敌人住江西屋、吃江西米、喝江西水、走江西路。

十八日：日机二十七架空袭南昌，被我空军击落四架，号称“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大尉亦被击毙。

十九日：我空军在湖口炸敌舰，命中三艘。

二十一日：我军在彭泽西南太平关获胜，缴战车二十余辆。

二十四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在九江殷家庄一带登陆，李汉魂所部第六十四军与之激战。

二十六日：赣北重镇九江失陷，中国军队后撤至南浔铁路一线布防。

二十九日：我军反攻湖口、彭泽，中国空军在湖口及鞋山炸沉日舰四艘。

八 月

一日：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接替张发奎全面指挥南浔线

军事。薛岳将所部八个军置于德安、星子一带阻敌南下，并牵制日军主力进攻武汉的行动。

三日：日军一〇六师团沿南浔铁路向金官桥进攻，企图攻占德安、南昌，然后迂回长沙，包围武汉。薛岳所部七十军、八军、四军与敌激战，赣北德安之战开始。

六日：李觉第七十军在金官桥地区歼敌田中联队长以下千余人。

△国民党中央改组江西省党部，由熊式辉兼任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十九日：日军一〇一师团在星子强行登陆，随即占领星子县城，中国军队退至东西孤岭一带构筑工事，阻敌前进。

△江西省各界民众通电声援被围困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八百壮士，”并发起万人签名活动。

二十四日：日军波田支队、丸山支队攻陷瑞昌，张发奎第二兵团司令部退守瑞昌西北。

二十六日：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在瑞昌大尖山地区反击日军，血战竟日，毙敌千余。

本月：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由曾山任书记。

九月

一日：到今日止，瑞昌我军歼灭日军四千余人。

二日：日军一〇一师团之一〇一联队在东孤岭遭受中国军队重大打击，联队长饭塚被打死。

三日：日军一〇六师团攻陷马回岭，俞济时第七十四军退守德安以北山地，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军。

十一日：江西省第五区专署召集已陷之湖口、星子、瑞昌、彭泽等县县长到景德镇开会，讨论协助军队组织游击队等问题。

十六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沿瑞昌——武宁公路推进，企图迂回德安左翼，推动战局发展，遭黄维第十八军顽强阻击。

十七日：郭沫若等一行到达武宁慰劳抗日将士。

二十一日：知名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来赣慰劳抗日军民。

二十四日：日军二十七师团进至德安白水街一带，薛岳抽调六个师兵力归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指挥，连夜将该敌包围。

△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成立新兵督练处，任命蒋经国为处长。

二十五日：日军二十七师团铃木联队在德安白水街附近之麒麟峰被中国军队打败，伤亡惨重。

二十六日：日军一〇六师团乘隙转进德安以西万家岭地区，企图冲破我防线，侧击德安，与欧震第四军展开激战。

二十八日：日军一〇一师团向隘口街猛攻，陈安宝第七十九师顽强作战，重伤敌伊东师团长。至此日军在南浔线先后投入的三个师团均遭重大打击。

△赣北共产党工委将“赣北游击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队”，以陈立顺任大队长，李顺希为政委，并和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

十 月

一日：瑞昌、武宁间我傅立平师克复麒麟峰。

二日：薛岳调动十五个师的兵力，将孤军深入之敌一〇六师团包围于万家岭一带，随后发起总攻。

八日：救援军到达甘木关一带，企图解救一〇六师团，被中国军队截住，不得前进。

△江西省抗敌后援会主任许德珩由南昌赴赣北前线视察。

九日：薛岳令敢死队与敌激战通宵，至翌日晨，将日军一〇六师团完全打垮，歼敌万余人，取得了江西抗战中第一次大捷。

十日：南昌各界民众隆重集会，欢庆万家岭大捷，大会收到全国各地贺电五十五份，会后举行了盛大火炬游行。

十四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颁发“抗日救亡团体总登记办

法”，对抗日救亡团体进行限制。

二十八日：日军在万家岭失败后，调整部署，于本日占领德安县城，中国军队向南撤退。

三十日：蒋介石抵南昌，批准薛岳兵团退到修河南岸，与日军隔江对峙。

十一月

十三日：本日为南昌市国民党员重新报到登记截止日，全市只有五百余人重新登记，其余以自动放弃党籍论。

本月：部分青年服务团成员陆续由中共派往新四军及延安等地。

十二月

五日：熊式辉宣布撤销江西省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

二十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划九江、星子、瑞昌、德安、永修五县为浔阳游击行政区，以庐山游击司令杨遇春为专员。

一九三九年

一月

一日：赣北我军向修河北岸之永修、德安出击，克据点多处。

五日：江西省各界民众纷纷电请中央政府，要求严惩头号汉奸汪精卫。

十一日：日机袭南昌、吉安。

十五日：抗日游击队在德安抓获伪县维持会长丁录明、戴仲民等汉奸多人。

二月

十日：日机一架在东乡上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逃跑，被当地

自卫团击毙。

三月

十七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组织各市县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南昌市民数万人参加了宣誓大会。

△日进攻吴城镇，谋渡修河犯，激战于观音阁。

二十日：日军三个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起进攻南昌的战役，敌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在涂家埠至虬津地段滥施毒气，强渡修河，图谋从安义、奉新、高安迂回南昌西南面，实施攻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织八个军迎战日军。

二十二日：日军突破修河纵深防线，攻陷安义，次日陷奉新。

二十三日：熊式辉匆忙由重庆赶回南昌，下令全市总撤退，省政府撤往吉安（后又迁往泰和、宁都，至四五年九月迁回南昌）。

二十四日：日军石井坦克团进抵西山、万寿宫一带。

二十六日：日军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分别由雷家、生米街渡过赣江，国民党守军急忙炸毁中正大桥，弃守南昌。

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南昌。

二十九日：日军第六师团突破中国军队四个军的阻击，攻陷武宁。

四月

一日：敌陷祥符观。

二日：日军向高安偷袭时七十四军猛攻，部队被迫后撤，高安陷落。

九日：我大举反攻南昌。

十八日：敌军独立第十四旅团对庐山加紧攻击，庐山游击队被迫撤退下山。

二十一日：第三、第九战区以十余师兵力，分三路反攻南昌，当日俞济时七十四军由高邮渡锦江进攻高安、大城。

二十三日：七十四军收复高安，第三战区四个师强渡抚河，向南昌东面发动攻击。

二十六日：预备第五师一部打进南昌新飞机场，旋因后援不继，被迫撤出。

△南昌县河埠周家民众设伏击毙敌兵十八名；次日，敌军实行野蛮报复，屠杀当地民众千余人。

二十九日：我军围攻南昌，战况剧烈，南昌大火。

五 月

一日：蒋介石限令五日内攻占南昌，并将畏缩不前的第七十四师师长段朗如军前正法。

五日：中国军队一部再次攻入南昌新飞机场、汽车总站及金盘路一带。

六日：日军向莲塘猖狂反扑，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阵亡，师长刘雨卿负重伤，部队被迫后撤。

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反攻南昌。

二十三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黄道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于河口镇，时年三十九岁。

六 月

二十六日：江西县政府计划委员会成立，准备推行新县制。

七 月

四日：吉安成立疏散管理处，组织人口疏散。

八 月

本月：江西省政府决定更换宜春、乐安等七县县长。

九月

十四日：日军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由奉新、靖安向修水、铜鼓进攻，企图配合第一次进攻长沙之战，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本日在会埠一带与敌接战。

十八日：敌佐枝支队再次攻陷高安，不久又被我收复。

二十三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在上富镇分兵两路攻向甘坊、九仙，进至九岭山脉崇山之中。

十月

七日：中国军队在甘坊、九仙一带打击日军，歼敌千余名；敌一〇六师团回窜奉新，中国军队跟踪追击，连克罗坊、治城。

九日：中国军队进抵奉新城垣，至此完全粉碎了日军攻势。

三十一日：中正大学在泰和成立，首任校长胡先骕。

十一月

本月：中共江西省委在上饶开会，宣布南方局决议，改组中共江西省委，以郭潜为省委书记。

十二月

十二日：第九战区发起冬季攻势，罗卓英十九集团军分别向奉新、高安、武宁发起攻击。

三十一日：李天霞五十一师打进奉新城西北门，尽焚敌仓库，旋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出。

一九四〇年

一月

三日：抗日游击队潜入南昌市，焚烧敌仓库三处。

九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限令一周内，将各县战训总队改为国民兵团，由县长兼任团长。

二十七日：据守九江的伪保安一大队士兵反正，遭日军镇压。

二月

十四日：吉安成立江西伤兵之友社。

十六日：中国军队一部向奉新以西之面岭日军出击，当日攻克面岭，歼敌甚众。

三月

本月：中共江西省委迁至赣州。

四月

九日：我军攻克奉新、靖安。

二十一日：中国军队收复安义。

二十三日：孙定超师政治见习员张尚兴在进攻安义战斗中不幸为敌抓获，誓不降敌，被割耳、挖目，从容就义。

二十七日：永修伪维持会长蔡蒂卿被游击队击毙。

五月

三日：罗卓英部、王陵基部共八个师分别向南昌、武宁之日军发起夏季攻势。

六月

二十一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对向塘发动攻击。

二十五日：中国军队一部攻至南昌新飞机场。

三十一日：敌武宁毒气仓库被游击队焚烧，日军三百余人中毒。

七 月

九日：南侨慰劳团长陈嘉庚先生抵达泰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设宴招待。

八 月

二日：中国军队在宋埠东南之青坂冈设伏，歼敌百余。

九 月

二十四日：九江妙智铺乡绅鞠远枝先生参加游击队，为敌人所捕，在解送庐山宪兵营途经小天池时，勇跳深崖，壮烈牺牲。

十 月

一日：日军一股进犯岷山游击队驻地时，遭痛击，狼狈溃退。

十二日：中国军队攻入马当要塞，一度切断了长江交通。

十一 月

一日：我某部进击涂家埠车站，歼敌百余，切断了南浔线交通。

十二 月

十三日：莲塘日军征集民船八百余只，企图进犯锦江南岸，第十九集团军四个师严加戒备，敌未敢妄动。

一九四一年

一 月

二十五日：中国军队一部攻入星子县城与敌巷战，歼敌甚多，

而后主动退出城外。

二月

二十五日：江西省政府令各县成立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

三月

十五日：北路日军三十三师团从干洲向奉新进犯，南路日军池田旅团向锦江南岸曲江镇进犯，中路日军三十四师团，由西山向高安进犯，企图三路并进，占领上高县城，消灭罗卓英十九集团军主力，“上高会战”开始。当日各路敌军均遭中国军队阻击。

十八日：中路日军三十四师团占领高安后，继续向上高推进，王耀武七十四军主动后撤，以便诱敌深入。

十九日：北路日军三十三师团遭到打击，力量不支，从奉新向北回窜，阻击该敌之李觉七十军得以调兵南下。

△南路敌军池田旅团在兰家桥企图强渡赣江，进犯樟树镇，王克俊二十六师猛击半渡之敌，重创池田旅团，该敌不得不北渡锦江与三十四师团会合。

二十二日：日军三十四师团已推进到上高东北白茅山一带，罗卓英令王耀武七十四军坚守正面；令七十军、七十二军、四十九军从南北方向夹击该敌，双方展开激战。

二十四日：日军三十四师团被包围在以毕家为中心，南北十里，东西三十里的地方，情状危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部急调三十三师团二个联队南下增援。

二十五日：日军三十四师团与援军内外夹攻张言传预备第九师和唐伯寅第十九师，该两师伤亡重大，向北撤退，敌军得以在官桥会合。

二十六日：罗卓英调八个师的兵力再次将敌三十四师团包围在官桥地区，并发起凌厉攻势。

二十七日：日军三十四师团在三十余架飞机掩护下，用毒气开

路，向傅翼新编十五师猛扑，傅师稍稍后退，但其它部队加强攻势，一举攻下敌三十四师团指挥部所在地毕家。

二十八日：敌三十四师团残部三千余人向东逃窜，沿途多次遭到打击，敌酋岩永少将身负重伤，后卫六百余人亦被我全歼。

△吉安召开上高会战祝捷大会。

本月：九江码头三千工人，面对日军机枪威胁，坚持罢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迫使日本侵略者答应了工人条件。

四 月

一日：中国军队相继收复高安、奉新、西山，逼近南昌，上高会战以歼敌万余人的战果而胜利结束。

五 月

三日：中国军队一部攻占武溪市，歼敌百余。

六 月

二日：吉安举行上高会战战利品展览，盛况空前。

七 月

四日：中国军队以一部袭击湖口小洪山之敌，另一部设伏，痛击大洪山援敌，歼敌甚众。

本月：汪精卫外甥陈世英不事汪伪政权，保持民族正气，被任命为江西省宣传委员会委员。

八 月

六日：我炮兵轰击永修城内日军，敌兵营、仓库一片大火，损失惨重。

十二日：江西省政府通令各县筹修县志。

九 月

三日：安义敌三千余众进犯宋埠一线中国军队，被守军击退。

十 月

十日：蒋经国在赣州举行五万人双十节大检阅。

十一 月

十二日：中国军队击溃南昌东北沈口之敌，切断了公路交通。

十二 月

本日：即将上任的伪江西省省长、大汉奸肖淑宇在吉安被秘密处死，财产被拍卖。

一九四二年

一 月

三日：经连日激战，中国军队收复武宁县城，歼敌数百。

二 月

二十四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由曹浩森接替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梁栋继熊式辉任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二十七日：江西省政府决定本月底将各县国民兵团一律裁撤，原国民兵团任务由各县军事科接办。

三 月

十六日：曹浩森宣誓就江西省政府主席职。

四月

九日：中国军队一部攻击彭泽东南西边山日军据点，敌仓皇后撤。

五月

十二日：日军调集六个师团、四个旅团十万余人，发动了浙赣战役。

二十七日：日军侵占抚州。

三十一日：日军三十四师团、三师团参加打通浙赣线作战，从南昌向进贤方向推进。

六月

二日：日军三十四师团侵占进贤，第三师团进占三江口，随即向临川、东乡推进，中国军队五十八军、四军、七十九军节节抵抗。

三日：日军攻占临川，守备司令姜宝德，壮烈殉国。

十二日：日军占领南城，赣东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十五日：浙江西进之敌占领上饶、广丰。

△浙赣线八千余铁路工人展开毁路斗争，将沿线所有桥梁、涵洞两百多处，全部破坏。

二十九日：江西东进之敌相继占领弋阳、东乡、余江、余干、都昌、鹰潭、贵溪、横峰等地，随后与西进之敌在横峰会师，从而打通了浙赣线。

七月

五日：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团长姚名达教授在新干石口村火线遇敌，壮烈牺牲。

六日：日军攻陷樟树镇。

九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浙赣之敌，两日间收复崇仁、南城两县。

十八日：中国军队收复弋阳。

△日军在南昌塘南地区屠杀当地民众近千人。

八 月

三十一日：江西省政府将江西十一个行政区划改为九个行政区划。

本月：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贵溪、上饶、广丰、玉山、金溪、余江、余干、东乡、都昌、进贤、三江口等地，前锋抵达莲塘，逼近南昌，浙赣线恢复原状。

九 月

二日：盟军飞机炸中南昌日军司令部及一大仓库，全城一片大火。

十 月

九日：日军一步兵联队乘火车去九江，在山下渡被炸，伤亡数百人。

十一月

二日：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在总理扩大纪念周大会上提出进行良心总动员。

十二月

十日：星子敌警备队向我军某部进犯，被击退，队长山下茂被打死。

一九四三年

一月

十五日：省政府即日在吉安、泰和、宁都等二十县实行重要日用物资限价。

二月

二十一日：高安日军二千余众向村前街进犯，敌我双方展开白刃格斗，激战竟日，日军被迫撤退。

二十五日：收复奉新我某部，继续追歼日军。

三月

十一日：在泰和召开“江西省妇女会”成立大会。

四月

五日：湘粤桂赣区办事处主任林虎在省党部会议上大声疾呼，要求“制裁奸商”。

五月

本月大量广东难民进入江西，省政府发起救济活动。

六月

一日：上海“四行孤军”上尉连长邓俊一行三人到达泰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七月

一日：江西省物价管制委员会决定限制酒、食消费。

九日：四区专员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五年计划”，向各方“征集”意见。

十四日：“江西省动员委员会”限令各县在六个月内，捐献飞机一架。

八 月

二十三日：泰和民众集会欢迎投诚伪军队长张青山一行十人。

九 月

二十八日：中国军队攻克抚河东岸幽兰市，歼敌数百。

十 月

三十一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正式成立。

十一月

十八日：我某部经激战收复石岗。

十二月

二十五日：“江西省工业协会”正式成立。

一九四四年

一 月

十日：中国空军轰炸南昌，敌方遭受重大损失。

二 月

五日：省政府举行农民节庆祝大会。

三 月

三日：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抵达泰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四 月

十九日：江西省政府决定撤销各县军事科，再次恢复国民兵团。

五 月

一日：江西省政府令各县月底前一律成立国民参议会。

六 月

二十三日：日军分两路攻陷萍乡，大肆烧杀抢掠，残害萍乡民众数万人。

二十八日：鲁道源五十八军收复萍乡。

七 月

二十七日：萍乡再次陷于敌手，中国军队向芦溪撤退。

八 月

四日：中国军队九十九师、一六二师再克萍乡，日军二十七师团退至醴陵。

△日军三十四师团攻陷莲花。

十三日：中国军队夺回莲花县城。

十七日：美国飞行员七人跳伞落在德安黄老门地区，被当地游击队营救脱险，战斗中游击队牺牲七十余人。

九 月

十日：新任省党部书记长胡钝俞抵达泰和。

十 月

十七日：游击队潜入永修县城，烧毁日本“三星洋行”。

本月：陈肇英就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十一月

一日：中正大学袁昂等三教授联名响应从军。

十二月

二日：南昌二中两百多学生报名参加青年军。

一九四五年

一 月

十九日：日军二十七师团参加打通粤汉线战役，进占莲花县城，鲁道源五十八军稍作抵抗，即行后撤。

二十二日：日军二十七师团侵占永新，杀害当地民众三千余人。

二十九日：日军二十七师团突破中国守军六个师的阻击，侵占遂川机场及遂川县城。

本月下旬：蒋经国离开赣州，飞往重庆。

二 月

七日：日军二十七师团占领赣州。在此之前，粤北之敌沿粤赣公路攻占大余、新城、南康等地。

二十三日：中国军队收复莲花县城。

三 月

十一日：鲁道源五十八军收复遂川，歼敌中队长以下二百余

人。

十七日：八路军南下支队在王震领导下到达江西修水全丰。

二十六日：省临时参议会由泰和迁往宁都。

四 月

二日：盟军飞机轰炸赣州，赣州外围不断发生战斗。

五 月

二十日：江西新闻界组成“战地访问团”。

六 月

十一日：信丰守敌向赣州撤退，我军收复信丰。

十九日：定南光复。

七 月

七日：日军二十七师团、四十师团在赣州集中后，沿赣江向南昌逃窜，中国军队跟进追击，本日收复大余。

十日：中国军队收复南康。

十七日：赣州光复，处决赣州汉奸“复兴会”主任林吉堂等三人。

二十三日：北撤日军攻陷泰和。

二十七日：中国军队收复泰和。

二十八日：锦江沿岸敌军向南昌集中，我军收复万载。

二十九日：日军三百余众突入吉安城，萧本元新编第十师与敌巷战，将敌军驱出。

三十一日：宜丰光复。

八 月

二日：我军收复上高。

十日：中国军队进占丰城，日军逃进南昌。

十四日：日本投降消息传到临时省会宁都，万众欢腾，纷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十八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接受团进入南昌，以艾怀瑜为市长，接管了敌伪政权。

二十三日：八路军南下支队一部到达崇义县文英圩，遭到国民党九十师、一〇二师袭击。

三十一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奉令向日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发出第一号备忘录，限令在南昌、九江地区所有日军停止一切抵抗，交出武器，办理投降事宜。并指定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为南昌受降官；新三军军长杨宏光为九江地区受降官。

九 月

三日：本日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南昌市民大庆三天。三日上午七点，全市所有汽笛长鸣十分钟，中午十二点，鸣放胜利礼炮一〇一响。

十四日：在第九战区南昌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仪式，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代表薛岳）和笠原幸雄分别代表中方和日方在降书上签字盖章，确定南昌、九江间全部日军共七万人向薛岳部缴械投降。江西八年抗战至此胜利结束。

（上接第165页）

“为民请命”，申述地方疾苦，请求减免或暂缓征兵时，蒋经国又一反过去主张。他又以民之“父母”的姿态，高谈什么“战乱相寻，民力尽矣！”使当时赣南各县区乡保甲人员不明其真正意图。就连当时指挥他的省政府军管区和师管区也感到他莫测高深。明知其前言后语有矛盾，大家也明哲保身，谁也不去问他的究竟。

1984年11月24日

回忆与蒋经国在赣南相处二三事

方 瞰

四十年代初期，我任原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副军长兼江西省吉泰师管区司令。当时每个师管区下辖三至四个团管区。团管区司令有的是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有的则是专任。即使不兼团管区司令的专员，在兵役行政方面仍受师管区司令指挥。

赣南地区在兵役行政方面属吉泰师管区指挥。适逢蒋经国任赣南专员，又由于他知道我是黄埔军校三期出身。他口口声声称我为“老大哥”，表面表现得还谦逊。当时名为“征兵”实则抓丁；贿买顶替已成普遍而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壮丁遭受捆绑；区乡保甲人员敲诈勒索，人民无不视征兵为畏途。我在吉泰师管区司令任内，收到连篇累牍的对征兵弊端的控诉，当即大部份转交赣南专署查办。记得当时有一份诉状中引用杜甫《石壕吏》一诗中的名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状子上写道：“当年石壕吏捉人，尚获老妇。而今赣南虽老妇亦戛戛乎其难矣。”蒋经国目睹这份诉状，曾对我侃侃而谈。他表示兵役稗政，严重扰民，非常愤慨。并对我谈他的决心。他说：“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颇想行一番改革似的。可是我交下去有关兵役的诉状，从未见到有经过查办的复文给吉泰师管区司令部。

特别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鉴于抗战期中部队严重缺员，故对各地征兵的配赋额都很高。当我们开征兵配赋会议时，蒋经国以专员身份，表示所谓“抗战建国，首重兵役”，各县区乡保甲要“漏夜赶征，勿得贻误戎机。”可是当赣南各县绅士们到赣州

（下转第164页）

王升其人

方庆延

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界中，属于蒋经国在大陆撤退前亲手培养的著名人物，有王升、李焕、楚崧秋、关中等人。其中王升（号仁行）权力最大、影响最深，只是近年来才失欢于蒋经国，受到贬削。我和王升都是“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毕业，是蒋经国的学生，谊属同窗，因而比较接近。一九四七年，王升从青年军的一个团政治督导员调到南京“中央青年部”担任副处长，那时我正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双方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一九四八年三月，蒋经国在南京成立秘密核心组织部“中正学社”，我们俩都是“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在一起就格外密切了。现将记忆所及有关王升的情况写出，以供史家参考。

直步青云

王升的直步青云是一九四七年秋，由青年军团政治督导员调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附设嘉兴青年中学”起步的。以后又步步高升，犹如“麦过春分昼夜长”了。他官运亨通，权倾人主，直到不久前失欢贬削，煊赫了三十多年。

蒋经国从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变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中将局长后，处理第一批十万青年军退伍的办法是“一升二教三转”，即升大学、办中学（包括职校）、转入各行业。其中光办中学就设有十多个大型的，一校三五千人，学生享受全公费，有吃有穿有住有零用，其待遇可谓厚矣！但是，这些人走南闯北当了几年大兵后，

性情就漂浮起来，加上年纪已大，头脑僵化，感到读书是门苦差事，渐渐不安于在校。于是有人在校外白看（戏）白吃，闹起事来。维持治安的军警宪不敢得罪他们的后台老板（蒋经国），只是敷衍了事。因此弄得民怨沸腾，称之为“三害之一”（三害是国大代〔表〕、军官总〔队〕、青年从〔军〕）。后来，胡闹发展到校内，甚至上课也有一半人不在教室了。各地的青年中学都是如此，而嘉兴青年中学尤甚。原任校长是蒋经国在赣南的老部下，人老手软，实在制服不了这些“老转”了。蒋经国十分气恼，决定调王升去收拾残局。

王升是以上校训导主任的资格来到嘉兴青年中学的。他先出了个“整顿校风通告”，说明此次来校，系奉蒋经国命令，进行整顿，明晨全体在操场集合训话，如有不到者，立即开除。

第二天清晨，各队队长身挎手枪，操场四角安放机枪，紧急集合号声和各队长的哨声交织，形成一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王升站在指挥台上，表情严峻，台下各队长检查人数，向他报告缺席学生，总计有十余人。王升开始了简短的“训话”，接着宣布了缺席学生名单和全数开除押送回乡的决定。

人总是避祸就福，加上王升是蒋经国的学生，而青年军学生中很多人对蒋又抱有幻想，谁愿意再冒危险进行对抗呢？就这样，残局收拾了。从此，王升在蒋经国的干部天平上加重起来了。不久，他就调南京中央青年部任副处长，和蒋经国近在咫尺了。

上 海 “打 虎”

一九四八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形势发生了于己不利的急剧变化。于是，“勘乱”建国总队应运而生。蒋经国推荐王升担任“勘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少将大队长。王升从此两翅生羽，待机高飞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行政院决定发行金元券，代替形同废

纸的法币，同时限定物价以八月十九日为标准，不准上涨。企图以此挽救财政崩溃，稳定人心，支撑战局。这就是所谓的“八·一九限价”。

蒋经国以“行政院金融检查京沪区副督导员”的身份，持节掌握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正督导员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他识破老蒋让儿子露一手的意图，就甘愿俯首听命于小蒋。这样，蒋经国就大大施展了身手，打起“老虎”来。

蒋经国深知上海商人的狡黠，于是决定外善内狠，先礼后兵，以实力为后盾，因为空言仁义是限不成价的。他以王升的第六“勘建”大队为基本队伍，再从青岛等市调集第三、四、五“勘建”大队的一部来上海助战，全部共约一千二百人，由王升统一指挥领导。又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由王升任总队长，另外收罗了一万三千余人做队员，以“勘建”队员担任大中分队长。这些人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呼喊限价、打倒奸商的口号，并且按店检查登记货物，有时深夜拦车检查行人，又上门强迫居民拿出黄金白银去银行兑换金元券。一时声势很大，仿佛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全部责任和罪恶都是那几个商人作的怪。结果弄得中小商店大批关门，市民买不到东西，人心惶惶，上海成为“死市”。

蒋经国又在江湾体育场开设“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训练班”，以自己为名誉主任，王升为班主任，江国栋为组织组长，李焕为宣传组长，方庆延为总务组长，训练“勘建”队员以金检政策。这是蒋经国在其嫡系中第一次突出王升，而原来最得意的江国栋、李焕等就降到了第二等级。

上海金检虽时间短暂且以失败告终，但王升从中却捞到了极大的好处，为后来的升腾打下了基础。

溃逃广州

一九四九年夏，王升由杭州逃到广州，我们又相会了。我是跟

“国防部”到广州的，住在沙河原黄埔军校入伍生团旧址。其后，我们在一起厮混了两个月左右。

他是一月份由上海率部到杭州的。由于国民党各条战线都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正进入“苦撑待变”时期。此时，十三太保之一的胡轨奉命改“勘建总队”为“青年救国团”，同时管辖所有流亡的国立临时中学，组织所谓“群众性”的抗共特务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大同盟”，妄图苟延残喘。

“青年救国团”总部设于杭州云栖寺，团长是胡轨，蒋经国的亲信江国栋、王升等都担任处长。由于解放军渡江神速，他们的组织还没有时间喘息，就都被冲散，致使原来的反动布署几乎全落了空。

四月二十二日，王升、江国栋、肖寿英、徐贵庠等“中正学社”成员都来到奉化溪口镇丰镐房为蒋经国祝贺四十一岁诞辰。我因远在广州，没有参加，未能看到蒋经国在离开大陆前最后一个生辰的失望忧伤面容。蒋经国生日的第二天，南京解放；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蒋家王朝终于被人民埋葬了。

“青年救国团”解体后，王升只身逃到广州来敬候“国防部”给他的新安排。这时，蒋经国也来到广州住在郊外。“国防部”任命王升为“政工局政工总队”少将总队长，要他收容原“青年救国团”人员继续特工工作。

蒋经国嫡系“中央干部学校”分研究部和专科两大类。蒋所相信的是研究部学生，总数不过三百人，而经常在其左右出谋划策者也不过二十人左右。这些人都参加了蒋的秘密核心“中正学社”，江国栋、王升、李焕最是得宠，陈志竟、许功锐、方庆延、肖寿英、徐贵庠也是蒋的得意学生。但是这少数人也不是一心一德的，其中江国栋、李焕、王升各怀争长之心，他们平时在蒋经国面前争献殷勤，各不相让。我对他们是平等相处，无分轩轾，一向以团结为重，但相比之下，我与江、李的来往更多一些。

王升到广州住在徐思贤少将组长家。有一天，他约我尽兴地玩

了一天，并且坚留我畅谈到天亮。更深夜静，他敞开思想真是无所不谈，其要点，第一是要我同他合作，他外我里秘密合作，有福同享，争取蒋经国的倚望；第二是要我离开江、李二人，发展以他和我二人为中心的潜在力量。

他的话使我反感。当时我想：国民党已注定完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的这种幻想，真是幼稚可笑；同时为了升官弄权，竟排挤好友，也太无聊。但当时为了应付他，我只好含糊其词。

王升在四川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王升率领“国防部政工局政工总队”三百余名队员辗转来到山城重庆。王升住在两路口一家小客店的临街楼上，其队员则住在不远处的“社会服务处”。早在八月份我就随单位飞到这里，我们二人重聚在两路口小客店里畅谈起来。

他精神饱满，不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共产党上海报纸上说我是大特务头子哩！”他高兴地说出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大特务头子就是大特务头子么！”他得意地跟上这第二句话。以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

他在重庆的工作是清查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掌握生杀大权，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具体做法是：宣传反共，如搞大型画和标语；每保安插一个队员作坐探，清查“可疑分子”；在茶馆、酒店及交通要道等地布下暗探；收买流氓地痞提供情报等。在短短的时间里，重庆人民和进步人士受到秘密逮捕的不下百余人，其中遭到杀害的也有十余人。

不久，形势突变，蒋介石父子由白市驿起飞，王升和他的政工队都分别乘汽车逃成都，那是十一月三十日。第二天，重庆宣告解放。

我也是同一天去蓉，在成都又和他们见面了。我住在三树街25

号，王升的总队住在五世同堂街口的一家公馆里，相隔只五十米，因此我们常常联系。

成都已濒临解放，人们的心情各异。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在茶馆里高声说怪话、发牢骚；搞到飞机票的人则忙于搬行李、卖去带不走的东西；富商地主大都心神不定，打不定主意是留城还是回乡间安全；更多的人则是盼望“国军”早日撤退，成都能和平解放，以免打起仗来受到危险。

在这种混乱情况下，王升还是忠于他的特工职守。他率领住在成都师范的几十个仅存的部下，到处伸出黑手，抓人审讯、拷打、活埋（他曾对我说过活埋江西某人在花台下）。不过，他发怒的时候比平时多了，手也更勤了，每次在审讯、拷打人时比以前多了一句话：“老子叫你到鬼门关前等我。”

他每天要和城防司令盛文通三次电话，询问解放军进攻情况，以便掌握最有利的逃跑时机。同时，他隔一天还要去看一次住在北较场的蒋经国。他已安排好了研究部同班王志尊同学，随时接替他的工作，做他的替死鬼。

十二月中旬某天，他拿着一张蒋经国用红铅笔写给宪兵司令的便条，内容是请给王升去台湾的飞机票。他一再催我“快找（蒋经国）教育长，搞张飞机票！”他要走了。

以后，我就再没见到他了。后来，“政工总队”人员，逃的逃，降的降，全部瓦解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于长丰县政协

尹豪民之死

贡 献 之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统行动队副队长罗伯雍带领六个队员到达永新，我是其中的一名。永新县长王伯恭是中统分子，是中统头目冯琦在江西掌握的两个县政权之一（另一个是瑞金县长施进）。我们到县后，王伯恭委派罗伯雍为拿山区区长（辖茨坪、罗浮、厦坪、拿山等地，现属井冈山市），目的是为了配合保安团消灭尹豪民。当时我任拿山区署民政指导员，亲身经历了消灭尹豪民的全部过程。

尹豪民，永新县拿山乡小通村人，是国民党委派的靖卫团团长。其父尹道一，是关背地区（包括沟边、拿山、厦坪等地）的挨户团团长，一九二八年初，被共产党领导的王佐部队消灭。因此尹豪民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到湘赣革命斗争时期，他纠集地方反动武装，盘据在井岡山东麓，专司袭击，残杀革命干部、破坏革命政权、狙击红军部队，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进山后，在拿山一带村庄的屋墙上还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活捉尹豪民，消灭靖卫团”。红军长征以后，这支反动武装被国民党收编为江西保安团。此后，永新的反动地主武装由于争权夺利分裂为两大派，各派都依附着国民党政权的蒋汪两大集团。尹豪民跟着肖淑宇，倾向于汪精卫集团。汪精卫投降日本后，肖淑宇被国民党击毙，尹豪民的保安团被调往前线。尹自知覆巢之下无完卵，脱离部队逃回拿山，召集旧部，据山为王。国民党政府认为不能容忍，便命江西省政府保安十三团（由会昌靖卫团改编的）到拿山进剿。团长欧阳江纵兵殃民，敲诈勒索，民心丧尽。加之尹势力大，关系广，地势熟，因此欧阳江进剿半年，毫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只

好派申统特务开往拿山，实施消灭尹豪民的行动计划。

我们于三月十二日抵达拿山，对外宣称“我们是省政府派来的行政官员，不偏袒那一派。主张和平解决尹豪民的问题”，并批评“保安团军纪不严，损害民众利益”等等。显示我们完全站在“公正立场”。拿山区署的区员们还深入尹豪民巢穴周围，对农民宣传说：“尹豪民受了委屈，区长将主持公道，请省部来招安”。尹豪民派出的部下混入农民中间，接近区员，把我们这套宣传回报主子，麻痹了尹豪民，减轻了我们遭受他们袭击的危险。

为了掌握尹的行踪，我们走访了当地的一些保甲长、绅士和民众，发现了尹的一些对立面。特别是一个叫肖岂凡的，有中等文化，曾参加过国民党，因触犯尹，被尹捆绑起来，施以毒刑，并准备杀害，只因肖岂凡与尹的得力助手张扬仁是舅甥关系，经张扬仁死保，才保全了性命。所以肖岂凡对尹恨之入骨。掌握到这一情况，我们秘密邀请肖岂凡到拿山区公署相会。他听说我们确是为消灭尹豪民而来的，立刻表示愿意鼎力相助。我们也许愿事成之后，即给他在县府安排一个职务。因此，他经常替我们献计献策，为我们在尹的巢穴内外安排了好几个联络点，使我们掌握了尹的动向。

县长王伯恭听到我们的情况汇报以后，为了抢夺战功，亲自带领一个县自卫中队进驻拿山。他邀请关背地区的绅士开了一个座谈会，派他们进山去敦促尹放下武器，接受招安。绅士中以杂货店老板龙器先为首，前去与尹的助手张扬仁会见，传达了我们的意见。但张扬仁气焰嚣张，骂保安团废物一堆，不堪一击。并自夸说：“即使保安团攻上山，但我们背后是井岗山，一进了井岗山，就是再增加两个保安团也找不到我们的行踪。”劝降没有结果。王伯恭要我写了一份《告关背民众书》，揭发尹豪民的罪行，表明县政府的仁至义尽，指出尹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号召关背民众与之决裂，协助政府消灭尹匪。此文告由当地绅士签名后，用石印印发了数百份，在关背及全县广为张贴，从政治上孤立尹豪民。龙器先当时便说：“这下尹豪民自绝于众，死无葬身之地了。”

为了利用保安团的兵力，削弱尹的军事实力，打破他的高山巢穴。我们根据侦察得来的和联络员提供的情报，绘制了关背地区形势图，标明了地形、地势、道路、工事等情况，提供给保安团。保安团在五月中旬进攻，尹部据险抵抗。保安团兵力多于尹的十倍，却攻不上去。后来欧阳江又调来迫击炮和重机枪，摧毁了尹部在山上用岩石堆垒的工事，才得以攻上山。尹豪民率部退入深山密林，保安团不敢追击，又退下山来，严密包围封锁。

尹豪民虽然败退了，但只有一个部下的手臂受了点伤，军事实力没有削弱。于是我们施用离间计，挑拨尹和他的得力助手张扬仁的关系。尹果然中计，对张扬仁产生了怀疑，战败后不久即与张扬仁分手了。一天夜晚，张扬仁带着亲信，提着马灯，装成照泥鳅的农民，穿过保安团的封锁线，逃出包围圈。尹豪民带领亲信躲在菖蒲洲的后山上。五月十五日，他秘密通知住在拿山乡小洞耘树下村的妹妹尹开妹做好晚饭，准备吃过晚饭连夜潜逃。这时，我们预先布置的联络员已在四处活动，搜集情报。午后，肖岂凡带领一个叫王从宪的壮年农民前来找我。原来王是尹开妹家的紧邻，他发现尹开妹午饭后杀了一只母鸡，经打听她家并无来客，估计尹豪民会窜到她家去。接到这一情报，王伯恭立即作出决定，派县自卫中队和区署人员前去伏击尹豪民。

当天晚上，队伍在自卫中队长“王麻子”和罗伯雍的带领下，急行军十五里，赶到尹开妹屋前的路边埋伏好。深夜十二点左右，从山上来几个人影，前哨喝问：“哪一个？”伏兵不待回话，一齐开枪。顿时手枪、步枪、轻机枪响成一片。打了十几分钟，不见对方还击，这才叫停止射击。走过去搜索，只见一个胖胖的汉子倒在水田里挣扎，一个队员从他身上搜出一支三号驳壳，对他补了一枪，才不动弹了。接着用手电筒查看，王从宪认出这个人正是尹豪民。罗伯雍即派人用门板把尹的尸体搬回拿山。天亮后，王伯恭又找来龙器先等查看尸体，证明是尹豪民无疑。第三天王伯恭把自卫

(下转第176页)

作者·读者·编者

关于《王造时和（前方日报）》的通信

（一）

江西文史资料编辑同志：

拙文《王造时和（前方日报）》刊出后，接井冈山报的同志来信，说我文中所说前进日报并入井冈山日报是不符事实的。一九四九年时我在香港工作，这段历史是听人讲的，当以井冈山报同志指出为准。兹抄上周奔同志的来信，很希望能给予刊出俾资更正。即致敬礼

冯英子 九月十三日

（二）

冯英子同志：

读《江西文史资料》总第十五期刊登大作《王造时和（前方日报）》，135页有“不久，又合并于《井冈山日报》，才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的说法，这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井冈山报》（不是日报）前身是《吉安日报》，属中共吉安地委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原为对开四版，一九五〇年初改为《群众报》；一九五〇年秋改为《井冈山报》，四开四版。与《前进日报》无涉。

《前方日报》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曾停刊一个时期，一九五〇年才复刊，更名为《前进日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底，奉命停办。人员中一部分另行分配，一部自谋职业，印刷机具（如对开机、圆

盘机、铅字等）分别拍卖，作为人员的遣散费，每人给三个月的遣散工资。我是一九五一年三月由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分配去《前进日报》工作的，目睹《前进日报》停办的情景。

大作所说“合并于《井冈山日报》”与历史事实是有讹误的，如果这一代的人不说清楚，可能于今后会生出很多是非来的。特此进言，建议能在《江西文史资料》上作一些更正。此外，阁下如出《文集》时，希望能更正此节。

谨祈

大安

周 奔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

(三)

这里刊出的冯英子、周奔同志的两封信，表明了他们对历史的认真负责精神。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帮助我们共同办好本刊，使我们的刊物真正做到“存真求实”。

——编者

(上接第174页)

中队带回县城，把尹的尸体放在县城东门城墙上示众。

后来通过地方绅士动员，尹部士兵大部缴械投降。因为我们打死尹占了头功，欧阳江气得要命。为了缓和关系，我们把缴获的十余支长枪给了保安团。缴到的三支短枪送回泰和特务机关。至此，消灭尹豪民的任务总算完成，我们即在七月离开了拿山，回到县城。

(陈建军整理)
(永新县政协供稿)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rGf6KW/5paH5Y+y6LWE5paZ6YCJ6L6RICDmgLvnkWxOOi+kV8xMDA4NDM3OS56aXA=",  
  "filename_decoded": "\u6c5f\u897f\u6587\u53f2\u8d44\u6599\u9009\u8f91 \u603b\u7b2c18\u8f91_10084379.zip",  
  "filesize": 13445462,  
  "md5": "e82085850ddecd0262db02dbf0c7c8ed",  
  "header_md5": "b233c7d7c50c78b409fcad7e965fe86d",  
  "sha1": "6e5860fc3856dcb1fcbec2a097031a34f3c67fcd",  
  "sha256": "88aaa3dc6281444e549ebb112a417d1b5a0dd2deeb6d044e1ce0cc45debaa47",  
  "crc32": 86021178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3747558,  
  "pdg_dir_name": "\u255cl\u00a1\u256c\u2248\u256c\u2500\u2569\u2556\u256b\u2569\u2534\u2567\u2564\u00ed\u255dl\u00a1  
\u256b\u2584\u2561\u250c18\u255d\u00a1_10084379",  
  "pdg_main_pages_found": 176,  
  "pdg_main_pages_max": 176,  
  "total_pages": 181,  
  "total_pixels": 710679265,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